白云飞渡

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張郁廉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張郁廉 著

白云飞渡

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她是在满目疮痍国土上出生于哈尔滨的小女孩；

她是在颠沛流离中读完燕京大学、怀抱爱国忧民之心的女青年；

她以客观的笔调，记录了日寇铁蹄下的民族之难与家园之苦；

她就是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
——张郁廉

扉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云飞渡／张郁廉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218-10393-8

Ⅰ．①白…　Ⅱ．①张…　Ⅲ．①传记—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8162号

Baiyunfeidu
白云飞渡　　张郁廉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曾　莹

责任编辑：李怀宇　李沙沙
装帧设计：林小玲
责任技编：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 gdpph. com
印　　刷：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14　　字　　数：120千
版　　次：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5240

時代動亂的哀歌

「北平西山上的楓葉該紅透了，去年這個時候我沿江由南京來，今年的這幾天，漢口各碼頭擠滿了逃難的人。輪船再也容不下一個人了，幾家合租一隻大木船也是辦法，已經有無數的木船，撐著蓬帆向西去了……。」

四十多年前，中國第一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發表在重慶「中央日報」副刊的一篇「在前線」，開端的幾句話，淡淡地勾勒出三十年代離亂人的苦楚。

聚聚 302

外祖父名為李亨德

七、

我這一生中感覺最遺憾的事是對自己的親生母親知道得太少，幾乎是一無所知，更不用說她的長像模樣；她去世時我年僅兩歲半，弟弟復成初生不久。我身邊曾經有過一張父親、母親和我合照的照片，但是在一九三七年（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繼東北開始向華北侵略，全國人民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奮起展開抗日战爭，學校停課，各地學生紛紛向大後方流亡，就在戰亂顛沛流離中，我遺失了那張寶貴的照片。我只知道母親娘家姓李，名字不知道。她有三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她是大姐。她出生在山東掖縣平里店東路宿村，和父親結婚後，就到哈爾濱居住。在哈爾濱大概住了三、四年，生了兩個孩子，年紀青青的就結束了她的一生。她故去的時候有多少歲數？因何

张郁廉自传手稿择印数页（如后）

病而喪生？我都不知道。當時從山東河北到關外（山海關）創業謀生的人，假若有人在外死亡，靈柩一定要運回老家安葬。就這樣，父親辭去了工作，安頓好了兩個無母的孩子，護送母親的靈柩離開哈爾濱回山東老家掖縣平里店朱由村去了；這是一段漫長艱苦的路程：先乘南滿鐵路火車自哈爾濱到遼東半島尖端的商埠大連，由大連改乘船橫渡渤海灣到山東省煙台，再由煙台乘煙維公路（煙台到維縣）汽車到掖縣平里店下車，換乘由馬或騾子拉的大板車走二十來里田埂小路，其間路過嬰里村（晏嬰故里），蘇渠村（孫家世居），東路宿村（我外婆李家住地）和西路宿村（復鈞兄弟外婆王家住地），然後就到了朱由村。朱由村是瀕臨渤海萊州灣的一個村莊，屬於魯東掖縣（掖縣是軍閥張宗昌的家鄉，因他的

张郁廉手稿（2）

胡做非為而聞名全國)，大概有三百多户人家，多半姓張。這裏的居民忠厚、樸實、勤儉、樂天知命。據說我家祖先是明朝張獻忠在四川大屠殺時由成都逃難，幾經輾轉，終於定居在魯東，倒底在山東掖縣居住了幾代？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祖父張吉亭早年喪偶，膝下只有我父親張日高，字陞三和一個叔叔(不知道名字)。他們世世代代都是以種田為生。

張孫兩家的老人們，大約在清朝光緒廿二年即西曆一八九八年前後由原籍魯東，隨着一批一批的年青人，背着簡單的行李，不顧清廷禁令，千里跋涉，私自源源出關(山海關)，赤手空拳到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的東北地帶創天下。那個時候，正趕上俄國藉口代我向日本索還遼東半島，要

张郁廉手稿（3）

No.

求酬謝，因此獲得了在東北興築鐵路的權利，並且租借遼東半島的旅順和大連。俄人遂於一八九八年以哈爾濱為起點，分向東西國境及旅順、大連三方面積極進行敷設路軌，於一九〇三年即以閃電方式完成了中東鐵路：中東鐵路全長二四三〇公里，以哈尔濱為中心，西北至滿洲里，東至綏芬河，南至大連。修築鐵路需要大批年青力壯的勞工，而當時山東、河北兩省民眾，因為在原籍謀生不易，紛紛冒險設法出關。我的父親張日高和叔叔當時正是十七、八歲年富力壯的青年，也跟着離開生長的家鄉到了完全陌生的東北。他們在冰天雪地，忍飢耐寒，胼手胝足走遍松花江流域一帶大小城鎮，做過各式各樣工作，吃盡苦頭，也在奮鬥掙扎中成熟長大。他們以血汗勞力取得的代價，逐漸的

孔雀牌

(24×25)

张郁廉手稿（4）

建立起自己的家園，孳養生息，人口日多，才奠定了我國在東北的基礎。那些在東北有拓荒精神的年青人將多年積蓄紛紛投入工、商業，另求發展，漸漸掌握了東北經濟。另有許多年青人苦学俄語，在鉄路築成後做了中東鉄路局的員工，個個精通俄語，待遇優厚，以金盧布計薪，很受重視。我父親在東北奮鬥了十餘年後，有了謀生技能也略有積蓄後返回老家成親，帶着新婚的妻子再度返回哈爾濱。而我的叔叔不知是和父親同時还是幾年後，雖也千里迢迢去了東北，可是他一去就失去了連絡，至今生死不明。

朱由村雖然不是我出生和生長的地方，但是我對這個靠海的小村莊有濃厚的感情和記憶，那裏是我們張家祖先和我父母出生和埋葬的地方。經過幾十年的歲月和多次的战

乱，故居、祖墓还安在嗎？還是已被荒煙蔓草遮蔽無處尋覓了……。我去過兩次朱由村是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民國廿五、廿六年）的時候，那時我已就讀北平燕京大学，利用寒、暑假期回到山東老家和由哈爾濱趕回去的父親聚晤，因為一九三一年（民國廿年）「九、一八事变」後，日本侵略者强佔東北各省，對中國人百般刁難，對知識份子嚴厲統治，無辜逮捕和殺害時有所聞，因此，父親把我的名字從户籍上取消報以死亡，從此我再也没有回過哈爾濱了。記憶中回朱由村最清楚的一次是一九三七年六月；我在燕大已讀完三年，還差一年畢業，利用暑假和父親約好在山東見面。我從北平乘津浦鉄路火車到濟南，換乘膠濟鉄路火車到維縣下車，改乘煙維公路局的汽車，車行三、四小時，途經掖縣縣城

孔雀牌 (24×25)

十、

到平里店下車。平里店是煙維公路上的一個小鎮，那裏有電報和郵政局。父親總是先我幾天到家，我回來時他在平里店接我。父女兩人坐上早已雇好的騾拉板車，搖搖晃晃的順着麥田中间的土路緩慢的前行，大概要走一個多小時才到。遠遠就看見了紅磚砌成的圍牆，牆内分三個院子，每個院子裏有一排三间的房子，雖是老房子，但都經過整修。印象最深的是房子的屋頂上都鋪着厚厚的一層層曬乾的海草，有人說是海帶，據說冬暖夏涼，不漏水不透風，就地取材，便宜實用，家家户户的屋頂都一樣。所以一進朱由村遠遠就聞到了鹹鹹腥腥的海的味道。記得三個相通的院子外還有一個小裏院，院裏靠邊堆着燒火用的木材枯枝等雜物，不遠處有兩棵枝葉茂密的桃樹，每年開花結果

张郁廉手稿（7）

No.

，中間就是一個露天的大糞坑（廁所）。一進大门的院子裏住着大奶奶，她是父親的伯母，伯父早亡，無兒女，由父親奉養，並排另一院裏兩明一暗的房子由父親和我暫住，這個院子裏還有一口深井，家中用水都由此汲取。記得那年夏天父親總是在趕集的日子（五天一集）買些西瓜回來，裝在打水用的木桶裏放進水井，傍晚時在院中乘凉，一家人就有冰凉凉的西瓜吃了。第三個院子裏住着我瞎了眼的奶奶，她不是我父親的親生母親，我親祖母在我父親十來歲時就故去了。我所看見的祖母是我誕生以前，有一年山東乾旱，各地鬧「飢荒」，有一批難民逃到我們村子裏，其中有一個由平度逃來的三十多歲的寡婦，孤苦伶仃，來到我家门前，我家人口單薄，正需要人來照顧祖父及兩個稚兒，就

孔雀牌

(24×25)

张郁廉手稿（8）

把她收留了，以後我们就稱她為奶奶，當時她的雙眼還未失明。此後的年月也多虧有她支撐老家的一切家務：父親和叔叔出外謀生，祖父去世，家中破屋和幾畝田地就由她一人看管維持，一直到父親在東北賺了錢，陸續把錢寄回老家，把房屋整修重建，生活才得以改善。

說到我外婆家，我知道的更少了，只知道姓李，他们世居與米由村相隔十餘里的東路宿村。家中有四女一男，我母親居長。我兩次回米由村都一定到外婆家住一兩天。那時外祖父已去世多年，小舅舅也死了，家中只有外婆和四姨。二姨隨丈夫到東北一面坡經商，我沒有見過她，三姨到那裏去了，我沒有印象。四姨結婚後，丈夫到関外東北謀生，一去十幾年沒有音訊，四姨只有長住娘家和老邁的

No.

外婆做伴。外婆家境十分悽涼，生活艱苦，茅屋僅可蔽風雨，當時我還在求学，對外婆的清苦生活無力濟助，倒是父親時時不忘送點錢過去。記得在外婆家過夜時，三人睡在炕上，我和四姨睡一頭，外婆睡在另一頭，三人蓋一床棉被，夜裏外婆緊抱着我的雙腳為我保暖，四姨則兩臂摟着我御寒。小舅舅的模樣我到現在還能清晰的記得。不知道是那一年，他大概也只有十七十八歲的時候到了哈爾濱，我父親給他介紹店舖做學徒。父親第一次帶他到家時對我說：「這是你娘的弟弟，你親舅舅啊！」小舅興奮的握着我的小手，不自覺的流下了眼淚。他穿着藍布長衫，臉面清瘦。以後他又來看過我幾次，有一次他咳嗽得很厲害，幾滴鮮血濺到地板上。從此他沒有再來，父親說小舅舅有病回

孔雀牌

(24×25)

张郁廉手稿（10）

目录

序言　白云飞渡情悠悠
——读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手稿记 …… 杜南发 001

引言　青山依旧，白云悠悠，你在何方？ …… 001

第一辑　离散岁月（1914—1937） …… 005

一　取名聚聚，然我两岁半就失去亲生母亲 …… 006
二　我的“瓦娃”，我最敬爱的白俄母亲 …… 010
三　温馨童年，丁香花和普希金童话 …… 013
四　瓦娃的明达——中国人必须上中国小学 …… 020
五　“东顺祥”大院主人孙宝书先生，孙府家世 …… 024
六　哈尔滨女一中——我的少女时光 …… 027
七　天津南开北平慕贞，战云笼罩的动荡青春 …… 036
八　北平燕京大学，我的学业和好友 …… 043
九　海滨老家朱由村，和父亲最后一次聚首 …… 053

第二辑　记者生涯（1937—1945） …… 071

一　战火中加入苏联塔斯社汉口分社 …… 072
二　“你是到最前线我旅部的第一位女记者” …… 074
三　敌机狂轰滥炸下，不屈的陪都重庆 …… 081
四　访问延安，听毛泽东演讲，看江青照相 …… 083
五　烽烟中人生百态，邓颖超和我们一起跑警报 …… 085
六　成都续读燕京大学，完成父亲遗愿 …… 101
七　重返新闻战线，进重庆中央社 …… 108
八　青梅竹马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 110
九　侵略者终于投降，四处累累战争伤痕 …… 115

第三辑　乱世沉浮（1945—1949） …………………………… 121
一　东北接收，希望转为失望，挽狂澜于既倒 ………………… 122
二　历尽艰辛，我终于履行了给父亲的诺言 …………………… 124
三　辗转于哈尔滨、沈阳、长春、南京、上海、广州 ………… 127

第四辑　宝岛年华（1949—2010） …………………………… 137
一　初履斯土，物资匮乏，风雨飘摇 ………………………… 138
二　七岁的博比——母亲节大会的主席 ……………………… 141
三　学习国画，成黄君璧老师最早期门生 …………………… 142
四　在台湾三年，我们第六次搬家 ………………………… 146
五　如我所愿——志在必得的求职目标 ……………………… 149
六　四十二岁如愿生下健康的女儿 ………………………… 151
七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的女科长 ………………………… 153
八　震惊全岛的俄船“陶普赛”号入台事件 ………………… 154
九　桂籍赴德会及欧洲之旅 ……………………………… 155
十　轻舟已过万重山——太平日子的悲欢点滴 ……………… 157

第五辑　缅怀母亲 ………………………………………… 165

附录一　瓦娃——我伟大的白俄母亲 ……………………… 174
附录二　瓦娃亲笔为我抄录的诗篇 ………………………… 175
瓦娃亲笔为我抄录的诗篇（翻译） ………………… 176
附录三　卡尔曼1941年莫斯科给我的来函 ………………… 177
卡尔曼1941年莫斯科给我的来函（翻译） …………… 179
附录四　《在前线》——我1938年的战地采访报道 ………… 181

编后记………………………………………………………… 187

序言：白云飞渡情悠悠

——读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手稿记

杜南发

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雕塑家孙宇立来电，约我到他的苏菲亚山工作室。

苏菲亚山是座闹市里的小丘，学者郑子瑜住的建安大厦在上山前的路口，斜坡路尽头是二战前美术家林学大创办的南洋美专，孙宇立的工作室就在中间路段。

孙宇立是专业建筑师，原任职于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都市重建处，回新加坡创业，为了兴趣，毅然决定放弃建筑专业，一心从事雕塑。80年代艺评家刘奇俊介绍我们认识，那时他正苦思创作路向，想解决西方拓扑学与中国易学之间的问题，多次与我深夜长谈，交流意见，成为好友。

他曾告诉我，他母亲是我同行前辈，为中国早期第一位战地女记者；那天约我见面，是因为老人家刚到新加坡，希望能和我见面。

一进门，便见一位穿着淳朴、相貌慈祥的老太太，气质优雅，端庄有度，当然就是孙妈妈张郁廉女士了。这年她已80多岁，依然走得快而腰板挺直，握手有力，言谈爽朗，充满自信。

喝茶聊天，她对新加坡的新闻工作情况很感兴趣，也谈了自己早年抗战见闻，尤其是战场的残酷，谈她在台儿庄大战结束第二天就到现场所见的情景，以及她半夜穿越日军封锁线的惊险经过。

热带午后，在南方国度，安静的室内，听着报业前辈淡淡述说半世纪前自己惊心动魄的战场故事，感受良深。

初次见面，轻松闲话，已觉得内容丰富，便相约择日再作专门访谈。但报社事务繁忙，一再耽搁，想起再联系时，老人家已飞回台湾了。

有机无缘，只能错过；蓦然回首，暮云已远。也就只能放在心中，成

为一段不完整的记忆。

二十多年后始读到的手稿

二十多年后，孙宇立已是新加坡重要雕塑名家，一天他告诉我他母亲2010年过世后留有一部手稿，原是准备写给儿孙们阅读的自传，他觉得有些内容我可能会感兴趣。

连夜拜读，一口气读完，感觉亲身经历了一个大时代的激荡，心情起伏，一时难息。

文稿不仅记述张郁廉作为战地女记者，亲身经历几场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战役，如台儿庄之役、徐州突围、武汉撤退、长沙大火、中条山游击战、重庆大轰炸等情景；还详细追述上世纪初她从小被寄养于东北哈尔滨白俄家庭、考入燕京大学、参加1935年北平学联发动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街头游行，如何因为俄语娴熟而先后在塔斯社、中央社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

更有意思的是她还曾陪同苏联战地记者前往延安，和毛泽东握过手，听过他演讲及目睹江青在现场拍照的情景。

文稿也记述了张郁廉1944年和青梅竹马的北平大学经济系高材生孙桂籍结婚，1946年随丈夫到东北，当时孙桂籍是国民政府负责接收哈尔滨市的社会局长，后来又先后担任东北物资调节局长、旅顺市长和长春市长，张郁廉则担任中央社沈阳和长春分社的采访组组长；1948年全家如何在辽沈战役时被林彪大军包围在长春城、辗转到台湾等情节；还记述了她和作家韩素英（韩素音）夫妇、燕大校长梅贻宝夫妇、对台湾经济贡献巨大的孙运璿等许多时代人物的交情，以及她后来如何成为书画名家黄君璧“白云堂”最早期弟子的故事。

整部文稿是一份自传，是一位知识女性在那个新旧交替社会的真实人生，更是那个风云激荡大时代的一个剖面。

淡淡的笔触，娓娓叙述着一个大时代的苦难和悲辛，战争生活的残酷，一个个平凡又不平凡的故事，读来令人感慨良多。

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

阅读这份文稿，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中国第一位战地女记者”的问题。

“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采访战地新闻的女记者”，这是当年中央社社长萧同兹对张郁廉的称誉和肯定。

枪声不断、炮声轰隆中走访战地（图中骑马者为张郁廉）

萧同兹是开创中国现代新闻通讯事业的官方新闻机构领导人，被形容为20世纪中国百年新闻史上无法绕开的一位人物，备受尊敬，他的肯定，自成公论。

抗战前期的徐州会战，是中国新闻史上首次有中国女记者出现在战场，张郁廉便因当年亲赴采访而获得这项殊荣。

徐州会战指1938年1月至6月间，中日两国军队以徐州为中心展开的一系列激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次重要会战，双方共出动80万大军，连战数月，伤亡逾12万人，最后虽以中方撤守徐州结束，但其间爆发著名的台儿庄大战，日军在一次战役中伤亡逾万人，是中国抗战第一场大胜利，对

鼓舞中国军民抗战士气影响很大。

据张郁廉记述，她是1938年3月，受塔斯社社长罗果夫委派，与苏联塔斯社总社派来的军事记者前往徐州战区采访，她所住的花园饭店，就遭日本军机多次直接轰炸。

她也记述在战火中搭军车前往徐州城外五六十公里处的台儿庄前线，到国军作战旅长指挥部采访。当时周围仍然枪声不断，炮声轰隆，旅长覃异之少将对她说：“你是到最前线我旅部的第一位女记者”，还送她一把德制勃朗宁小手枪自卫。

据查考，这位覃异之旅长，当时率领的是国军第52军25师第73旅，为台儿庄会战主力攻击部队。抗战后，在东北辽沈战役的长春围城之战时，覃异之还曾和已是长春市长夫人的张郁廉相遇，当时他已升任第52军军长，1949年他在香港通电反蒋，回北京担任水电部参事室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但我发现当年在徐州战场上，除了张郁廉，还有另一位战地女记者，而且和新加坡有关！

她就是《星洲日报》特派记者黄薇。

黄薇是福建龙岩人，厦门集美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因兄长移民新加坡，曾到新加坡探亲，后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抗战开始，她和许多留日学生一起回国，组团到新加坡和南洋各地宣传抗战，1938年3月以《星洲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回中国，有“华侨记者”之称。

当时《星洲日报》总编辑为关楚璞，兼任主笔，经常撰文支持抗战，立场鲜明，或许因此决定特聘黄薇为特派记者，回国采访当时读者最关心的抗战新闻。

回国一个月后，1938年4月，黄薇便以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参加武汉新闻界组织的记者团，前往徐州抗战前线采访，是武汉战地记者团中唯一的女性。（新中国成立后黄薇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处长，负责和马共总书记陈平联系。）

虽然徐州战场上同时有两位战地女记者，分别随苏联战地记者团及武汉战地记者团行动，但考虑到张郁廉1938年3月中旬已经到了徐州，黄薇则

是3月才从新加坡回国，4月方到徐州，时间相差一个月，因此，称张郁廉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采访战地新闻的女记者”，是合理的。

她们两人还有一段因缘，就是当年记者们在徐州突围时，各有惊险经历，张郁廉就走了21天才穿越日军封锁线，回到武汉。徐州会战结束一个月后，重庆生活书店曾收集有关报道，出版《徐州突围》一书，由黄薇写序，书里就收录有张郁廉写的《徐州最后的一瞥》。

虽然中国战地女记者首次出现战场上，是1938年的徐州会战，但在更早的一年前，已有一位女性，活跃在1937年8月爆发的淞沪会战的战场，在上海周围战区活动，写了许多战场通讯和文艺作品。

她就是传奇性的女作家胡兰畦。

胡兰畦的经历，十分传奇，她曾以时尚俏女郎登上过《良友》画报的封面，留学德国，坐过纳粹德国的监狱，是民国时期被授少将军衔的少数女性之一，曾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出席过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备受苏联大文豪高尔基赏识，早年并曾和陈毅有过一段美丽的恋情。

但当年在淞沪战地上活动的胡兰畦，并非记者身份，而是率战地服务团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和战地救护工作，其战场通讯也多与著名战地记者范长江合写。因此从严格定义而言，并不能算是首位战地女记者。

当然，所谓“首位战地女记者”之名，只是一个记录问题，重要的是这些新时代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时，不顾自身安危，亲赴战场，各自挥笔对抗战做出贡献，这才是真正的意义。

在日本国会图书馆资料室，有一本绪方昇著作《支那采访》，1941东京日日新闻社出版，书中第一部分就有一篇文章，题为《9位投身抗战的女记者》，第一位就是塔斯社张郁廉，其他依次为路透社赵敏淑、《星洲日报》黄薇、《中央日报》封禾子、《大公报》彭子冈、《新民报》浦熙修、《时事新报》冯若斯和熊岳南、《新蜀报》张志渊。

书作者绪方昇，是昭和时代诗人，支那学者绪方南溟之子，毕业自早稻田大学，加入东京日日新闻社到中国采访；战后还创办文学界的“日本未来派”，获得《读卖新闻》的文学奖。

熟悉中国的绪方昇这本介绍中国抗战的书，第一章就专门介绍这九位

中国女记者，或许不够齐全，但至少说明当时在日本方面的情报记录里，张郁廉是名列第一的抗战女记者。

延安采访的时间

张郁廉自述稿另一件有意思的记述，是她陪同苏联塔斯社记者，访问抗战时的延安所见的情景：

我们被安排到招待所去住宿，是一座面积不小的窑洞，抗日大学就在招待所山脚下的一大片空地上，校舍新搭成的……每晨天初亮时，就听到抗大学生在操场上洪亮的歌声。

我没有机会采访毛泽东，但在一场露天演讲会上曾和他握过手，并坐在众多人群中听他讲话；也看到年轻活泼的江青，梳着两条短辫子，手拿照相机跑来跑去给毛拍照。

但文稿并没有记录她是哪一年到延安。

毛泽东接受卡尔曼访问并合影

幸亏有一篇文章《前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的红色延安行》（作者王国宇，刊于《档案天地》2013年第12期），记录这位专门到延安拍摄电影的苏联《消息报》摄影记者的活动，文中一段文字称：“1939年5月18日，他提出要访问八路军医院。这所医院地处延安城东北

40里处的拐峁，陪同他参观的有萧三、专职女翻译张郁廉、鲁艺政治部主任徐一新3人。”

这段记录，说明张郁廉是陪同卡尔曼一起访问延安的。

另一篇文章《罗曼·卡尔曼：在延安的日子里》（作者石磊，载《中国档案报》总第2511期，2013年9月19日），更清楚记录卡尔曼是在1939年5月14日到延安，6月3日离开。毛泽东当年许多珍贵照片及影片，如和农民讲话、与江青抱女儿一家三口、在窑洞工作、在抗日军政大学演讲等镜头，都是他此行所拍摄的。他写的《毛泽东会见记》一文，同年7月8日在苏联《消息报》发表，8月28日《新华日报》翻译转载。

在张郁廉生前保留的文件中，就有一封卡尔曼1942年从苏联写给她的信（附录三），叙述两人因采访建立的友谊。另有他们两人同在湘南地区及长沙大火现场的照片，证明她还曾陪同卡尔曼走遍中国各地战区进行采访。

张郁廉在延安没有访问毛泽东，但5月25日毛泽东却在杨家岭接受卡尔曼采访，从晚上9时谈到深夜12时，访问现场只有三人。翻译是毛泽东年轻时的同乡朋友萧三，他作为左联驻莫斯科代表12年，当时刚从苏联回到延安才十来天，在莫斯科就认识卡尔曼。

根据有关文章记载，当时卡尔曼是奉斯大林之命到延安，两人在访谈中谈了许多政治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没有让张郁廉在场担任翻译，可能有政治立场上保密的考量。

有关文章也提到1939年6月1日，卡尔曼在杨家岭给毛泽东照相，并拍摄题为《毛泽东的工作一日》纪录片，现场也是由萧三担任翻译。当天下午，毛泽东与卡尔曼驱车到南门外的抗大，参加该校建校三周年庆祝会，文章称：“6时庆祝会开始，那时延安没有电灯，为了利用夕阳的余晖拍摄毛泽东的活动，安排他在庆祝会上第一个讲话。在毛泽东讲话过程中，卡尔曼扛着摄像机，台上台下，会场前后紧忙活，抢拍了许多感人的镜头。”

张郁廉说她在一场露天演讲会上和毛泽东握过手，并坐在众多人群中听他讲话，也看到年轻活泼的江青手拿照相机跑来跑去给毛拍照，应该就

是1939年6月1日这天的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稿写到“江青梳着两条短辫子”，这模样的照片很罕见，只有卡尔曼所拍毛与江青抱女儿一家三口的照片，可以看见这两

林彪与罗瑞卿宴请卡尔曼

条超短的小辫子。

在张郁廉保留的旧照片中，我还发现一张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宴请卡尔曼的照片，照片里有抗大校长林彪。根据有关记录，罗瑞卿是在5月22日下午宴请卡尔曼，但或许因为后来的其他因素，记录并没有提到林彪也在现场，张郁廉所拍摄的这张照片也算是补充了一点被漏失的小史料了。

韩素英和孙运璿

这部十余万字的文稿，还记录了许多精彩有趣的文史人物故事，例如周光瑚。

周光瑚是张郁廉在燕京大学经常来往的同学好友之一，中国、比利时混血儿。抗战时，她以笔名写了一本自传体小说《瑰宝》，被好莱坞拍成

电影《生死恋》，获得三项奥斯卡奖，轰动一时。

周光瑚的笔名，就是“韩素英”（又译为韩素音）。

张郁廉和韩素英两位老同学，抗战时都在重庆，1944年张郁廉结婚，婚礼上所穿的枣红色旗袍布料、麂皮灰蓝色鞋等物，都是那一年刚到英国留学的韩素英托人带回来送给她的。据孙宇立称，50年代以后张韩两人还继续通信，那套婚服也一直保留在家中衣橱多年。

韩素英的丈夫唐保黄，任中国驻伦敦大使馆武官多年，抗战后回国担任师长，率军驻防沈阳城外的打虎山时，曾特别到当时在沈阳的张郁廉一家探访，还对张郁廉说他生肖属虎，这次奉命驻防打虎山，“好像不太妥当”，不久果然在山上战死。

但张韩两人，当时并不知道两人还有一段二代因缘。原来韩素英50年代初到马来西亚，在柔佛新山开设环球大药房，住在距药房五分钟步程的一栋单层大宅，她家斜对面有一户郭家，韩素英是郭家的家庭医生。她从小看护的郭家千金郭日丽，后来留学美国，在华盛顿世界银行邂逅孙宇立，两人一见钟情，并蒂连理，成为孙太太，也就是张郁廉的媳妇，延续前缘，再成一段佳话。

另一位是孙运璿，台湾科技产业最主要奠基者及台湾经济起飞的主要推手。

张郁廉丈夫孙桂籍，和孙运璿是东北的同学和终身挚友。

文稿透露，当年孙运璿在哈尔滨工大读书时，因为是全班最矮、年龄最小、读书却最好，还因此得了个绰号“小孙子”。

1945年抗战胜利那一年，孙运璿刚自美国受训返重庆，就成孙桂籍和张郁廉夫妇家中常客，经常和一群东北同学好友，为了张郁廉煮的俄式风味“罗宋汤”而到这里聚会“解馋”。

抗战结束时，孙运璿和同事被国民政府派往东北辽宁接收电力资源，到了重庆郊外的飞机场，还有十分钟就要起飞，忽然接到电话，要孙运璿留下接待几位美国工程师，他只好从机场折回，行李先由同事带去东北。没想到不久东北爆发内战，孙运璿辗转到台湾，平步青云，最后当了行政机关最高领导人——“行政院长”，还几乎成为“总统”。

当年一通电话，就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大时代的悲喜，如此简单就决定人的一生，令人感叹。

孙运璿和孙桂籍是终身莫逆之交，后来孙运璿成家，两家人成为通家之好，来往密切。孙桂籍在台湾担任“立委”党部书记长，孙运璿在他的自传中谈及这位相交40年的好友：“把政坛派系、官场惯例、党国大老的好恶，都一一传给了这位小老弟，并摆平他与‘立委’间的歧异”，对孙运璿在政坛的发展有重要帮助。

“患难交深，爱我如弟，视君如兄，后死敢忘一言诺”，孙运璿亲自为孙桂籍撰写的挽联，就流露出他们之间如兄如弟的深厚情谊。

新发现的萧红照片

张郁廉自述文稿，写作时只想为家人留个纪念，并未想过出版，只凭记忆书写，不免会有疏漏。

幸亏她留下许多旧照片和一些信件，可以补充一些有意思的故事。例如，我就在旧照片里发现了一张著名作家萧红从未出现过的“新”照片！

虽然，张郁廉和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39人一起被《大公报》列为“东北作家群”（1940年9月《大公报·九一八纪念特刊》），但在她的这部文稿中，并未见到有关萧红的记述。

据孙宇立忆称，当年台北有一杂志社访问张郁廉时，张郁廉谈到萧红，可惜已忘了期刊名称和文章内容，但此事可证明她们两人应该相识。张郁廉还提起过家里有一张和萧红的照片，可惜好像是被杂志社借走，下落不明，

据我查考，张萧二人早期生活行迹，除了在1927—1930年同时就读哈尔滨第一女子中学外，并无其他交集。但是，1938年12月22日，萧红曾在塔斯社重庆分社，接受苏联记者（社长）罗果夫的采访，当时张郁廉就在塔斯社负责翻译采访，两人再次见面及拍照，最有可能就是在这时候，但没有照片佐证，只能揣测空想。

一天下午，孙宇立和我一起查阅旧照片，突然发现一张略有折痕的老

照片，正是张郁廉和萧红的合照！

照片是在一幢石块砌成的两层洋式楼房前拍的，楼房就是位于重庆枣子岚垭的塔斯社办事处。证明我原先推断是正确的，两人果然是在萧红接受访问这一天见面合照。

这张照片，还有一个特别意义。

据萧红生平记录，她是在这一年（1938年）9月中旬，怀着七八个月身孕，从武汉来到重庆，不久就到郊外江津的白沙镇，投靠东北作家友人白朗罗烽夫妇待产。11月下旬在江津产子夭折后，12月初就离开江津返回重庆，和日本友人同住在米花街小胡同池田寓所。

12月22日萧红到塔斯社接受访问，并拍下这张合照。这一天，正是她满月刚过的时候，所以照片中她的神色，显得浮肿憔悴，还要张郁廉一旁略微扶助。

这是萧红生产后唯一拍摄的照片，张郁廉保留照片原件半个多世纪，这回“出土”，可说是萧红研究一项最新发现，是一次难得的惊喜。

1938年12月22日，萧红与张郁廉摄于重庆枣子岚垭

绥远包头旧风情

张郁廉还有一批30年代在绥远、包头等地所拍的旧照片，照片背后写有包头街市、西公旗旗政府、包头县政府、石王府、五当召、梅力更召、包头转龙藏、绥远昭君墓等地名。

绥远是一个已经消失的省份，在今内蒙古中部，1954年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当年一般人要去这里，无论旅行或采访，都很不容易。但如此独特的行程，自述文稿内却未见有详细记录，究竟她何时前往绥远采访，成了谜团。

经分析，张郁廉在1937年年底才到武汉塔斯通讯社开始新闻工作，而绥远、包头等地在当年10月即被日军占领，已不可能前往采访，因此这些照片拍摄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她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

再重复细阅文稿，果然发现文内提到她参加燕大课外社团的活动及由

考察团出发合影于绥远火车站前，后排右二为张郁廉

学生会主办的旅游活动时，有一句“我也曾……到内蒙古西公旗等地，夜宿蒙古包，还到古迹名胜参观游览。”

这一句话，证明了她果然是在此时前往内蒙古西公旗等地，但文中并未写明时间，也未能解释当时她经济条件并不好，如何能到如此偏远地区旅游。

后来查阅资料，发现在1936年春，绥远省政府曾邀北平数所大学组成绥蒙考察团，为期两周。学生们分成三组，分别到包头、百灵庙、西公旗、四子王旗等地考察。

张郁廉显然参加了此行，和同学前往西公旗、南海子乡、石王府、五当召等地。

这次行程，背景并不简单，就在考察团出发前一个月，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各大学的学生上街发动反日游行。考察团内的成员，有许多都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如朱祥麟、周应霖等，张郁廉也是其中之一。

朱祥麟就是后来《大公报》著名战地记者朱启平，曾采访冲绳岛、硫磺岛等太平洋战役，并且参加“密苏里”号战舰上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张郁廉文稿里就有提到和他因“一二·九运动”认识、交往。

有关朱祥麟和周应霖的文章，都说他们当年到绥蒙“考察”，是为了宣传抗日。

1936年春的绥远政局显然也有此需要，当时代表中央政府的省主席傅作义，和属亲日派的“蒙疆自治政府”关系很紧张，让被“一二·九运动”激发爱国热情的北平大学生去宣传抗日，自然有利于当局压制亲日派。或因如此，绥远省政府才会邀请他们前往“考察文化并联络蒙胞感情”。

此行半年后的秋天，绥远就爆发了著名的百灵庙战役。

张郁廉文稿称，当时燕大有一位学长赵锡霖，曾专门买一台相机，“尽量也参加我去旅游的地方……为我拍照、送照片，多方接近我”，所以这批照片应该都是他所拍摄。赵锡霖后来留学德国，成为中国著名冶金专家。孙宇立说90年代还曾陪同母亲到北京和他见面。

照片集里，特别有意思的是有一张写明“西公旗扎萨克”的照片。

扎萨克就是旗主，西公旗全名为“乌兰察布盟乌拉特西公旗”（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照片中这位旗主即人称“石王”的蒙古王公，名为石拉布多尔济，他支持国民政府，和另一位亲日派王公“德王”对峙。

1936年9月“石王”病亡，这张半年前春天拍的照片，可能是他最后一张历史性照片。

“石王”的妻子（福晋），就是著名的蒙古抗日女王奇俊峰（蒙古名色福勒玛）。日军占领包头后，她率部在绥西坚持抗日战斗，1940年到重庆见蒋介石，获授中将。

右立者为西公旗主札萨克“石王”

照片中就有张郁廉和同学在石王府及与蒙古贵妇的合照，不知其中是否有当时还未成名的奇俊峰在内。

另几张写明“前往包头新村路上”及“南海子乡在黄河边上”的照片，也有意思。

30年代初期，中国曾有过一次乡村建设运动，著名学者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都积极推行新村建设实验区。

西北将军段绳武就于1935年前后将大批河北灾民安置于绥远的“新村”，其中半数安置于包头东南郊南海子乡，以垦发边荒、救济贫民、建设新村。

张郁廉等北平各大学学生1936年春到包头，正是新村建设半年后，所以当地会专门到南海子乡参观这些新开拓的“特区”。

其中一张西公旗旗政府照片背后，还特别写明“我们住这里”。当年绥远地区的匪患闻名全国，据记录1931年绥远著名匪首就有265人，大学生

到南海子乡参观新村的建设

们住在旗政府里，应是为了安全考量。

1936年春北平各大学生组织的绥蒙考察团，记录资料很少，张郁廉保留的照片，可说是为这次历史之行，留下一份宝贵的记录。

白云飞渡情悠悠

这部自述文稿和照片，记录了一个在那个思想封建保守的时代，一位民间女子的奋斗和人生经历。文字里有逾半世纪的战火和动荡，有许多当年大江南北真实的生活民情，有血有泪，有情有爱，虽是笔墨轻淡，叙述朴实，那份情真，却很感人。

情至不矫，雨润无声。最朴实的感情，犹如无声的雨，悄然染湿天地，淡然如是，真实如是，深刻如是。

有缘有幸，拜读这份文稿，我立刻建议孙宇立应用心整理出版，让我的这位报业前辈——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能够让世人知道她的一生，也为20世纪中国大变动的时代，留下一份真实的个人印记。

手稿中有一段话，应该最能说明张郁廉执笔为文的心情和心意：

“多年来，我所看到的、听到的、亲身经历的都是妻离子散或生离死别的人间大悲剧，而这些都是日本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所造成！这血海仇恨永烙我心，中华儿女又岂敢稍忘？！”

简单几句话，凝聚着无数血泪的烙印！

淡然笔墨，血泪心情。文稿写来，没有浮滥的悲情，字里行间，却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永难忘怀的伤痛和义愤。

江山万里，一片白云，悠然飞渡；

家国在心，天地浩气，凛然长存。

我建议以《白云飞渡》为书名，因为张郁廉早年身为白俄养女，乱世南北飞渡，晚年濡墨白云堂，一生前后皆是“白因缘”（佛教称“白因缘”为“善缘”）的写照，更是借此表达对这位大时代儿女巾帼意气的一份敬意。

引言：青山依旧，白云悠悠，你在何方？

——一封寄往天堂的信　张郁廉书

孙：

刚才，我去中山堂参加长孙儿元宁初中毕业的典礼。礼成，在回家路上，我心中本来充满欣慰，但它很快被惆怅落寞的情绪冲淡，触景生情，难以自已。

岁月无情，不着痕迹，此刻却历历如绘，刻骨铭心。也是在台湾，也是在潮湿闷热的六月末梢，雨季刚过，炎夏将临；也是在中山堂，我们祖孙三代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同一个孙儿元宁由静心幼稚园毕业的典礼。你手牵孙儿，满脸“有孙万事足”的笑容。你对我说：“我们至少还要陪孙儿十年！”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是1976年6月23日。

言犹在耳，十天后的7月3日，那天是星期六，上午，你应邀到木栅政大国际关系研究所参加“和平与社会主义”的专题讨论会。你起立发言时，心脏病猝发，两三分钟即与世长辞，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和孩子们无法相信、承受，事实太残酷了！时光荏苒，从你离去到现在已整整九年。谁说过，时间会医治痛苦，它能够无情地把活生生的美满幸福的日子变成记忆，进而残酷冲刷，使之模糊，终竟消失。但是，孙，这只是安慰人的假话，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依然坚如磐石，无法稍移。

孙，这些年你并没有离开我们，你随时都在我身旁鼓励我、支持我，让我能坚强的支撑下来。不然，相继而来的不幸，我如何对付？你去后不数月，你的胞妹——与我一起长大、情同姊妹的小姑桂云，因肠结核在香港病故；我们的长子宇同，与你辞世相隔一年半，也就是1978年1月5日，因意外撒手尘寰。年老折翼又丧子，其悲痛谁能承受！只有在想及“宇同此去是为了陪伴你”时，心里才稍稍好过一点。

四年前，你在大陆济南医学院当眼科医师的弟弟桂毓，因胰脏癌不治。去年（1984年10月29日）我最疼爱的同母大弟复成也因肝硬化而去

世。九年前，1976年7月3日，这天是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七，下着大雨，天空阴暗。早晨八时多，国际关系研究所派车来接，你离家时一再嘱咐，中午宇立夫妇由大湖来，要我问清楚日丽喜欢吃福州菜还是西餐，全家要出去用餐，因为日丽即将离台返马来西亚娘家，要为她饯行。万万想不到你竟一去不返！你出门前脱下来搭在卧房一张坐椅背上的便服衣裤、皮带等，至今在原处，未曾挪动过。衣橱内，你的西装衬衫、领带、内衣裤也按原来样子挂着、放着。饭桌旁，你经常坐的椅子，一直虚位以待，好像你随时要回来，和家人一起进餐。席间，你照例谈笑风生，爱夸奖大媳妇秀珠，说她做的炸酱面，哪里都吃不到。

我和你是青梅竹马的一对，相随相伴五十四年，从童年、青年、壮年、中年到老年，我们一起欢笑歌唱，一同悲痛流泪，亲历多少苦难、战火、离乱、挣扎、奋斗！家国有多少艰危，我们就有多少磨难。国民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内战、军阀火拼、北伐成功、家乡东北易旗，这些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植入我们的生命史。1931年（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占领东北，我在此前不久，才和同学三人结伴，由哈尔滨到天津，考取了慕名已久的南开高中，开始上课。因受东北事变的影响，天津局势不稳，学校被迫停课，我只好到北平，转学慕贞女中。主要原因是慕贞女中是基督教美以美会创立的学校，管教严格，学生可以住校。这时我和在哈尔滨的家人不能通信，失掉了联系，真正尝到了家破人亡、有家归不得的痛苦。1934年，我以优异成绩从慕贞女中毕业，被保送至北平燕京大学。入学试只考国文、英文，加上智力测验。被保送的四人中，只有我被录取。我主修医预，一心想做医师。但因数、理两科学业繁重，十分吃力，一年后我转读教育系，副修新闻。日本占领了东北，还不罢休，开始侵入华北。1937年（民国26年）7月7日，日军蓄意挑衅，制造震惊天下的卢沟桥事变。此时国民政府已忍到最后关头，毅然宣布全面抗战。我再次被迫转学，离开了已就读三年的北平燕京大学，随同学们开始流亡，由北平到南京再到武汉，辗转流落四川。对日抗战八年期间，我在陪都重庆，先后在苏联塔斯通讯社、中央党部国际宣传处及中央通讯社服务，用英、俄语做抗日宣传工作。1942年（民国31年）北平燕京

大学在四川成都复校，梅贻宝先生任代理校长，我离职赴成都，遵守父亲临别时的嘱咐，返校续读，一年后完成大学学业，那是1943年。父亲在这一年的5月10日在哈尔滨逝世，享年56岁。1944年（民国33年）我结婚生子，次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结束，我们随政府还都南京。你毅然辞去外交部工作，放弃业已内定派赴苏联任外交官的机会，奉召返故乡东北，服务桑梓。先任哈尔滨特别市社会局长及代理市长，后又奉派任旅顺及长春市市长。我则被中央通讯总社调派到沈阳分社担任采访组组长。你任长春市长时，我被派到长春分社工作。那些年头我们都年富力强，一心以自己的能力、学识报效国家，为家乡做点事。但好景不长，内战迫在眉睫。你于1948年当选为代表哈尔滨选区的立法委员，卸去长春市长职务，携眷赴南京就任。次子宇立于该年5月25日诞生于南京中央医院。越一年，1949年5月，我们一家四口，携带简便行囊又随政府乘立法院包机，飞抵宝岛台湾，转眼36年于兹！

五年前（1980年），我自服务了27年之久的台湾银行退休。在台湾我只和长媳秀珠、长孙元宁同住。次子宇立一家在新加坡，小女宇昭远嫁美国。赋闲虽略感空虚和寂寞，但日子无拘无束，无所牵挂。我已过了“从心所欲”的70岁，本该恬淡自适，优游岁月，可是连续经历亲人们的死别，我对人生的必然更加洞悉，每个人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抵达有先后而已。大自然的法则，谁也无法逃避。印度诗哲泰戈尔诗云：“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

朋友们都说我很会安排退休后的生活，其实并不完全如此，我是在不断勉励自己“要坚强愉快地活下去！”尽量使日子充实忙碌起来，一再告诉自己要活得轻松洒脱点，绝不要自寻烦恼，对人对事都往简单里想，尽量避免求人，多靠自己。

这些年来，我养成了每天早晨六时左右到附近植物园的习惯，散步、打太极拳，自由自在地消磨两个小时，独来独往，却不感到孤寂，总觉有你在我身旁。我踏着我们一起走过的土地，眼前还是那些你一再给我指点的树木：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苏铁，苍翠如昔，一棵棵高大的棕榈，随风摇摆，一年年刮台风，它们依然屹立；荷花池旁的老杉树，不改

的是昂然挺立之姿，不挠不屈，使人生敬。细看它，从主干中段分长的副枝，并列而上，茁壮坚强，只比老干矮了少许，二者相伴相依，亲密如父子。我不禁把这棵树当做你和宇同。每天晨光熹微之际，我迫不及待地走向老杉树，也就是走向你们，抬头相视，亲切地默默地喊着："老孙，博比，早！你们好！"然后，一边缓缓绕湖而行，一边以心音把家中每个人的最近情况，详细地告诉你们，一些困扰自己或需解决的问题，也请你们协助。向你们倾吐了心中积压的话后，顿感轻松自在，加强了勇气和自信。我曾告诉你们，我们孙家又多了一个孙女叫怡宁，一个孙儿叫祐宁，去年还有了外孙儿刘家恩。我们的长孙（宇同的儿子）元宁，今夏考取了建中补校高一，他晚间上课，每天下午四时左右会走进植物园，经过湖边花架长廊，去学校上课，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他需要你们的指点和保护。青少年时期最怕交到坏朋友，误入歧途。

还有，我过去没有想到，来台湾后为了兴趣，在上班及相夫教子的余暇，从黄君璧老师学国画山水，这点技艺到了老年，尤其是退休后，竟派上用场。现在我每周有两个半天教授国画山水，精神有所寄托，交上新朋友，也有收入贴补家用。如今我垂垂老矣，体力精神大不如前，但为了我们的子孙，我仍会像你所希望的一样，坚强地支撑下去，以余年尽你我末完成的责任。

青山依旧，白云悠悠，你在何方？人生际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实在奇妙，难以索解。茫茫人海中，你我竟能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在人生短暂的旅途中，并肩携手，走过半个世纪。

孙！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彼此不以名字而以姓称呼，我叫你"孙"，你喊我"张"，是那么自然，那么深情！一声声"张，我回来啦"，你每次进家门第一句话的声调，仍然无限亲切地萦绕耳畔！

张

1987年6月

|第一辑| 离散岁月（1914—1937）

一　取名聚聚，然我两岁半就失去亲生母亲

我1914年（民国3年）夏天在哈尔滨齐红桥（南岗通往道里的要道）旁的中东铁路局附属医院出生。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松花江畔的哈尔滨，是我国东北三大名城之一（另两个是沈阳和大连），“哈尔滨”三字是满族语，意思是“晒渔网的地方”。当时的人口250万。此地从前是荒凉的渔村，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清政府和帝俄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密约》，俄取得特权，在东北修筑由满洲里经哈尔滨到海参崴的“东清铁路”（后改称“中东铁路”），哈尔滨遂成为铁路的重要交汇点和欧亚交通中心，正式成为商埠。

哈尔滨大体上分为三大部分：道里、道外、南岗。郊区有上号、顾乡屯、偏脸子、马家沟、懒汉屯等。1917年（民国6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沙皇被推翻。大批俄国人逃亡到欧洲或我国东北，尤以哈尔滨为多，几乎占哈尔滨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白俄”（“白俄”一词，来源可能是：苏共自称“红党”“红军”，把帝俄时代的官员、地主、富商以及自由知识分子视为“白”）多属于上流社会，文化程度高，经济富足，生活优裕，在哈尔滨从事文化艺术传播工作，组织音乐、文学社团，成立绘画、戏剧机构，举办演奏、出版、展览。城里的学校、书局、画廊、博物馆、教堂、商店、餐馆，从建筑到室内装潢完全欧化，尤其是道里，街道及市容最是俄国化，有一条马路叫“中国大街”，全部用石块砌成，路灯明亮，宽敞的人行道上有座椅，两旁大多是俄国人或欧洲人开的商店及餐馆。哈尔滨开风气之先，最先接触欧洲的书籍、刊物、影片、唱片、美术、音乐、文学和歌舞，成为中国最为欧化的城市之一。

哈尔滨被国人称为“东方小巴黎”，欧俄文化在城市里日益发展，居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受到程度不等的潜移默化。俄语成了中国人所学习的第一种外国语。在这座华洋杂处、亦东亦西的都市，我生活了17年，一直到1931年初中毕业。

我出生后，父母为我取名“聚聚”。后来父亲告诉我这个名字的寓

意：他厌倦了离乱的生活，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家，夫妻子女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但是，事与愿违，我们的家不但没有“聚”，反而“散”了，散得那么彻底，那么悲惨！

我这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是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几乎一无所知，就连同她的长相模样都不复记忆了。她去世时我仅仅两岁半，弟弟复成刚刚出生。我身边曾经有过一张父亲母亲和我合拍的照片，后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继占领东北后向华北进犯，全国人民忍无可忍，奋起展开抗日战争。战乱期间，学校停课，各地学生纷纷向大后方流亡，颠沛流离中，我遗失了这仅有的珍贵照片。

我只知道母亲娘家姓李，名字不详，出生于山东掖县平里店东路宿村。她是大姐，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和父亲结婚后，到了哈尔滨，在那里大概住了三四年，生了两个孩子，年纪轻轻一生就结束了。她故去时有多少岁？因何病而丧生？我都不知道。那年代，从山东、河北到关（山海关）外闯荡的人，假若在外死亡，灵柩一定要运回老家安葬。就为了这，父亲辞去工作，安顿好两个失去母亲的孩子，护送母亲的灵柩，离开哈尔滨，往山东老家掖县平里店朱由村。这是一段艰辛漫长的路程：得先乘南满铁路的火车，自哈尔滨到辽东半岛尖端的商埠大连；在大连改乘轮船，横渡渤海湾，到山东省烟台；再从烟台乘汽车沿烟潍公路（烟台到潍县）到掖县平里店；下车后，换乘由马或骡子拉的大板车，走二十来里田埂小路，其间经婴里村（晏婴故里）、麻渠村（孙家世居）、东路宿村（我外婆李家住地）和西路宿村（复钧兄弟外婆王家住地），最后到朱由村。朱由村是濒临渤海莱州湾的一个村庄，属鲁东掖县（掖县是军阀张宗昌的家乡，因他的胡作非为而闻名全国），大概有三百多户人家，多半姓张。这里的居民忠厚、朴实、勤俭、乐天知命。据说我家祖先是明朝张献忠在四川大屠杀时，逃离成都，几经播迁，终于定居鲁东。到底有几代在山东掖县居住，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我祖父张吉亨早年丧偶，膝下只有我父亲张日高（字升三）和一个叔叔（不知道名字），世世代代以种田为生。

张孙两家的老人们，大约在清朝光绪廿二年即1896年前后从原籍鲁

东，随着一批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背着简单的行李，不顾清廷禁令，千里跋涉，私自出关（山海关），赤手空拳地到地大物博、人口稀少的东北闯天下。那个时候的东北，是俄国和日本争吃的肥肉。俄国借口代我向日本索还辽东半岛，要求酬谢，获得了在东北筑铁路的权利，并且租借辽东半岛的旅顺和大连。俄人在1898年，以哈尔滨为起点，向东、西及旅顺大连三方面，分别铺设路轨，于1903年即以闪电方式建成中东铁路。中东铁路全长2430公里，以哈尔滨为中心，西北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修筑铁路需要大批年轻力壮的劳工，而当时山东、河北两省民众，因为在原籍谋生不易，纷纷冒险出关另寻生路。我的父亲张日高和弟弟，才十七八岁，有的是力气，离开家乡，随闯关东的大流，到了完全陌生的东北。他们在冰天雪地之中，忍饥耐寒，走遍松花江流域的大小城镇，胼手胝足，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吃尽苦头，付出血汗的代价，建立起自己的家园，繁衍后代，家族日渐兴旺。

这个开辟草莱的群体，年富力强，敢冒险，能吃苦，其中一部分人将多年积蓄投入工商业，另求发展，风生水起，渐渐掌握了东北经济的命脉。另外一部分，苦学俄语，在铁路筑成后，成为中东铁路局的员工。由于精通俄语，很受俄人重视，所获待遇以金卢布计算，格外优厚。我父亲在东北奋斗了十余年后，有了谋生技能，也薄有积蓄，遂返回老家成亲，带着新婚的妻子，再度返回哈尔滨。至于那位我不知道名字的叔叔，不知是和父亲同时还是几年后才动身，千里迢迢去了东北，一去就失去了联络，至今渺无音讯。

朱由村虽然不是我出生和生长的地方，但是我对这个靠海的小村庄怀着深厚的感情。那是我们张家祖先和我父母出生和埋葬之处。1936年和1937年，我两次到朱由村去，那时我已就读北平燕京大学，利用寒暑假期回到山东老家，和从哈尔滨赶回去的父亲相聚。我之所以没有前去父亲定居的哈尔滨，是因为1931年（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强占东三省，对中国人百般刁难，对知识分子实行严密的控制，无辜者遭逮捕和杀害的消息时有所闻。因此，父亲报我“已死亡”，名字从户籍上取消。

1937年6月回朱由村的记忆至今清晰，我在燕大已读完三年，还差一年就毕业，利用暑假，和父亲约好在山东见面。我从北平乘津浦铁路的火车到济南，换乘胶济铁路火车到潍县；下车后，改乘烟潍公路局的汽车，行驶三四个小时，途经掖县县城，到平里店。平里店是烟潍公路上的一个小镇，那里有电报和邮政局。父亲先我几天到家，我抵达时他在平里店迎接。父女两人坐上早已雇好的骡拉板车，摇摇晃晃地顺着麦田中间的土路缓缓前行，花了一个多小时，远远看见了老家那红砖砌成的围墙。墙内分三个院子，每个院子里有一排三间的房子，房子虽老，但都经过整修，印象最深的是屋顶上铺着一层层晒干的海草（有人说是海带），厚厚的，据说这种草产自当地，铺在屋顶，不漏水不透风，使房子冬暖夏凉，便宜实用。家家户户都一样，怪不得离村庄远远的，就闻到咸咸腥腥的海草味。记得三个相通的院子外，还有一个小里院，院里靠边堆着烧火用的木头、枯枝等杂物，不远处有两棵枝叶茂密、年年开花结果的桃树，中间是一个露天的大粪坑（厕所）。一进大门的院子里，住着大奶奶，她是父亲的伯母，伯父早亡，无儿女，她由父亲奉养。并排另一院子，两明一暗的房屋，供父亲和我暂住。院子里还有一口深井，家中用水都由此汲取。夏天，赶集的日子（五天一集）一到，父亲便去买些西瓜回来，盛在打水用的木桶里，放进水井泡着，傍晚时一家子在院中乘凉，就吃上冰凉凉的西瓜。第三个院子里，住着瞎了眼的奶奶。她不是我父亲的生母，我亲祖母在我父亲十来岁时就故去了。

我所见到的庶祖母是怎样嫁进我家的呢？我诞生以前，有一年山东干旱，各地闹饥荒。一批难民逃到我们村子里，其中有一个寡妇，从平度那边过来的，30多岁，孤苦伶仃，在我家门前乞讨。那时我家人口单薄，正需要人来照顾祖父及两个稚儿，就把她收留了。从此我家就称她为奶奶，那时她的双眼还未失明。此后的年月，多亏有她撑持老家的一切家务，父亲和叔叔才放心离开，到东北去谋生。祖父去世后，家中破屋她独自居住，几亩田地也由她照料，直到父亲在东北立稳脚跟，赚了钱。父亲陆续把钱寄回老家，把房屋整修重建，老人家的生活才得以改善。

说到我的外婆家，我知道的就更少了，只知道姓李。李家世世代代居

住在与朱由村相隔十余里的东路宿村。外公外婆家中有四女一男，我母亲居长。我两次回朱由村，都到外婆家住一两天。那时外祖父已去世多年，小舅舅也死了，家中只有外婆和四姨。二姨随丈夫到东北一面坡经商，我没有见过她；三姨到哪里去了，我没有印象；那时四姨已出嫁，丈夫到关外谋生，一去十几年没有音讯，四姨只好回娘家长住，和老迈的母亲做伴。外婆的家境十分凄凉，茅屋仅可遮蔽风雨，教我看了十分难受，但我还在求学，并没有收入，无力济助。倒是父亲时时不忘送点钱过去。那一晚，在外婆家过夜，三人睡在炕上，我和四姨睡一头，外婆睡在另一头，合盖一床棉被。夜里外婆紧抱着我的双脚为我保暖，四姨则两臂搂着我御寒。唯一的小舅舅，模样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但记不清是哪一年，他大概只有十七八岁，到哈尔滨投奔父亲，父亲介绍他去店铺当学徒。父亲第一次带他进家，他穿蓝布长衫，脸面清瘦。父亲对我说："这是你娘的弟弟，你亲舅舅啊！"小舅兴奋地握着我的小手，不自觉地流下了泪。以后他又来看过我几次，有一次他咳嗽得很厉害，几滴鲜血溅到地板上，从此没有再来，父亲说小舅舅有病回山东老家去了，不久听说他死了。他来去匆匆，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这一点点。四姨个子高高的，瓜子脸，眉目清秀，落落大方。我对自己的母亲没有一点印象，直到现在，只要想到母亲，眼前泛现的就是四姨的模样。家乡的人都说四姨长得很像当年的母亲，而我又酷似四姨，这么说来，我大概很像我的母亲。

二 我的"瓦娃"，我最敬爱的白俄母亲

我的养母，心目中伟大的母亲，全名瓦尔娃拉・斯提巴诺瓦・阿里莫夫，白俄贵族，她将我从两岁抚育到十九岁。（附录一）

生母的生命在匆忙和无奈中过早地结束，留下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我和弟弟复成。父亲把我送去寄养，弟弟则被父亲的姨父母吴殿芳夫妇收养。对我父亲而言，这是人生中一个沉重无比的打击；对他的孩子——我和复成，是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我长大以后，父亲常常对我提起，那段时间又当爹又当妈，心力交

瘁，希望我能谅解他走投无路之际作的决定。安顿好两个孩子以后，父亲辞去工作，护送母亲的灵柩回山东老家，一去就是两三年，返回哈尔滨，他续了弦，新太太姓王。有了新家，父亲本来想把我姐弟接回去，可是我对寄养的家有了感情，我听不懂也说不了中国话；姨老爷、娘，膝下无子女，也舍不得让弟弟复成离开；何况我们的继母年轻貌美，自己也要生育，并不坚持要我们回去。就这样，我们依然分开住。不过，父亲对我们十分疼爱，一有空就来看望，每逢年节，会把我们接回家小住。所以我和父亲的感情一直很好。那时候父亲已离开中东铁路局，自己开设了营造厂，经济情形好转，在哈尔滨木介街买了房子，同父异母的复钧兄弟也陆续出世。继母一共养育五个孩子——复钧、复合、复善和复本，还有一个女儿，名叫聚婷，这个妹妹我没有见过，听说小时候夭折了。

收养我的是俄国人阿里莫夫（Алимов）夫妇。说来颇为奇怪，我有两个生日，农历是六月六日，阳历是7月31日，但查历书，这两个日子并不在同一天。我的阳历生日是阿里莫夫太太告诉我的，或许他们把收养我的那一天（7月31日）当作我的生日。

我的新家人口简单，只有阿里莫夫夫妇和我。他们都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没有生育。阿里莫夫先生是工程师，中东铁路开始修筑时，被帝俄政府派到东北，在中东铁路局位居要津，家境富裕，官舍宽敞，四周有花园围绕。所谓冥冥中自有天数，在我还没有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之前，女主人对我已有了亲密的感情。按父亲的说法，我们两家同住一条街上（好像叫邮政街），彼此早已认识。我出生以后，阿里莫夫夫妇因为膝下犹虚，特别喜欢我，常常抱我到他们家去玩。一天下午，阿里莫夫太太把我带到她家花园，那时我两岁，已学会走路，穿着一双爸爸新买的红色缎鞋，跟在阿里莫夫太太身后采花捉蝶。花园的一角有一个大土缸，缸的三分之二体积埋在地下，三分之一露在地面，里边盛着大半缸水，是浇花用的。阿里莫夫太太忙着整理花圃，我跑到缸边，弯下腰，记不得是要看自己的影子，还是捞水里的落叶，一不小心，就栽进缸里去了。她发觉到本来在她身边的我不见了，连忙四处找寻，看见一双穿红鞋的小脚露在缸口外，慌忙把我拖出来。我已窒息，失去知觉，她替我做人工呼吸，把我肚

里的水倒空，我才慢慢苏醒过来。爸爸后来说，再晚一步就没有救了。妈妈当时已有身孕，身体本来就差，哪里经得这一吓，整整哭了一晚。从此，我和救命恩人阿里莫夫太太的关系更加密切。大概也就是这个原因，母亲去世后，父亲需要护送灵柩返山东老家安葬时，阿里莫夫夫妇及时伸出援助的手，欣然接纳了我。

在阿里莫夫家，我有了一个新名字，叫“佐雅”（Зоя），据说源起于希腊古字，意思是“生命”。父母给了我生命，阿里莫夫夫妇负起养育之责，在他们爱护照顾教育下，脆弱的小生命才得以长大。

阿里莫夫先生瘦高健壮，风度儒雅，是富有教养的绅士。我称呼他“佳家”（Дядя，俄语意为伯伯、叔叔）。阿里莫夫太太，如果依偎在丈夫身旁，显得娇小玲珑，其实身材中等。她气质高雅，谦虚和蔼，乐观进取，充满活力，举凡文学、音乐、绘画，都有很深的造诣，法文的根底也好。夫妇俩都喜爱艺术，讲求生活情趣，十分恩爱，家庭美满。依照俄国人的习惯，朋友们之间以全名称呼，阿里莫夫太太的全名是瓦尔娃拉•斯提巴诺瓦（Варвара Степановна），阿里莫夫先生称她瓦尔娃拉（Варвара）。小时候听别人这样叫，嫌太长太拗口，很自然地它缩减成“瓦娃”（Варва），阿里莫夫太太从来没有叫我改过来，我一直这样称呼她。“瓦娃”两字并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在我的心目中，“瓦娃”指的是妈妈，最最亲爱的妈妈。

到今天，虽事隔70余年，当我冷静、仔细地回首一生遭际，深深感到，在寄养家庭度过的10多年，从懵懂无知的两岁直到高中毕业，瓦娃的爱护和教育，在我人格形成的最重要阶段何等珍贵。可以说，有今日的我，我这个人尚有可取之处，能受到子孙和朋友们的敬重，都是“瓦娃”所赐。我之所以具有开朗、乐观、进取的性格，主要因为我在充满爱、关怀、鼓励和欣赏的环境中成长。瓦娃长期的潜移默化，循循善诱，使我养成欣赏艺术的品味。她引导我热爱生活，大自然中的一石、一木、一花、一草，都给我带来无限喜悦，我的心灵因之变得丰富和开放。幼时良好的家庭教育，影响力延续到晚年，从1950年年底开始，尽管环境并不如意，我学习国画也没有间断，退休后还能学以致用，教授学生。家风一脉相

承，我的子女对音乐、绘画也充满兴趣，取得成就，这些都应归功于我的“瓦娃”。

瓦娃的人生智慧，可以一个例子作证明。我到入小学的年龄，还不会说中国话，但是瓦娃认为我是中国人，一定要接受正规的中国教育，尽管送我进俄国学校轻而易举，但她克服重重障碍，把我送进中国学校。

对于我的宗教信仰，瓦娃也采取了自由开放的态度。她没有因为自己是虔诚的希腊正教教徒，而要我受洗入教。瓦娃说：“绝不能让佐雅幼小无知时勉强她信教受洗，这样做，对不起上帝，对她也不公平。一定要等她长大，自己去选择和决定宗教的信仰。”她就是这样处处为我设身处地地着想，宽宏大量的气度使我永生感激、敬仰。

三　温馨童年，丁香花和普希金童话

直到晚年，只要遇到一种相似的事物，尘封已久的童年记忆就蓦地从心底涌出，我又感到曾有过的欣喜和落寞。仿佛又闻到了紫丁香花那细腻的芬芳，散发在哈尔滨夏日清晨的空气里。养父佳家和养母瓦娃已坐在院中花架下用早餐，我总是起床晚了，身上还穿着白色长睡袍，急急忙忙地从屋子里跑出来。瓦娃和蔼地招招手说：“来，我们等你呢！”

就在这个院子里，每年夏季丁香花盛开的时候，瓦娃会选一个下午邀请她的好朋友和他们的孩子们来家茶叙兼赏花。一群小娃儿由我带领着，在丁香花丛中寻找那难得一见的长五个瓣儿的花朵。事先每个孩子都许下一个愿望，谁找到，谁的愿望就会实现。小小人头在花丛中绕来绕去，小手小心翻动每朵花。丁香花朵都只有四个瓣儿，找五瓣儿的可真难啊！妈妈们就利用这片刻的清闲，在花架下边谈天边喝香喷喷的下午茶。后来，失望的孩子们终于放弃寻找“幸运花朵”，改玩捉迷藏。

前年初夏在美国旧金山女儿的家，一天清晨，我在后院运动，看见两只小小的黄褐色蝴蝶在草地上低低地盘旋，我马上记起，童年在哈尔滨，也是这种小小的黄褐色蝴蝶。每当严冬刚过，积雪初融，嫩绿的小草迫不及待地伸出头，瓦娃牵着我的小手，到院中或郊区踏青，它们就出现在草

地上。我们爱在草地上寻觅“二月兰”（фиалки），每年最先从冰天雪地中苏醒，报告大地春讯的，就是这种黄豆般大小的紫蓝色小花。我采两朵二月兰，各配上一片绿叶，用粗长的小草捆绑起来，一朵送给瓦娃，自己留下一朵，一起系在胸前。两人满怀春日的喜悦，蹦蹦跳跳着回家。

瓦娃想象力丰富，有高雅的生活情趣，她把人间万物都视为有灵性的生命，自得于身，拥有于心。有一次，她问我晚上可曾听到过青蛙的叫声，又指指池塘边长着的黄色野花，说这种花的名字是“青蛙的眼泪”。从此，只要见到水边黄花或者听到蛙声，我就联想到青蛙夜间哀怨的哭泣，和泪水变成的朵朵小黄花。

我们爱给花起名字。三色堇色彩艳丽，花朵像娃娃脸，上端的两片花瓣上，两个深褐色斑点，像极一双眼睛，我们叫它“阿霞的小眼儿”，对照阿霞的脸，贴切极了！有一种黄色的草本植物，只要用手指在靠花柄的地方一捏，两片花瓣就会一张一合的，我们一边笑着学它张嘴闭嘴，一边叫着：“老虎张嘴了！”从此这种花有了新名字“老虎嘴花”。如此类推，挤成一堆，每一茎开小小紫蓝色花朵的，是叫“满天星”了！在瓦娃的诱导下，我从小和许多花草结下不解之缘，认识它们，欣赏它们，和它们成了莫逆好友。瓦娃在美化我的生活的同时，开发我的想象力，让我体悟，所谓美，就是真实、自然和宽容的生活态度，这种美是无处不在的。终我一生，都坚持“勤俭”，这也是和瓦娃一起生活所养成的好习惯。小时候我的玩具不多，仅有的那些，不是瓦娃亲手所制，就是她教我利用废物做成的。初春时节，光秃的柳枝虽然还没有发芽长叶，但僵硬的枝条开始变得柔软，我们给柳树剪枝以后，把树枝抱回家，截断成二三寸长短，按粗细分开，盛在纸盒里。然后，我坐在地板上，用柳条搭建井字形高塔，底层用粗条，越往上用的材料越细。瓦娃走过来，夸奖我几句，有时我搭好的塔，被她的裙边“碰倒”了，她温柔地说：“对不起，佐雅，我看你只好重新再搭一个了。这一次会搭得更好更快！”或者说：“你要不要试试搭三个连在一起的塔，一个比一个高的？”原来她用这种方法培养我的专注和耐心。佳家喜欢吃德式酸菜猪脚，吃过后的骨头，用碱水泡过，再用刷子刷干净，用水冲洗，吹干，一颗颗骨头，大小不同，形状各

异，灵巧可爱。我会和来访的弟弟复成一起，把这些骨头按高、矮、大、小排列成一行，然后像打保龄球一般，来一个比赛，看谁打倒几颗骨头。我有几个可爱的洋娃娃，它们的衣服都是瓦娃教我用彩色手工纸剪贴成的，也有她利用零头剩布缝的。

每年的复活节和圣诞节，是小孩子最兴奋快乐的两个节日。复活节将到，我们忙于为鸡蛋染上鲜艳的彩色，不然就在煮熟的鸡蛋的外壳上，画上富有创意的图画。我的作品常常得到瓦娃的赞赏，因此画得更加卖力。复活节的前一天或当天清晨，瓦娃和我把彩蛋小心地藏在院中草地的隐蔽处。不久，小朋友来了，分头在花丛中和果树下寻找，“找到了”的欢呼声此起彼落。东北的冬季漫长，半年以上是冰天雪地，儿童的户外活动几乎全部停止。这个季节，最盼望的自然是圣诞节。应节的装饰品，几个月以前瓦娃就开始教我制作，以便在布置圣诞树时挂在树枝上。瓦娃为树下四周的装饰，更充分发挥了艺术才能和巧思：独出心裁地用棉花铺满树下，象征雪地，还留出一条通往一幢用纸板搭成的两层楼房的小路。圣诞夜，小屋里面的小油灯点燃了，温暖的光从糊着彩色透明纸的窗户里透出。小路上有赶回家过节的远方游子。不远处，一辆载着穿红袍的白发圣诞老人的马车，车上堆满圣诞礼物。

为了庆祝圣诞佳节，佳家所服务的中东铁路局，为员工眷属和子女举办一场盛大的庆祝会，都是在下午举行。富丽堂皇的大礼堂里喜气洋洋，到处飘扬着彩带、气球和各种饰物。为儿童准备的长方形矮桌上，摆满鲜花、精制的糖果、小点心和动物形状的饼干。为了参加这个盛会，瓦娃事先请来一位女裁缝师傅，为我设计缝制一件亮丽的衣服。印象最深的，是一件淡粉色连衣裙，上边点缀着用粉红色缎带卷成的花朵，配以浅绿色的鲜嫩小叶，用丝带连串起来。也在这一年，礼堂里布置了一棵人工造成的圣诞树，用高大的松树干做轴，再用间隔为二三尺的圆形木板围绕，树顶和圆木板的边沿插满新鲜的松枝。我被邀上台，和许多花枝招展的小朋友，坐在圣诞树下的圆木板上，缓缓转动。小娃娃一张张脸孔，笑眯眯，又是惊奇又是兴奋，成了圣诞树的组成部分，和树上一闪一闪的彩色小灯泡相映成趣。虽然时光已流过70余年，和我一起坐过活动圣诞树的小朋

友，一定和我一样记忆犹新。

瓦娃也喜欢把我装扮成男孩，穿上领子有蓝色条纹的白衬衫、蓝色短裤的水手装，头发也剪得短短的。有一次，也是参加儿童游园会，一位太太向瓦娃说："太太，你儿子的鞋跟踩落了！"其实，我穿的小白鞋的后跟，是被瓦娃剪掉的，因为我的左脚后跟碰伤了，不能穿有后跟的鞋。疤痕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脚跟上！

充满快乐的童年生活突然起了变化，当时我只五六岁，事先并没有察觉到。事情发生在凉意已重的深秋，早晨，天空灰暗欲雨。佳家、瓦娃和我像往常一样坐在长形饭桌旁吃早餐。佳家坐首位，低头吃着热腾腾的加了蜂蜜的牛奶煮杂粮稀饭。夫妻都没说话，餐桌上的气氛比平日凝重。瓦娃的态度和惯常一般温柔，她以安静的语调问我："佐雅，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旅行？"

就在那一天早餐后，我们提着几个衣箱，坐上早已在门前等待的马车，驶向哈尔滨郊区，入住一处叫"懒汉屯"的地方。没有争吵也没有眼泪，瓦娃和佳家以理智友善的方式，结束了数十年的婚姻。好多年以后，我已经懂事了，瓦娃有一次对我说过："夫妻不能分离太久。"她对佳家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她这句话让我记起，很久以前，有过一个晚上。我已入睡，忽然被客厅的声音吵醒，我悄悄地起来，走到客厅门口。一位漂亮的年轻妇人，和佳家有说有笑，状甚亲热。佳家看见了我，说："佐雅，回去睡觉吧！"那段时间瓦娃到奉天（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病去了。瓦娃离家多久，治什么病，我不知道，也没有问过。后来听说，那妇人是隔壁巷子里的，叫维纳格拉多瓦太太。这就是瓦娃和佳家离婚的原因了。

瓦娃1933年11月4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66岁。我正在北平慕贞女中读高三，听到瓦娃逝世的消息，冒着受日本鬼子查询的危险（东北在日军摆布下，已成立了傀儡"满洲国"），我由桂云陪同，连夜由北平赶回哈尔滨。走进东顺祥大院二楼我们的家，家中祥和的气氛依旧，只是不见我亲爱的瓦娃了。墙角圣母像前，小油灯依然散发温柔的光，古老的风琴仍在原来的位置上。墙上两幅深受瓦娃喜爱的画美好如初，一幅是用黑、

白、灰深浅不同的小珠子串缀在黑丝绒上的天使，正在俯视大地；另一幅是油画，一位老者吸着烟斗，悠闲自得地望着远方。靠墙壁的一棵大叶橡胶植物一派苍黛。什么都没有变啊！我哭着呼叫瓦娃，没有她的踪影，没有回声。

瓦娃的灵柩停放在希腊正教教堂中，四周围绕着黄色和白色的菊花。瓦娃神态安详，闭着双目好像睡着了。祈祷仪式过后，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吻她冰冷的额头，热泪滴满瓦娃的脸，我怎样呼唤，怎样哭泣，都唤不醒我最亲爱的瓦娃了。

神父扶起我，说："不要再哭了，让她安心地走向天堂去吧！"瓦娃入殓后，我伏在冰冻的坟土上，失声大哭。父亲在旁边不断安慰我说："聚聚，不要再哭了，哭坏了身体，你还有爹爱你关心你呢！"伏在我身旁的佳家说了一句："让她哭吧！"同时听到他的哭泣声。过了一阵，他悄悄对我说："瓦娃在我心目中是天使。"瓦娃埋葬在哈尔滨边区俄人坟场，离中国人坟场"极乐寺"不远。这两处地方听说早已被铲平，作其他用途。

这以后，由于连年战乱，我再也没有见过养育我的佳家了。八年抗战胜利后，我由四川回到南京，再到东北，才有机会见到了一别十余年的大弟复成。他告诉我，佳家的晚年，情形十分凄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苏维埃政府清洗沙皇时代的白俄贵族，先在国内，逐渐轮到在外国服务的人员。年老体衰的佳家失了业，花光积蓄以后贫病交加，同居的女人弃他而去。幸好，仁慈的瓦娃在生前所立的遗嘱中，把懒汉屯那幢房屋的三分之一产权给了佳家，其余三分之二由我父亲和我分承。佳家在晚年总算有一处避风雨的住处。复成弟还告诉我，中日战争的那几年，东北人民在傀儡伪满政府和日本军阀的压榨下，生活苦不堪言，连温饱都谈不上。那时，他见过佳家两三次，都是在冰天雪地的严冬：佳家走投无路，上门求食，父亲总是尽量把自己那一份浇上白菜汤的热高粱米饭给他。以后他没有再来。写到这，我热泪满眶，孤苦伶仃的老佳家，结局有多凄惨，可想而知。

懒汉屯是瓦娃和佳家分居后的两年，我和瓦娃度过孤寂生活的地方。

瓦娃过去拥有堪称美满的婚姻、充满笑声的家庭，如今面对的现实却这般冷酷。我年幼无知，没法察觉、也难以体会她内心所经历的煎熬。从此瓦娃把全部的爱和关注都放在我的身上，那一段日子在我一生中留下了最丰富的记忆、最深刻的影响。

哈尔滨地处北纬45度45分，一年结冰期就有190天，冬季长达七个月，气温常在零下30至40度。家中窗户都是双层，里外玻璃窗相距三四寸，严冬来临前，玻璃之间的空隙早已铺上木屑、木炭，上遮棉花，用来保暖和防潮湿；窗户四周的缝隙，也用木条密封。正门早已封闭，停止使用，木板门从里边用整块粗厚毛毡覆盖，钉死。我们家中养了一只纯白色长毛猫，是珍稀品种，它有阴阳眼，眼珠子一个蓝色一个赭色，它成了我寂寞中的良伴。

利用漫长的严冬，在偏僻地广人稀的懒汉屯，瓦娃开始实行有计划的家庭教育。她给我朗读许多世界上最美的童话故事，教我背诵童话诗（其中有些我到现在还能背得出来），教我画画、弹琴、唱歌，带领我从多方面去认识和欣赏自然景物，奠定了我终生对艺术的热爱。那时我六七岁，她最常读的是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作品，每次照例先由我背诵一段普希金的童话，作为开场白，然后瓦娃开读。事隔70多年，我对这一段诗句仍记忆犹新，琅琅上口：

У Лукоморья дуб зеленый, золотая цепь на дубе о том, и днем и ночю ученый все ходит по цели кругом. Идет направка- песнь заводит, налево сказку говорит.Там чудеса, там летний бродит, Русалка на ветвях сидит... И там я был и мед пил. У моря видел дуб зеленый, под ним сидел и кот ученый свои мне сказки говорил.

译文：在海湾边一棵苍绿的橡树上，系着一条金锁链。一只饱学的公猫昼夜不断，拖着金链绕着走；向左走——引吭高歌，向右——开始讲故事。那里充满新奇，那里，野兽在漫步。女妖坐在枝头上……我到过那个地方，也喝了蜜汁，在海边看到了绿色橡树，我坐在树下，听那只有学识的公猫，向我讲述它自己的故事。

接着，瓦娃讲《皇帝与三姊妹》《金公鸡》《渔翁与小鱼》《熊妈妈》《公主和七个矮子》《王子和燕子》等，这些不朽的童话故事，在风声呼呼的冬夜，被瓦娃富于情感的语调化为涓涓暖流，流进我幼小的心灵。

我们在懒汉屯的住所，是按照佳家和瓦娃的构想建造的半圆形平房，从前夫妻俩避暑休闲时居住，现在我们住左端有两房两厅的别墅式部分，其余四分之三租给一所俄国小学。大家都是从半圆形建筑的后面进去，如果以后门作正门，瓦娃和我的住房位于最右端，半圆形建筑凹进去的院子，成了学校的操场。建筑的四周有广阔的园林，树木苍绿有致。正门两旁有林荫路，一直伸展到一望无际的农田边沿，这里成了瓦娃和我牵着手朝夕散步、谈心、采花、赏春、踏雪的地方。我们住下来不久，有一天清晨，拉开窗帘，意外地发现昨晚下过大雪，满眼是皑皑的白色。光秃秃的黑褐色枯树，一棵棵戳在白茫茫的旷野，更显萧瑟。白天还好，学生来上课，嬉笑吵闹的声音不断，傍晚人散屋空，只有微弱的灯光从我们住处的一端，投在黑暗寂静的院落里。不止一次，瓦娃和我发现，下过雪的次晨，有明显的脚印，散布在我们家的正门前和窗台下，教我们产生莫名的恐惧。直到现在，每到黄昏，孤寂之感便油然而生，这就是懒汉屯那段和瓦娃相依为命的日子的余悸。也因这个原因，对门户的安全特别注意。

严冬过去，春天在我们的期盼下来临，到处都是生机和喜悦。封闭窗门的木条拆下来，重新打开。瓦娃迫不及待地带领我出门踏青去，寻找融雪后第一朵探出头的二月兰。在化冻的池塘边，还看到了“青蛙的眼泪”。花草虫鸟这些和我缔交终生的朋友，都是童年时代由瓦娃介绍而相识的。春天到来，瓦娃教我画的画，色调为之一变，构图柔和、亮丽，充满希望——近处，几栋白色小屋，门前一条小径，伸向湖边，蔚蓝的湖水中，几双白色天鹅悠闲地遨游；远处，浓淡有致的树丛，一抹远山似隐似现。这种诗情画意，在数十年之后，依然对我学习国画山水施以强烈的影响。到了夏天，浓密苍绿的林荫路上，常常出现瓦娃牵着我的手散步、背诵诗歌的身影。

住在懒汉屯，第二个秋季开始时，我突然发高烧，被火速送往中东铁路局附属医院，经诊断，我患的是正在儿童中间蔓延的猩红热。医护人

员把我的头发剃光，再送我进传染病房住下。病房很大，有两个大玻璃窗户，靠墙放着十多张病床，住满了患同样病症的儿童。瓦娃和父亲把我安顿好以后，离开了，我看着亲人远去，眼泪簌簌涌流，但不敢哭出声来。我感到头晕舌干，只想赶快躺下，闭紧眼睛。一群已接近痊愈的病童围拢在我的病床边，七嘴八舌，问东问西。几个顽皮的室友，拿来铅笔权当温度计，嬉笑着要量我的体温。忽然，传来大人威严的声音："нужно её повесить！"（需要称称她！）。我睁开眼，惊骇地呼喊："нет, не надо весить！"（不，不要吊我！）原来俄文单词" повесить"有两个意思：一是"称重"，一是"吊起来"，当然是虚惊一场。住院十天后，我可以起床走动了。差不多每天或隔一天，瓦娃都来看我，我像其他病童一样，早早就坐在窗台上等候。远远看到瓦娃手提装食物的篮子走来，我雀跃欢呼。传染病房外人不能进入，瓦娃就隔着玻璃窗和我开始用手比划，临走前她把带来的食物送到医护人员那里，委托她们转交给我。我最喜欢吃瓦娃烤的苹果，她把苹果带蒂一端挖开一个小洞，放进糖或蜂蜜，再把挖出的部分当盖子盖上，用牙签定牢，或烤或蒸，松软香甜，既易消化又富营养。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病全好了才回家。这所医院——中东铁路局附属医院，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清楚记得，我回家不久，正是秋天。储备冬季蔬菜的季节到了，家家户户开始用大白菜腌渍一大缸一大缸的酸菜。我家也一样，买来一大筐包心菜、一筐胡萝卜和洋山芋，放进厨房里面的地窖储存。那天正巧父亲来看我，他指着装包心菜的筐子说："聚聚，你又有了一个新弟弟，是从这堆包心菜中找到的。"他说的是我的二弟复钧。

四　瓦娃的明达——中国人必须上中国小学

我一到入学年龄，瓦娃就作了个最明智的决定：佐雅是中国人，必须接受正规中国教育。因此，她舍弃了邻近的俄国小学。她一边在家中教我算术，一边先送我到附近的中国私塾学中文。从前，我们和佳家同住时，我上的是俄国人开的幼稚园，我只会说俄语。这所私塾是萧老师开的，设

备简陋，土炕中央摆着方桌，师生盘腿而坐，老师坐对着门口的首位，学生分坐两边。陪伴我来的农家女孩，和我岁数相仿，是邻居的孩子，名叫老妞。每次上课，只有我和她两个。老师教《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也教当时小学课本上的内容——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等。懒汉屯成了我开始接受中国教育和学说中国话的地方。

瓦娃请我父亲协助，积极而慎重地寻找新的住所。她所着眼的，主要是附近有没有优良的中国小学。1922年（民国11年）夏末初秋一个下午，瓦娃带着我，离开居住了两年的懒汉屯，结束近似隐居的孤单生活，住进哈尔滨商业区——道里十六道街“东顺祥”大院，住所在二楼，有三个房间，厨厕俱备。我们乘坐一辆马车，跟随一辆装满简单家具和衣物的马拉大板车，缓慢地由后门驶进后院。

我年长以后，回想当年的情形，才透彻理解到，这时瓦娃自己心灵深处的创伤并没有痊愈，而如此果断地做了迁居的决定，完全是为了我的学业和前途。

始料不及的是，这次搬迁竟成了我生命的转折点，否则，我此生无法和孙家结下终生之缘。马车一驶进“东顺祥”的院子，我们就被住在这里的一群孩子包围了，围观者中有桂云和桂毓。一个洋太太带着一个中国小女孩，而小女孩穿的衣服和短发，又和他们的不同，引起他们的好奇。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我穿的是带白点的淡蓝色连裙洋装，下摆上印着许多敲鼓打锣的小人儿。在孩子们的注视下，我那份难为情和兴奋，现在好像还能隐约感觉出来。尽管不太懂他们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他们以后就是我的朋友和玩伴。

我们搬进新居的当天，一个梳着一条小辫子、发根缠着红头绳、穿着中国裤褂的小女孩，静静地站在我家敞开的大门外面，向里面窥看。她就是桂云，小名竹青。那年我八岁，她九岁。从此以后我以“竹青姐姐”称呼她。她不但是我的好玩伴，还成了我的小老师，她教我说中国话，带领我去上学，从小学到中学。我们一起度过欢乐的童年和彩色多梦的少女时期。

搬进东顺祥大院不久，我就跟着竹青姐姐到和家仅隔一条街（十五道街）的十四道街“第十六小学校”就读，开始接受正规的中国教育。开学前，父亲来看我，再三叮咛，一定要听竹青姐姐的话，她让做什么，就照着做什么，跟着竹青姐姐走，不能乱跑，还嘱咐我对老师要恭敬有礼。

哈尔滨的初秋，凉意已深，竹青姐姐小心翼翼地牵着我的手，迎着晨曦，踏着落叶，走向她已读了两年的学校。十六小学规模不大，名声很好，师资优秀，许多老师是由“关里”请来的“南方人”，教学方法新颖。我们走进校门，一位少女模样的老师正穿梭于学生丛中。她看到来了新生，便走到我们面前。竹青姐姐赶紧用手推推我，说：“这是老师，行礼！”我光顾端详对面的姑娘，没有反应。竹青姐姐连忙再推了推我：“行礼，行礼，这是老师！”我小声对她说：“这是大姑娘啊，怎么——”在我的想象中，老师必须是个老头儿，像懒汉屯教私塾的萧老师那样，只会盘腿坐在炕上。

接着，我们这些新生在一间很大的教室里就座，每张供两个人坐的书桌前，挤着四五个孩子。女生都梳着扎红绳的小辫子，只有我不同——短短的头发上戴着小帽子，身上穿着同料同色的长及膝盖的外套。一会儿，一位男老师登上前面高高的讲台，开始说话，他说的中国话我听不太懂，只见他招手喊我，我由座位中间挤过去，到讲台前面，仰头看着他。他忽然问我：“你是‘小子’，还是‘蛮子’？”我不懂什么是“蛮子”，但知道“小子”是“男孩”的意思，因此猜到他问我什么。我低着头，吞吞吐吐地回答：“我是‘蛮子’。”多年以后我才弄清楚，山东人和其他有些省份一样，称小女孩为“妹儿”，“妹”在山东土音为“蛮”，但说不定当时老师看我装扮不同，故意开玩笑地喊我“蛮子”，含有“外来异族”之意。我被分到一年级。其实，我的数学和常识的程度足够读二、三年级，因为瓦娃在家里已教了很多。

东顺祥大院是正方形的四合院，前排是一幢三层楼房，面临通往松花江畔的新城大街，但只楼下四个临街单位有门开向新城大街，这一栋的其他各层楼的住户，以及左、右两排和后排平房住户，都由十六道街后门出入。从后门面向大楼看，最右一侧是房主孙家兄弟所经营的五金杂货店，

宝号“东顺祥”，“东顺祥大院”因此得名。它的隔壁是一家经营脚踏车的商店，左边拐角两个单位及二楼一部分是一家名叫“幻想”（俄语：фантазия）的西餐店，由一位白俄经营，类似夜总会，晚间可跳舞，还有表演。正楼左右两旁及对面都是平房。右边一排是“幻想”餐厅的厨房、储藏室等，左边及对面平房住着几户人家。孙家是左边靠后门的第一家，孙家二叔一家也住在这里。

“东顺祥”是名副其实的大杂院，后院相当宽敞，“幻想”餐厅在院子里还建了一个大冰窖。那年代没有电冰箱，每年松花江解冻前，“幻想”餐厅为夏季消暑而订购的巨型冰块，用大板车一车一车地运进后院。冰块入窖前，小山一般堆在院子里，成了孩子们游戏的乐园。我和桂云不放过机会，手持彩色手帕在冰块上跳跃，载歌载舞。进入冰天雪地的漫长冬季，大院的孩子们会同心协力，在院子中间，把积雪堆成七八尺高的冰橇台，再平成坡度和缓的长滑道，形状如台湾的溜滑梯台。最困难的工作是把一桶桶水浇在雪堆和斜坡上，直到形成坚硬如石的平坦冰坡。这以后，每天还要不断浇水，使之保持平滑。冰橇台搭好后，孩子们手提自制的小雪橇（用木板拼成，底部钉铁条），轮流由冰台后边登级，在最高处，或坐、或卧、或立，溜下来。孩子们欢笑，高呼，喧闹声充满大院，打破北方冬天的沉寂和单调。

桂云的哥哥桂籍，小名“震洋”（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是民国前一年出生的。他当时已在广益小学校读六年级，虽然比桂云和我只大两三岁，但给我的印象是“高不可攀”。他自视也高，完全是个有抱负的“爱国青年”的架势，十分神气，很少理会我们。次年（即民国12年）他就读的小学扩充为中学，他成了第一届中学生。该校是哈尔滨的第一流中学，采用新学制，多数教师由北京师范大学重金聘来，皆一时俊彦，他们对哈尔滨的启蒙和教育革新贡献很大。许多年以后，桂籍还常提起一位教历史的孟老师，是前清秀才，后来参加革命，成为同盟会会员，他讲述中国历代兴亡和东北受侵略的惨况时，声泪俱下，给学生留下难忘的印象，并影响学生的终生。

桂云的弟弟桂毓，是1916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出生的，因此小名叫

重阳，比我小两岁，比桂云小三岁。桂毓小时候瘦小孱弱，动不动就哭，老当妈妈的跟屁虫。有一年冬天，我们一群孩子在院子里抛雪球，不知为了什么事，我和桂毓争吵起来，我顺手撕掉了他头上戴的新毛皮帽子上一个护耳，他蹲在雪地上号啕大哭，不肯罢休。院子里的玩伴，还有伊戈，他是白俄，从小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他的父亲经营一家书店，一家三口是桂云家的近邻。伊戈强壮有力，不喜欢讲话，所有体力活，像冬天提水浇冰橇塔，他都默默地干，从无怨言。秋红的岁数比我们都大一些，梳一条过腰的长辫子，发根缠的红头绳比别人的宽，喜欢穿色彩鲜艳的花布裤褂，十分抢眼。秋红家在三楼，就在我家上面，我每天清晨上学前，都到她家，让她妈妈给我梳小辫子。我的头发太短，很难梳拢，学校里规定女学生一定要梳辫子，瓦娃无能为力，只好请秋红的母亲代劳。她每次给我梳头发，先在头发上涂上“刨花水”（所谓“刨花水”，是把一种有黏性的木材刨成薄片，泡在水中，作用类似现在的“发胶”），扎起左右两条羊角辫，缠上红头绳。有时候，和我们一起的，还有脚踏车店的两姊妹，她们的后母很凶，年纪虽小，但煮饭、洗衣一类家务都由她们做，很少有空闲的时间出来玩。孙家二叔的宝贝儿子桂荣，小名跟养，年纪太小，跟我们玩不到一块。院子里还有其他小朋友，已不记得名字了。

五　“东顺祥”大院主人孙宝书先生，孙府家世

东顺祥大院的主人孙家户长孙宝书先生，字省三，后来成为我的公公，他就是桂籍的父亲，宇同、宇立、宇昭兄妹的祖父。瓦娃和我由懒汉屯迁居东顺祥大院那年，他不到50岁，是受人尊敬的仁厚长者。身材不高，结实健壮，两目炯炯，十分威严。他性格爽朗、豁达，讲起话来，声音洪亮有力。他的思想进步，爱国，富正义感。桂籍于1965年在“国防研究院”受训时所写《自述》中，曾这样描述他的父亲孙宝书先生：

> 先父刚强豁达，茶余酒后，乐道大彼得、俾斯麦、伊藤博文等俄德日各邦维新轶事。对彼时中国官场腐败颟顸，时扼腕太息；对国父孙中山先生暨先烈黄克强、宋钝初，言下窃深表敬佩。说国家文明维

新之道有“要考究实学，大家守法、讲理、知耻、莫忘根本”数语，言犹在耳。先父至孝，勤劳节俭处异乎同侪缙绅。市居，严冬子女皆必轮班扫雪。还乡，尝命余负粟六升，往十里外集市，亲手卖粮，换铜钱数十吊，再买鲜鱼回村为家人添菜。农忙，必到田间帮工或送饭。虽在乡小住二三个月，余亦必入村塾叩圣牌，补习国文。曾遣余聆听塾师讲易经阴阳消息、元亨利贞之道，时余方十岁，茫然莫名其妙……

宇同兄妹的祖母孙于氏，是位温顺体贴、处处忍让、不多言语的小妇人，1935年（民国24年）在山东老家逝世时，不过40余岁。她嫁到孙家时是“填房”（继室），“先房”郝氏逝世后留有三子二女；长子桂馨，次子幼年夭折，三子桂山，另有二女桂香和桂美。桂籍排行老四，桂毓为老五。桂籍还有一位哥哥，为于氏所生，小名孟阳，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在港、台的郝姓亲戚如郝如九、郝铭三、郝晋谱，都是先房郝氏方面的亲戚。桂馨、桂山较桂籍年长许多，都在东北及天津一带经商，颇有积蓄，同父异母兄弟之间感情融洽。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桂籍受政府派遣，以“接收委员”的名义返东北，途经天津，得以会见多年不见的三哥桂山，桂山以有弟能光耀孙家门楣而骄傲。桂籍兄妹的外祖父，祖籍山东潍县，寄籍旅顺，经商远至俄国海参崴，人多称他“于五爷”。桂籍的母亲居长，另有弟弟一人及继母所生的两个妹妹。桂籍的外祖父我没有见过，听说交游甚广，为人潇洒、慷慨。但见过桂籍的舅舅、二姨和三姨，小时候的印象，桂籍的母亲处处以长姊的身份照顾她的弟妹们，二姨和三姨的婚事由她做主。后来二姨夫（曲铭三）事业发达了，在哈尔滨拥有几个面粉厂，还有数艘轮船在松花江行驶，跟着家里添了两三个姨太太，家庭纠纷时起。道外大舞台戏院常有演出，除了平剧，也演“文明戏”——话剧，二姨夫在那里常年订有包厢，桂云和我也常和大人被邀去听戏。三姨出嫁后又离了婚。舅舅是于家独子，从小被娇纵，长大游手好闲，这些都是桂籍母亲的烦心事，加上孙家家人的闲言闲语，受到的困扰更多，但她处处退让。桂籍在他《自述》中提到他的母亲时说：“先母晚年体弱多病，子女游学远飏，光景寂寞，居家对亲戚委屈忍让，感人至深。维今，

故园庐墓荒芜，国难未平，事变方殷，缅怀慈亲鞠育之恩，曷胜愧怍。”桂籍母亲逝世时年不满五十。随着年龄的增长，桂籍思亲之情益发殷切，每逢年节，常见他独自默念，黯然泪下，我也感伤不已。

孙家祖籍山东省掖县，世居县北的麻渠村。掖县濒临渤海，为胶东平原富饶之区，居民世代务农。桂籍在他的《自述》中说：

> 先祖父瑞麟公，先祖母王氏，忠厚仁慈，见重于乡里。先父讳宝书，初在故都北京麻刀铺营造行习商，未久，出关自营致富，卜居哈尔滨市。壮年产业多处，散在松花江以北，远及边陲，在故乡麻渠村增殖良田数百亩，广拓祖居，为疃中首富。

据我所知，宇同兄妹的祖父不但在东北有产业多处，他旅居俄国海参崴多年，在该地的商业区也颇具声望。桂籍、桂云和桂毓都是在海参崴出生的。他们全家直到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才离开该地，途经日本返国，定居哈尔滨。后来，桂籍的母亲叙述他们乘坐日本轮船离俄返国时，中国乘客遭受日本人的凌辱的情景：桂毓年幼，爱哭闹，触怒了一位日籍船员，他挥手掴了桂毓一个耳光，当母亲的只有忍气吞声，不敢有所表示。这位娴雅瘦小的妇人在有生之年，每次提到这件事，眼神依然充满屈辱和愤恨。他们定居哈尔滨那一年，桂籍六岁，开始上“直鲁豫同乡旅哈小学校”（后来改成“广益小学校”）。

那时候，我笼统地称呼桂籍的父母为“大大”，而不是“大爷”“大娘”，需要分辨的时候，我会很自然地叫“男大大”或“女大大”，这是我初学中文的缘故。在语言上，我还闹了许多笑话，诸如把“戴帽子”说成“穿帽子”。桂籍、桂云和桂毓也随着我，称我的养母为“瓦娃”。两家相处得十分融洽愉快。我有了这么多玩伴，再也不感到孤单寂寞了。

搬到东顺祥大院以后，我的中文进步很快，在小学校的成绩很快就赶上了班上的同学，名列前茅。孙家教育子女的规矩很严，任何时间，父亲一进门，子女马上停止言笑，起立问安，再垂手旁立。遇到这种情形，只有我仍坐在原处。“男大大”走过来，摸摸我的头，对我笑笑，逗逗我。我还记得，有一次“女大大”对人开玩笑，说：“我们家可娶不起这个媳妇啊，完全外国脾气，就喜欢吃巧克力糖。”（是指给桂毓做媳妇）。就

在那个时候，我从孙家长辈的交谈中知道，桂籍在山东乡下老家有一个从未谋面的未婚妻，姓史，是孙、史两家老人指腹为婚的结果。

搬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一眨眼我已读完了六年小学。当时的小学是“四二制”，即小学四年，高小两年。上到高小，课程中多了英文和古文。我在1928年（民国17年）毕业，那一年北伐成功，不久东北易旗，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改成“青天白日满地红”，归顺中央政府，全国实现统一。这一年桂云在哈市第一女子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桂籍则于前一年，即1927年（民国16年）考入东省特别区立法政大学预科。当时东北的政治环境十分艰险复杂，他年方十七，仍奋不顾身，秘密参加了国民党，投身革命，领导学生运动，奔走呼号，呼吁全国团结，共同抵御外国侵略。哈尔滨街道上，中、大学生及群众不时举行游行及演讲。有一次，日本计划修筑吉会铁路（从永吉到朝鲜边界会宁），以便由朝鲜直接运兵，侵略东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哈尔滨爆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那时我还读高小，小学生不准许参加游行，经我向桂籍大哥哥再三要求，他终于答应，游行队伍绕道到十四小学大门前，敲锣打鼓，硬把我们接进游行的大队。我随着队伍走到道外一处广场上，看见桂籍站在高处，对挤满四周的人群慷慨激昂地讲话。一大群警察开来，手拿枪、棍，连推带打，把人群驱散。我魂飞魄散地回到家中，牵挂着桂籍大哥哥的安危，却不敢向家人透露。小学的中国历史科中有关朝代的更换，我一直弄不清楚，瓦娃请桂籍来给我补习，每周一两次，有时他也讲解古文，彼此有了接近的机会，也更加深了我对他的钦佩和敬重。美术科杨老师知道我对绘画的兴趣浓厚，每个星期六也到家来教我写生。

六　哈尔滨女一中——我的少女时光

小学毕业后，我和桂云顺利地考进哈尔滨市立女一中初中部。入学前桂籍建议，把我原来的名字“玉莲”改成“郁廉”。他说，“郁”有“文采美盛”之意，“廉”是清清白白，我父亲表示赞同。我从上初中到今天，都以“郁廉”为名。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桂籍开始“在乎”我。

我和桂云又像小时候那样，清晨一起上学，傍晚一起回家。女一中在南岗区，离我们家不近，往返都要乘电车，一程需半个小时以上，有一段路还要步行。

女一中是哈尔滨两所女子中学之一，但女二中的名气远远不及女一中。女一中的孔校长（学生们私下称她为“孔大牙”）是哈尔滨妇女运动的领导者，甚受各界和学生们的敬重。民国十八、十九年间，哈尔滨女一中出尽了风头，因为运动比赛中屡夺冠军，参加田径赛的“五虎队”，更是所向无敌。“五虎队”成员有孙桂云、王渊、刘静贞、吴梅先和萧淑贞，而以孙桂云最为出色。北伐胜利后的第一届全国运动大会在杭州市举行，其时为民国19年5月，各省及特别行政区都组队出阵。开幕典礼时，蒋介石总司令亲临会场致辞，全场爆满，气氛极为热烈。事隔50余年，台湾《联合报》于1984年3月31日还刊发《历史镜头报导系列》，以《中国体育的早春》为题，记述当时盛况：

> 民国十九年第一届全国运动大会，以田径赛为大会最主要项目。事前，大家认为上海市队最具夺标希望，结果男女总锦标分为辽宁省和哈尔滨市获得。辽宁省的刘长春与哈尔滨市的孙桂云各获得四面金牌，为大会风头最健人物。孙桂云获本届“全运之花”的荣誉。孙桂云除运动成绩优异外，其容姿秀丽，谈吐甜美，深为一般人所喜爱。

桂云还代表中国参加过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亚洲运动会。她的100米及200米的全国短跑纪录，保持了十多年，无人打破。桂云从第一届运动会抱回金牌、银盾、银杯、奖品和各式纪念品，由沪返哈，受到哈尔滨各界英雄式的欢迎，名字风靡全国，报纸杂志上不断刊登她的消息和照片。上海为表彰她，命名了“桂云桥”“桂云路”，还在衬衫、毛巾、手帕上印上她的照片。仰慕、追求的信件自全国各地甚至从美国纷纷寄来，有的信内附上仰慕者的照片。

胡震夏（伯威）就是狂热的追求者之一，他远从浙江绍兴寄信来，数年不断。每天下课后桂云和我可有事情做了，躲在一角拆读陌生青年人的来信，常常会相拥大笑不止。桂云也说些参加运动会时的见闻：哈尔滨去的女运动员在衣着方面最新潮、最抢眼，除了身材矫健外，每人头戴米

黄色法式帽，身穿同色外套及短裙，足蹬米色马靴，神气十足。参加比赛时则改穿圆领短袖、绣“哈尔滨”三字的白色衬衫，深色短裤，白袜白球鞋，全场观众的眼睛为之一亮。反观全国首屈一指的都会上海，派出的女运动员穿着长袖衬衫和齐脚面的“灯笼裤”，裤脚紧绑着，老气横秋。桂云除了勤练短跑外，生怕被他人讥笑为“脚比脑好使”，对学校课业也不敢掉以轻心，常见她手捧古文课本背诵。桂云的中文根底深厚，文笔流畅，这得力于苦读。初中三年，桂云在运动场上春风得意，而我埋头读书，课业成绩一直领先全班，课余在家补习俄文。瓦娃仍利用闲暇或睡前的时间为我诵读，但不再是儿童故事和童话诗，而是俄国古典文学名著，以及言情小说和诗词（附录二）。瓦娃最喜欢对我读普希金的诗和烈尔曼脱夫的《我们时代的英雄》，还读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至于托翁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瓦娃说太长了，让我以后自己慢慢读。我到现在还拥有这部长篇的原著四大册。我和桂云不放过任何娱乐和学习节目。每年冬季白雪覆盖大地时，我们不再玩冰橇台的游戏，利用寒假，每天提着溜冰鞋到溜冰场学习溜冰。哈尔滨的夏天虽然很短，但瓦娃不放过难得的机会，带着我和桂云到松花江北岸“太阳岛”去晒太阳、学游泳。瓦娃也带着我们参加俄人组成的短程旅行团，乘火车到哈尔滨附近的小村镇度周末，欣赏大自然的景色。

在东顺祥大院，九年欢乐而充实的童年和少女时光转瞬过去，我和桂云长成大姑娘。1931年（民国20年）6月我初中毕业，桂云已读高中，桂籍于一年前（1930年）读完法政大学预科及本科一年级后率先离开哈尔滨，转学到北平入国立北平大学商学院二年级，主修经济。我和同班好友林楚华、衣家瑛三人早已仰慕以注重学业、管理严格闻名于全国的天津南开女中，初中毕业前我们就开始筹划，并和家人商量。最后还是瓦娃说服了我父亲，我才得以如愿成行。在当年那是一件大事，却没有想到我这一走就永远离开了东顺祥大院，离开了生长的哈尔滨，也结束了我和瓦娃的因缘。两年后，瓦娃孤单、寂寞地辞世，我永远失去了亲爱的养母。

一直到现在，我还在后悔，为什么自己那么轻易地离开了养育我的瓦娃？她当时已年迈多病，正需要有人陪伴扶持；而我年少无知，脑子充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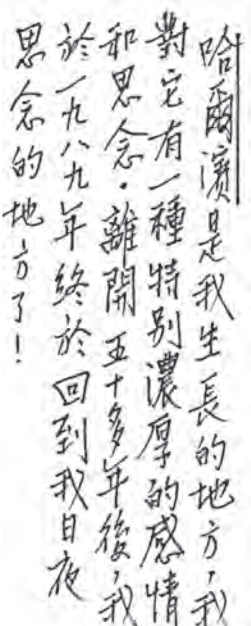
对未来的幻想，一心想学医做医生，济世救人，报效国家，根本没有想到严重的心脏病随时可能夺去瓦娃的生命。我后悔，为什么没有留在哈尔滨瓦娃的身旁读完三年高中再走？若然，她可能不会那么快就离开人世，临终时也不会那么凄凉、孤独和无助！

收拾行李，即将离开东北，我才知道我对这块土地的感情有多深。东北地大人稀，是全中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大豆、高粱等农产品闻名全国，煤、铁、金、水泥、畜牧和森林均为全国之冠，镁矿储量为全世界第一，后来还在大庆发现了储藏量极丰富的油田。世界列强对它虎视眈眈，日、俄两个邻国更是垂涎，伺机侵略，无日或忘。渐渐地，东北成为日、俄两国钩心斗角、抢掠和分赃之地。东北对外关系比全国其他地区复杂，纠纷也多。战争时起，受蹂躏的总是东北的老百姓。1689年，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划定国界，外兴安岭以北，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以西的土地归俄。三百年来，中俄关系极为复杂，几乎全与东北有关。近代中俄关系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东北被侵略史。鸦片战争以后，俄国又乘清廷忙于平定太平天国之机，兼以外患相逼，于1858年订立《瑷珲条约》，强迫将我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割给俄国，并划定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为“中俄共管”。两年后（1860年），俄国又以“调停中国和英法联军有功”为由，要求报酬，订定《北京条约》，要我将上述共管之地送给俄国。1895年中国因甲午战争失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这是日本与中国东北发生关系的开始。俄国不愿见日本势力侵入东北，乃联合德法两国压迫日本，要它允许我国备款赎回。清廷一心联俄制日，李鸿章以庆贺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为名赴俄，俄以在中国东北“接路”为条件，迫使清政府签订共同对付日本的军事密约。俄人乃于1898年以哈尔滨为起点，分别向满洲里、绥芬河，以及旅顺、大连三方面铺设中东铁路，1903年以闪电方式完成，将铁路作为俄国在东北的重要侵略工具。中东铁路全长2430公里，以哈尔滨为中心，中东铁路管理总局即设于此地。越一年，即1904年，日俄发生战争，俄国战败，擅自将旅顺、大连及长春以南的铁路权（即南满铁路）让给日本，给东北引来另一个侵略者。自此时起，东北成

了日本朝夕图谋的肥肉。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苏维埃政权曾声明放弃中东铁路的权利，允许我国备款赎回，后又找借口食言。处心积虑的日本，终于借口南满铁路被炸，于1931年（民国20年）9月18日夜进兵沈阳北大营，悍然发动战争，迅速占领了东北，此即“九一八事件”。后苏联未征得我国同意，将中东铁路北段（北满铁路）擅自售予日本，得款一亿四千万日元。“九一八”后，整个东北沦陷。六年后，1937年7月7日，日本以东北为根据地，在华北发动卢沟桥事变，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导致了我国八年抗战。

近三百年间，我们的父兄和我们自己，身受日俄列强的侵凌、奴役、杀戮，都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尽尝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苦，眼看着自己的祖父辈胼手胝足地建立的家园和事业毁于一旦，能不义愤填膺？正因为我们是在国仇家恨中长大的，所以具有坚毅、独立、扎实、勤劳、合群的性格，具有比他人更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在大时代的激流中不迷失方向。

白山黑水——我的童年和少女时光（1914—1931）Ⅰ



旧日松花江畔

旧日太阳岛风情

白山黑水——我的童年和少女时光（1914—1931）Ⅱ

懒汉屯的家，瓦娃和我在这里度过孤独、寂寞但温馨的三年时光，门窗木框依旧（摄于1989年）

瓦娃和我住在二楼左手第三、四、五窗内的房间（摄于1989年）

孙宝书兄弟经营的东顺祥五金行（位于临大街一楼，摄于1989年）

东顺祥内院是我与好友童年的乐园（摄于1989年）

七　天津南开北平慕贞，战云笼罩的动荡青春

1931年（民国20年）6月，我从哈尔滨女一中初中部毕业，匆匆忙忙和同学林楚华、衣家瑛赶赴天津。三个人都是第一次离家远行，心中既紧张又兴奋。由哈尔滨出发，乘坐南满铁路的慢车，摇摇晃晃走了两夜三天。到达天津，那里没有熟人，只好自行雇车到南开女中，住进学校的宿舍，那是为补习生准备的，还包伙食，一切都妥当地解决了。

南开是一所私立学校，为全国名校，包括男、女中学及大学，学校的师资、设备、环境、管理及教学方式，都具独到的风格。南开中学毕业的学生投考大学，每年98%以上的学生都能考取理想大学，录取比例在全国占第一位。这也是我千里迢迢来投考南开女中高中部的主要原因之一。

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女中、南开男中及南开大学的创办人。1898年，天津的严范孙先生聘请张伯苓为家庭教师，至1908年，把私塾改称为“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创办于1919年，而南开女中到1923年才成立，1928年还增设了小学部。张伯苓先生也是这三所学校的校长，他坚守“教育救国”的宗旨，献身学校教育五十余年。

我们进南开女中的暑期补习班补习两个月（七、八月），再经过考试，于9月1日被录取为天津南开女中高中一年级的正式学生。万万没有想到，正式上课还不到三个星期，“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关东军以“南满铁路线柳条湖附近发生炸弹爆炸”为借口，向我国的军营——北大营发动猛烈进攻，同时炮轰沈阳城，第二天（19日）清晨即挥军占领沈阳。我们的政府对“九一八”事变采取了“不抵抗”“不交涉”的错误政策，姑息纵容日本，日本关东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各重要城市。哈尔滨于1932年（民国21年）2月5日失陷。不久，日方将清废帝溥仪自天津挟持到东北。1932年（民国21年）3月9日，在长春成立了“伪满洲国”，扶植傀儡溥仪为“元首”，郑孝胥为“内阁总理”。从此东北12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完全被日人所控制，东北数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东北与中国关内交通、通讯也完全停顿。

我们三个远离家乡的哈尔滨女孩子听到这些消息，惊慌失措，痛哭失

声，一方面担心家人的安危，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前途益发茫然，不知何去何从。这时平、津等地民众和学生，对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大表不满，发起一波波游行示威。工人和学生停工停课，活跃分子上街演讲，要求立即对日宣战，一群群青年人卧轨，阻挠南下的铁路，以示抗议。我们所在的南开女中虽然继续上课，但除严禁住校学生外出以外，对有家在天津的走读生，不再勉强她们来校。（和我同班的余梦燕同学，就是这样的本地学生，她从那时起和我成为朋友，直到1990年的今天，相交近60年。）这种情形维持不久，一天清晨，忽然传来一阵枪声，子弹穿窗而入。舍监急忙把宿舍的同学领到地下室，命令大家卧倒。以后数日，外边的枪声加剧，全体师生躲在黑暗的地下室，与外界完全隔绝，食物供应渐渐成了严重问题。学校当局权衡全局，经谨慎考虑，万不得已，决定南开三校全部停课，护送学生离开天津，疏散到安全地区。

后来得知，当时天津的动乱，是日寇实施的阴谋，他们在占领东北地区的同一年（1931年）11月，由日本特务大头目土肥原唆使浪人，勾结汉奸，组织便衣队，两度在天津策动纠纷和暴动，制造口实，以便日后进一步进犯我国的华北、华南地区。

回顾历史，“九一八”事变对中国命运的影响至巨。以后长达八年的中日战争、四年的太平洋战争，均以它为开端。没有“九一八”，就不会有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没有“八一三”淞沪会战，以及以后的巨大变局。

我、林楚华和衣家瑛三个来自哈尔滨的住校生，于学校停课后，没有亲友可以投靠，只好加入疏散队伍，被学校护送到火车站，离开天津，到了北平。我们对北平完全陌生，除了桂籍大哥，城里并无亲戚朋友。桂籍先我们一年到北平就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住在学生宿舍，他自身难保，怎么能照顾我们？好在衣家瑛灵机一动，想起她父亲有个姓赵的老朋友，住北平西单牌楼附近。三人只好投奔衣家瑛的赵二大爷家，请他暂时收留我们。赵二大爷祖上是官宦人家，世居北平，宅地宽敞古朴，有数进四合院房屋。他是否属旗人，不得而知，但他家中的生活方式、礼法、规矩多沿袭清代满人习俗。赵二大爷六十开外，家中“赵二大娘”竟有三位，好

像没有子女。他们全家欢迎我们暂住，对我们十分客气，把我们三人的住处安排在四合院内相邻的房间。北平有钱且又闲的阶级，一般有晚睡迟起的习惯，赵府也不例外，全家近午才起床。午饭后，赵二大爷在书房中以琴棋书画自娱，或者和来访的老友品茗、下棋、打牌。到了傍晚，赵二大爷在几位"大娘"轮流伺候下，悠闲地吸上几口鸦片烟，养足精神。晚饭后到戏院听京戏，吃夜宵，我们也被邀，跟着去听过一两次戏。至于日本不断的侵略和动荡的时局，对他们好像毫无影响，从未听他们提起过。难忘的是，在赵府从早上到中午这段时间挨饿的情景。赵府不开早饭，一上午全院鸦雀无声，上下都在酣睡。我们三人躲在屋子里，既不敢大声讲话，也不敢外出购买食物（那年代根本没有女人在食摊或小店吃东西），怕惊醒所有人。唯一的办法是猛喝水，填满咕噜作响的空腹。我们在赵府大概住了两个多月，到1932年1月，北平各中学的寒假结束，即将开学时才离开。

我们三个人经过多方打听和考虑，各自选定了适合自己条件的学校：我决定转学到北平私立慕贞女中，插班读高一下学期。衣家瑛选读北平志成中学，林楚华转读哪个学校我已记不清，她是广东人，可能回故乡去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失去了联络。想当初，三个志同道合的好友，鼓足勇气离开家人，远赴天津，战争竟无情地将我们分开，从而铸就不同的人生命运。衣家瑛皮肤微黑，有一双忧郁的眼睛，同学戏称她为"黑美人"，她个性内向，沉默寡言，读书成绩比我们两个都好。她从志成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我考取的私立燕京大学邻近，都在北平西直门外海淀区，因此，我们经常有往来。她入学不久，清华就有不少男同学对她表示好感。高她两级的靳姓男同学对她展开猛烈的追求，千方百计地纠缠，教她心慌意乱，无法专心读书，因而患上了精神衰弱症，只好休学，躲到赵二大爷家。她康复后回校上课，和靳同学的感情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式谈起恋爱来。一年后，即1937年（民国26年）爆发"七七卢沟桥事件"，日本进犯平津，北平各学校停课，学生结队随政府向后方流亡。这时衣家瑛和靳订了婚，两人一同离开北平，到了重庆。我在重庆遇到衣家瑛，她告诉我，她在和重庆隔着

嘉陵江的北碚一所中学教书，她的未婚夫则去了美国深造，她也计划到美国去。以后又听说，衣家瑛被未婚夫抛弃。靳某在美和新欢结婚，她受此打击，精神失常。抗战胜利后，她哥哥衣家弟专程由哈尔滨到重庆去，把疯得不成样子的衣家瑛接回老家。

北平私立慕贞女中是教会学校，和邻校汇文男中同属美以美教会，是"姐弟校"。两所学校附近，还有一座基督教教堂。慕贞女中历史悠久，始建于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年），以管教严格著称，由正当盛年、博学多才、获有科学学位的郑乃清先生任校长，负责教育及行政工作，并亲自执教高中的理、化课程。由美籍女传教士教授英文、体育及宗教课程，并负责训导工作，数学、国文等课程的老师则多半聘请燕京大学的毕业生担任，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我选读慕贞的主要原因，是学校环境和宿舍设施很好，我可以住校。慕贞女中坐落在北平东单牌楼船板胡同底，靠近崇文门及城墙。高中生宿舍在二楼，离城墙最近，卧室窗外有宽而长的走廊，四周钉有纱窗，每到夏季我们就把室内的床移到走廊，夜里躺在那里，数着天上闪烁的星星入睡，既凉快又富情趣。城外的火车驶过的隆隆声，在清晨和深夜里特别清晰，往往引发我对瓦娃和家人的思念，泪水流湿枕头。我很快就适应了新学校的一切，赶上了高一下学期的课程进度。

按校规，住校生每周只有星期六下午可以外出，但须准时返校。星期日被教会规定为"安息日"，学生不能外出，连打球、运动及洗涤衣物都在禁止之列。因此，我把全部精力灌注在课业上，慕贞女中就学两年半，各课成绩均为全班之冠，连绘画作业也被作为班里的荣耀，悬挂在会客室的墙壁上。学校里一位先教体育后来改教英文的美籍教师"瑞教士"（Miss Radley），对我特别有好感，常常在周六外出日，邀我到青年会吃西餐，还不时把花或短笺放在我寝室的书桌上。每天早晨我去上课，她必站在我经过的通道口，向我说声："Good Morning！"这件事很快传遍全校，同学们对我注意起来。我对她这种反常举动十分反感。为此，郑校长召见我，对我说，他也认为瑞教士的行为过火，但劝我忍耐点："你毕业在即，就要离开学校，最好给她留些面子。"

在慕贞女中上高中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我并不情愿离开南开。出生20

年来，我在这里，无论在生活上，还是精神上、感情上，所遭受的折磨都是最残酷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我和远在哈尔滨的家人失去联系，连经济供给也完全中断。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同年（1932年）盛夏六月，桂籍的母亲领着桂云和桂毓，由沦陷的哈尔滨迁居北平，租住东城东总布胡同10号。我放暑假时也搬去和她们同住，半年后才返回慕贞住校。

桂云来到北平，考取女子师范大学前，利用暑假去补习，认识了胡震夏（字伯威）。有一次胡震夏送桂云返家，桂云告诉我，胡是她补习班的同学，功课全班最好，尤其是英文和数学。以后才知道，胡震夏那时已是海关学校大三的高材生，为了接近桂云才去补习。原来他就是那位数年来不断由浙江绍兴写信给桂云的年轻人，真是用心良苦！又过了数年，这对有情人终于结成连理。而桂毓考入慕贞高中附近的私立汇文男中高中部。

桂籍的母亲在桂云、桂毓就学问题顺利解决后，安排了两人住校，从此三个子女都在北平，可以互相照顾。她便安心地离开，返回一别数十年的山东掖县麻渠村老家，那是1933年初。她实在别无选择：长住北平生活不易，哈尔滨又回不去，山东老家的大家庭成员钩心斗角，生活条件又差，她自己体弱多病，很难适应。桂籍的父亲还留在哈尔滨照料产业及生意，也让她牵肠挂肚。子女不在身边，没有一天不感孤独。

桂籍于同一年（1933年）6月从北平大学商学院毕业，正计划赴首都南京就业，忽然接到由山东打来的加急电报，说他母亲病重垂危，要他急速返乡。他匆忙离开北平赶到老家麻渠村，才知道“中计”——家人骗他回来，好和早年长辈指腹为婚的女子成婚。这场婚礼被他称为“荒谬、不公平”，在传统道德、礼教观念、道义、亲情和恩情的重重围困中，桂籍无计可施，硬着头皮娶了从未谋面、毫无感情可言的“未婚妻”史姓女子。我知道桂籍在山东突然结婚，感情确实受到很大的挫伤，只好强忍眼泪，把痛苦深藏心底，我立誓要把和他那段纯情的初恋彻底忘掉！史姓女子也是旧礼教的受害者，她长桂籍一二岁，毕业于掖县县城的师范学校，从小患关节炎，病痛不断。有名无实的婚姻，同样使她痛苦一生。婚后不久，桂籍就离开山东到南京找工作去，再也没有回去过。倒是史姓女子过门后

在孙家陪伴孙母至少两年，直到孙母病故。桂籍在南京得知母亲去世，强忍悲痛，没有奔丧。桂云和桂毓回去办理丧事，并替桂籍和家人商量，到乡公所代为解除婚约，还史姓女子以自由身，并言明属于桂籍的家产全部给史姓女子。此后有关史姓女子的消息，因抗战而中断。1949年以后，听说史姓女子积极参加斗争，领头批斗麻渠首富孙家。

1933年过了暑假，我成了高三的学生，课业更繁忙，升学的压力加重。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大弟复成辗转寄来的求救信。他告诉我，家人未征得他同意，代他定了亲，并强迫他最近和山东老家的蔡姓女子成婚，以便让新媳妇帮助继母照料家务和带幼小的弟妹们。复成弟已从哈尔滨技术职业学校毕业，在离哈市不远的呼兰变电所工作。他要求我，要么设法阻止这门婚事，要么助他逃婚。他要来北平投靠我，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实在无力相助，这件事困扰了我许多年。复成弟在包办婚姻中熬到老年，直到儿女成群，个个成家立业，完成了做父亲的责任，而自己变得郁郁寡欢，以酒自遣。有一次，我在高雄他家做客，他酒后，眼中含着泪水，以低沉的声音，为我唱了一首三十年代“抒情歌后”周璇唱过的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他如此深情的歌声。随后，他把埋藏心底50多年的秘密告诉我：他在呼兰工作时，认识了一位在小学教书的女孩，两人情投意合，但在旧礼教的牢笼里，情侣被活活拆散，他被迫离开呼兰，回家乡成婚。他数年后出差呼兰，检查线路，走到一处较偏僻的地区，忽然一阵旋风刮来，他寸步难行，在原地打转，许久才走出。后来打听到，那女孩就埋葬在附近。至于女孩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去世了，不得而知。对此，复成弟终老不能释怀。

也是这一年，我遭逢更大的不幸，我亲爱的瓦娃遽尔去世。我被山呼海啸一般的悲恸击倒了。瑞教士像慈母一般，对我关怀备至，保护我，鼓励我。她还在她的居所为我举办毕业晚宴，请了校长夫妇、几位老师和几位和我要好的同学。全班20多位毕业生，被保送到北平私立燕京大学的有四位，我是其中一个。燕京大学的入学试，只有三门——国文、英文和智力测试。考试那天的清晨，瑞教士为我预订了接送的汽车，并陪我到考场。我果然没有辜负她和师长们的希望，四人中只我一个考取了。

我高中和大学上的都是基督教学校，我却没有成为基督教徒，反而对基督教有些反感，主要原因是教会学校强迫学生信教，以“扣分数’作为威胁，做礼拜不是出于学生的自愿。党教士在慕贞高中是掌管学校宗教活动和教授宗教课程的老师，我上学两年半，她以我“每天上完早自习后不留在大礼堂做礼拜”为由，扣我的分数。

我有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也和宗教有关。时值天寒地冻的岁末，我由桂云陪同，冒着危险回哈尔滨奔丧，然后返回北平慕贞上课。这以后很长的日子，我陷在自我封闭中，郁郁不乐。离毕业不到半年，我告诉自己“未来”操诸在我，我一定要坚强，要振作！1934年的5月是“毕业生月”，活动频繁，同学们纷纷举行欢送会、聚餐会。学校严格规定学生平时穿白上衣、黑裙子上课，毕业生却可改穿旗袍。照规矩，全体同学的旗袍统一选购、缝制，都是同一颜色、同一款式。其时是北平的春天，到处可见盛开的紫色紫藤、黄色迎春花、粉红色的杏花和桃花、雪一般的梨花和海棠花，一派缤纷。那时我的心情虽已走出低谷，但和季节还是不合拍，落寞依旧，于是，拒穿彩色旗袍，穿上黑色旗袍去参加毕业典礼。

高中毕业以后何去何从？从上海来校传教的宋博士，慷慨激昂地对学生训话，呼吁同学转学到上海他创办的护理学校，“直接为上帝服务”。一些同学听从他的话，去了上海，不久又都失望地返回慕贞。一天傍晚，我走到地下室餐厅，忽然听到有声音自旁边小房间里传出。我出于好奇轻轻推开门，只见里边一群同学，在宋博士的带领下，或立或卧或跪，双手颤抖，不断乱舞，不是嚎叫哭喊就是狂笑不已，完全失掉理智。我被吓呆了，急忙关上门跑开。据说，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同样的情况在进燕京大学时也发生过，新生受各派教友的包围，她们一定要拉我去参加她们的“团契”组织，我都以“初入学环境不熟悉”为理由而婉拒。这以后，一些学姐对我投以不屑的眼光，她们的表情显示只有她们才是“上帝的儿女”。总之，我此生虽与基督教学校“有缘”，却与基督教“无缘”。不过，我尊重任何教派，相信各教教义都是要人向善、为善，信教与否和信哪种教，在我看来意义都一样。

我离开慕贞女中以后，瑞教士和我还有往来，我请她到环境幽美的燕

京大学度周末。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战火连天，我和瑞教士失去了联系。

八　北平燕京大学，我的学业和好友

“‘路远不须愁日暮’，走远路，必须要有‘不须愁日暮’的勇气，今天天黑了，明天起早再走。”——胡适先生语录。

1934年9月1日，我到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报到。在四季分明的北平，9月，秋风送爽，桂花飘香，树叶变黄变红，被誉为“世界最美丽校园”之一的燕大风景如画，中国宫殿式的建筑、湖光、塔影、岸柳、古松、林荫小路及绿草如茵的广阔草坪，令人心旷神怡。步入校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幢中国古典式的高大建筑——贝公楼，这是燕大行政和教学区的主楼，一对石雕麒麟坐镇楼前，和校门前的一对石狮遥遥相对。新生办理报到手续都在此楼。走出贝公楼后门，穿过林荫曲径，登上小山，只见苍松翠柏环绕的六角形“钟亭”中悬挂一口古老的铜钟，燕大师生就是按钟声作息的。不远处是有名的“未名湖”，岸边垂柳成行，十三层的水塔倒映在粼粼碧波中。有“湖上明珠”之誉的小岛的中央，建有“思议亭”，是美国《生活》和《时代》这两家著名周刊的创始人亨利·路思捐款建造的。“临湖轩”是一座茂林修竹环绕的优雅庭院，是教务长司徒雷登博士的住所。未名湖北岸，几栋宽敞的楼房是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则是别具一格的三合院式两层楼房，分一院、二院及三院、四院，门楼上的紫藤和南墙上的爬山虎，格外典雅幽静。一、二年级生住在二院，三年级生住在一院。离女生宿舍一、二院不远处，有一对古典式楼宇，绿瓦红柱矗立在绿树丛中，取名“姊妹楼”，为三、四院。“宁德楼”是音乐系的教室，钢琴声终日不断。“麦风楼”是女生的会客室和学生会活动的场所。

入学后，我了解了这所大学的历史。美国教会曾在中国创办三所大学——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在五四运动风靡中国的1919年和1920年，三校合并成燕京大学，此时校舍仍在旧址东城盔甲厂。到1926年，北平西北郊区海淀燕园一带以“未名湖”为中心的新

校舍建成，才迁入新址。新校园面积40公顷（合600亩），后来陆续购买附近荒废的土地，继续扩展，建成治贝子园、镜春园、朗润园、鸣鹤园、蔚秀园、燕南园及睿王园等，总面积超过原来的四倍。司徒雷登博士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述及收购土地的艰巨和周折：

> 我们靠步行，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平四郊地区……。几个世纪以来，外省驻京的官吏为他们的家族成员买墓地，买光了城外的地皮。北平的近郊到处是这类互不相关的私人墓地，许多已年久失修，查不到原主人，所以，这确实成了一道难题。

当年寻找校址的过程，漫长而艰辛，种种困难终于被克服，于1926年全面建成美轮美奂的燕大校园。

入学以后，校方进行新生训练，主要是介绍学校环境和分配宿舍。我正式成为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系一年级生，住进了美丽的校园。新的学习环境以及新的人际关系，眼前一切如此靓丽美好，我的心顿时开朗起来，充满了希望！

燕大的医预系，最出名也最难念。这个系的导师是美籍生物学家博爱理博士（Miss Alice Boring），她也是生物系主任，以做事认真、教学严格著称，医预系的同学无不对她又敬又怕。那个年代，要上北平协和医学院深造，必须先在燕大医预系学习三年，然后转到协和医学院就读一年，可获得燕京大学理学士文凭，在协和医学院再读四年，拿到“医学博士”学位，一共需苦读八年才能取得医师资格。

燕大在学制、教学方式及行政管理上引进美国的体系，但又不是照搬，还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以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作为教学基础。上课采取开放形式，学习的灵活性较大。各院系都有自己的主修科、必修科和选修科。主修科是本系的专业课程，必修科是学校规定的各种基本常识类的科目及体育科。不同院系，不同年级的学生，如选同一门科就一起上课，而同系、同年级、同班的学生就不一定这样。另外，学校有多种多样的社团，借以培养学生的社交和组织能力，且增进同学间、师生间的互相了解，建立友爱团结的关系。学生就学时，因志趣、能力或其他原因，可要求转系。燕大的师资，无论中、西，都是学有专攻的一时之选，教学方

法新颖，思想自由，作风民主，因此燕大一向以学术气氛浓厚闻名中外。

医预系第一年，生物、理化和数学是主修科，国文、英文和体育为必修科，选修科我选的是社会学。社会学由雷洁琼博士（同学在背后多以“老处女”称呼她）讲授。社会学的课本、讲义全用英文写成，讲课也用英文。新生最吃不消的，是每次课后她还指定一些英文课外参考书，指定页数，让我们到图书馆阅读，下次上课时前五到十分钟举行小考。医预系新生中选修社会学的，除了我、王玉彬、李赋萧，还有主修化学的景荷荪（她是李赋萧高中时代的同学和好友，两人都来自陕西西安）。面对社会学科的重重困难，我们这四个新生想出化解之法：分工合作，把雷教授每次讲过的课本及参考书的内容分成四段，每人负责一段，将英文译成中文，找出重点。下次上课前，约好在小山坡上的钟亭聚齐，每人按次序将准备好的内容讲出来，一起讨论，熟记，再去上课。亏得选读讨厌的社会学，我才有机会认识了王玉彬、景荷荪和李赋萧，因此结缘，成了一辈子的莫逆之交。

第一年功课的压力很大，尤其是数、理两科，教我叫苦连天。因为慕贞女中重文轻理，做理化试验的设备简陋不全，虽然经同学介绍，请了化学系三年级的学长赵锡霖（哈尔滨老乡）给我补习，也难立即见效。生物科由医预系导师博爱理博士亲自执教。第一次上解剖科，她拿青蛙做标本，先剥掉青蛙的皮，再开腔研究内脏，把我吓呆了。教数学的是英籍白发长者 Miss Hankok，她强调，小数点后边二三位数，都要保证准确无误。她说，将来你们做了医师，为病患诊断病情，写处方不能有丝毫马虎，因此，必须从现在就养成良好的习惯。

好不容易熬过了十分吃力的医预系一年级，成绩平平。眼看医预二、三年级的课业将更繁重，自己势难支撑；加上燕大是私立“贵族学校”，学费和其他开销比其他大学高出许多。学医要八年，协和医学院的费用也很高，而自己的经济来源已成大问题，将来的处境更加难测。我左思右想，决定放弃学医，由理学院医预系转到文学院教育系。我这样安慰自己：做医师或做教师都一样是为国家服务，为老百姓造福。我做出这个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桂云就读北平女师大学教育系的影响。

办妥转院转系手续后，漫长的暑假开始了。自从日军侵占了东北，我有家回不去，而况瓦娃过世后，我也没有“家”了，便留在学校，参加暑期补习班，选修教育系的两门必修课。暑假留校的学生不多，女生都集中住在二院，我和景荷荪同一个房间，我们本来就认识，住在一起更增进了友谊。她坦率地说出她的家庭情况和一些困扰她的问题。景荷荪是陕西人，身材高挑，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微翘的小嘴，说起话来那副认真劲，让人一见难忘。她不喜打扮，朴实中透出淡雅。她不但外表动人，且为人纯真、热诚、善解人意。从背后看，有同学误认她是我，大概是身材、高矮和走路的样子俩人有相似处。白天因为选修不同的课，不在同一教室上课，下课后回到宿舍，两人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减少了在异乡的寂寞。荷荪告诉我，她是独生女，十余年前她父亲任陕西省教育厅长时携一女子不辞而别，抛下她们母女，从此渺无音讯。母女只好搬进伯父家，寄人篱下的日子十分难捱。母亲又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更是雪上加霜。她就读高三的时候，经她家世交李赋萧的舅父、著名报人张季鸾先生的介绍，通过通信认识了刚从德国留学返国、在南京任职的年轻军官谢承瑞，不久即论及婚嫁，以书信订了婚。但两人未见过面，毫无感情可言。有一天，我无意间看到荷荪和一位男同学在未名湖划船。还有一次，在图书馆看到划船的男生和荷荪面对面坐着，打听出他名叫周夔洲，荷荪的同系同班同学。荷荪对我袒露，他们相识已一年多了，她不爱谢，喜欢周。就在这个时候，荷荪的未婚夫谢承瑞来到北平燕大，他此来经过周密的计划，先在校门外租了一间民房，言明住两周。梳洗整齐后，再到宿舍来见荷荪。他的到来没有给荷荪带来惊喜，她已猜到，他的目的是说服她转学南京，进而早日成婚。谢承瑞已三十岁出头，长荷荪十多岁，虽比荷荪矮小，但神采奕奕，一副精明能干的模样。谢在南京军事教导团任职，后升为团长，并在中央大学教授数学。他带给荷荪的礼物是名贵的化妆品和色彩鲜艳的衣料，而这些，却是荷荪最不需要也最看轻的。白天课后和中、晚饭时间，她打起精神陪伴谢承瑞，回到宿舍以后便匆匆换上深色蓝布旗袍，抱着书本，说是到图书馆去读书，到宿舍关门前一刻才赶回来。我曾半开玩笑地警告荷荪：“假若让‘小谢子’知道，或者撞到，他会枪

毙你！”我设身处地，能够理解荷荪的矛盾和痛苦，但她怎能毁掉已成定局的婚姻？别无选择的景荷荪，在1935年大二第一个学期结束，放寒假时，离开燕大，转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不久，她来信说，决定和谢承瑞结婚。

另一位同学兼好友李赋萧，也步荷荪的后尘，转学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医学系。李赋萧沉默寡言，好学不倦。她出身于书香门第，伯父李仪祉是有名的水利专家。舅父张季鸾先生，一生献身于报业，立志办一份不依赖党派、不接受津贴、完全自主、纯由文人论政的政论报纸，被誉为“中国报人典范”。1926年（民国15年）《大公报》在天津复刊，1936年刊行上海版。这家出版于1902年的报纸在张先生领导下，主张报业应维护国家利益，报纸为公众的论坛，应促进社会改革，并在享有自由并承担责任的前提下发表政论。从“九一八”至“七七事变”这个特殊时期，张先生在《大公报》发表有关中日问题的文章，计有数百篇。这家报纸的社论和文章，在当时不但领导社会舆论，广受国人所肯定，也因其巨大影响力，间接产生扭转危局的作用。

和我以及李赋萧、景荷荪在校交往较多并建立起纯真坚固的友谊的，还有王玉彬。她是福建长乐人，我们之中数她性格最务实，考虑最周到，思想与行动永远配合，处事待人，应付环境，都比我们干练，拿得出主意。尤其难得的是不自私，处处以助人为乐。她的数理科成绩最好，一年级时，数学是医预系主修课，她经过考试被批准免修。王玉彬的姊妹兄弟众多，她也因为燕大学费高，家里无力负担，加上北方局势日紧，各校学生频频罢课游行，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她也仿效她们，在1936年转学南京国立药科大学。这么一来，四个好朋友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燕大。

我的经济情况十分拮据，手边只剩下一些钱，是瓦娃留给我用来缴学费和食宿费的。这笔钱还是瓦娃去世后，我冒险返哈奔丧时，爸爸强塞我手中，非要我带走不可的。而瓦娃生前居住的东顺祥二楼房屋内，一切物件，包括衣物、名画、纪念品，我原封未动，留在原处。那时我对险恶的时局和多变的人事全都懵然，竟连瓦娃留给我做纪念的一盒首饰也没拿走，成为终生憾事。

从1935年的9月到1936年的6月底，我在燕大上二年级，这段大学生活，既惬意又轻松。功课方面，胜任愉快，压力减少许多。升到二、三年级，每学期选科较一年级少了，选修14到16个学分即可。选科时除专业外，可侧重某学科作为副修，如我主修教育，副修新闻。给我深刻印象并十分受用的，是选修了一位外籍教授讲授的“心理学”。这位教授特别提醒我们，要分清“目的”和“手段”，“手段”是达到“目的”的途径或工具，但人们往往把“手段”误当成“目的”。他举了个浅近的例子：周末，三五同学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利用假日纾解身心压力，娱乐一番，最后决定进城看场电影、逛街。走到校门口，发现最后一班校车已离去，不能进城，电影看不成了。这时，有的同学聊天、下棋，或打球、游湖，一样愉快。另外两个同学则为了看不成电影而失望、气愤，掉头返回宿舍，整个晚上闷闷不乐。人生途中常会遇到挫折和失败，挫折和失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达到“目的”，“手段”是可以改变的。重要的是要认清自己的“目的”。

我就读的教育系，主任是周学章博士，他态度诚恳，和蔼可亲，具有教育家的风范。他说英语可能比说中国话流利，每次上课，开头用中文，讲着讲着不自觉地改用英语。课本虽全是英文，但参考书中英文版本都有，给我们增加不少方便。我的三位好友相继离开燕大后，我开始和不同系但同年级的同学交往，认识了主修历史的郭可珍、主修英语的张心漪、医预三年级的周光瑚。周光瑚读完三年医预就到英国去了，并没有到协和医学院去深造。抗战初期，她以笔名“韩素音”写了小说《生死恋》，轰动一时，后来在好莱坞拍成电影。在天津南开高一认识的余梦燕，又在燕大相遇。燕大课外社团的活动很多，我选了感兴趣的参加。比如，课余把俄国文豪普希金的诗由俄文译成中文，在校刊上发表，周末也参加一些由学生会主办的郊游，在北平近郊，骑小毛驴游香山或西山八大处，还在有千年以上历史的潭柘寺或戒台寺宿夜，深山苍松古柏围绕的宁静时光中，听远远传来的暮鼓晨钟和诵经的喃喃声。也曾和爱好爬山的同学，在文学院院长梅贻宝的带领下，参加一年一度的妙峰山庙会，天黑前到达妙峰山脚下，开始攀登，山势陡峭，间有石板小路，要爬一整夜才到山顶。山路

上，朝圣的信徒络绎不绝，有的三步一跪、五步一拜以示虔诚。步道两旁多处设有免费粥、茶、面点供应站，途人可随便享用，以补充体力，并略作休息，既实惠又富有人情味。我们到达山顶时，汗流浃背，疲惫不堪，沐浴在初现的晨曦中，精神为之一振。回到休息场所，卧地和衣酣睡二三小时。醒后梳洗，到庙中膜拜并进早餐。每人从庙主持人手中领取一朵大红色绒线小花，挂在胸前，然后沿原路下山，和下山或上山的人群相遇，大家大声说："带福回家！带福回家！"

从1935年郊游爬山开始，我和梅贻宝夫妇建立起深厚的友谊，直到现在还有书信联络。1942年（民国31年）北平燕京大学在四川成都复校，梅贻宝先生代理校长，我返校继续读四年级，曾选读梅校长教授的《哲学概论》。我还申请到半工半读学生资助金，做哲学系施友忠教授的助理。我于1943年毕业，完成大学教育，不负父亲对我的殷殷期望。

离校返重庆前，梅校长夫妇及另两位教授利用暑假组团游峨眉山，邀我参加，一起度过愉快的20天。1979年至1980年，梅校长夫妇应东海大学之邀，返台讲学之际，也不忘邀我到东海大学校园度周末，还一同乘坐火车，沿初建成的北回铁路，到花莲一游。梅校长夫妇近十年来定居美国，由长子侍奉。两老年迈，诸病缠身，每年圣诞、新年仍寄卡问候，师生的深厚友谊维持了一个甲子，世上实难得见。

我也曾到张家口登长城，到内蒙古西公旗夜宿蒙古包，参观古迹名胜。

前面道及，我初入燕大读医预系时，曾请学长赵锡霖补习理、化。他原籍河北，家在哈尔滨，家境富裕，其父在哈开设大罗新百货公司，有两个姐姐同在燕大就读，姊弟三人均为虔诚的基督徒，1936年他已上四年级，即将毕业。我知道但凡是我参与的旅游，他也以为我拍照、送照片为理由，尽量加入，是为了接近我。我告诉他，我要交的男朋友，一定要会说俄文。他说："我一定学俄文！"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幼稚可笑。从那时起，他牢记我的俄文名字"Зоя"（佐雅），事隔五十余年，他依然以"Зоя"称呼我，世界上恐怕只有他一个了。他从燕大毕业后，即赴德国留学，专攻钢铁制造，得博士学位。适逢七七事变，他滞留在德国十余年，

娶了德籍太太，育有一子一女，夫妇两人目前在北京大学（即在前燕大校址办学）教书，住在朗润园教授宿舍。“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尽苦难和凌辱。

这期间，我认识了燕大名诗人程应鎏（镠），他是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诗作经常以笔名“流金”在燕大校刊上登载。他家是江西程家望族，伯父辈的程天放是政府要员，担任过教育部长等职。程应鎏高瘦英俊，谦逊少言，诗人的潇洒气质溢于言表。在皓月当空、繁星满布的夜晚，他邀请我漫步于燕大幽美宁静的校园，耐心地指点天上闪烁的星星，叙述有关的神话传说。

在燕大两年（1934年到1936年），我和桂籍无任何往来。这期间他母亲病故，他和史姓女子办妥了离婚手续。他在南京中央宣传委员会及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并于1935年冬，与党部工作人员周剑英、颜鹤鸣等六人，受上级派遣，带领艺人胡蝶、梅兰芳等，赴苏联参加电影展览会，为期三个月，他们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到莫斯科。1936年返国后他曾到燕大探望过我一次，送我一个用苏联乌拉尔山石做的胸针。

桂籍初到南京任职时，认识了留学法国、返国不久的经济硕士杜桐荪，他字亦琴，浙江温州人，同在中央宣传部工作，长桂籍六岁，称桂籍为老弟，两人十分投缘，无论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他对桂籍都爱护备至。他们与周克夫妇、宗惟赓、黄天佐一同租赁南京傅厚岗三号花园洋房，楼上由俞姓屋主一家居住，楼下则每人分住一间，伙食及家务都由周太太负责。食宿问题得以解决，四位志同道合的单身年轻人全心全力投入工作。

我于1936年利用暑假，到南京与好友景荷荪、李赋萧、王玉彬相聚。王玉彬就读的南京药科大学，没有女生宿舍，她暂住在女子公寓，她的同房是在财政部任职的罗协邦小姐。初次见到罗小姐，就被她的美貌所吸引。我私下和玉彬说：“你的同房真漂亮，又那么温柔。”玉彬马上答道：“罗小姐还一直夸奖你风度好，气质好，她很喜欢你！既然彼此欣赏，你们做朋友好了。”就这样，我和协邦成了挚友，一生相伴相随，从南京到四川，到东北，在台湾，四十余春秋，我们两家肝胆相照，同甘共苦，孩子们一起长大，而我们也渐渐老去。协邦和国瑞兄晚年移居美国

后，诸病缠身，不良于行，受尽折磨，终于不治，相继去世。“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生命在不觉中流失了，留下终生的忆念和遗憾！

在南京，我还认识了杜桐荪新交的女朋友朱威莉和宗惟赓的女友林静，两位年轻貌美的女孩，都是从北方来这里投考“影星训练班”的，已被录取，正在接受训练。杜桐荪兼任该班班主任。

南京度假完毕，返回学校上课。燕大三年级是大学中最轻松的一年，课业、环境、生活各方面都已驾轻就熟，但我对功课不敢稍懈，兢兢业业，从不缺课。

日本军阀自从侵占我东北并积极向华北侵略以后，气焰日长，野心益炽，狂妄横蛮的行动变本加厉。而我国政府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迫于国内外的环境，对日本实行最大的容忍，希望日本当局能循合理途径解决中日纠纷。政府的政策和态度，未被全国人民认同、接受。北平各学校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于1935年发动“一二·九”（12月9日）及“一二·一六”（12月16日）爱国学生运动。燕大也不例外，中共地下党骨干王汝梅（即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等要职的黄华）、陈絜、张兆麟等，领导同学举行游行、罢课，并在校内组成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单纯、幼稚、满腔热血的青年学子认为爱国抗日，人人有责，均踊跃参加。

各大学学生的第一次游行，我进城参加了，但被军警挡隔在西直门外，无法进城。大家在门外聚集，站立了一整天，不顾寒冷饥饿，高呼口号、唱爱国歌曲、演讲，情绪十分亢奋。一位同学和警察理论，被警察强行夺走他手中的校旗，我站在附近，一步跃上，把校旗从警察手中夺回来，交还给掌旗的同学。当天晚上，一位男同学到宿舍来找我。我不认识也没有见过他。他先自我介绍说：“我叫朱祥麟，医预三年级。今晨看到你勇敢地夺回警察手中的校旗，实在敬佩，希望和你做个朋友！”他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来，这种少见的交友方式教我不知所措，但还是答应了。以后数十年，我们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友谊。但我知道，我曾深深地伤了他的心，辜负了他的情谊。历经七七事变、八年抗战、胜利后军人复员返乡，

撤退到台湾，他却一直没有结婚，然而我已结婚生子多年。朱祥麟的父亲朱宗良是资深监察委员。两个弟弟，一曾任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一为“监察院”秘书长。朱却没有和父母弟弟一起到台湾去，留在大陆做《大公报》的新闻记者。“文化大革命”时，因家庭背景受到残酷迫害，被送到黑龙江边界劳改，几度濒临饿死冻毙的边缘。

在朱祥麟认识我不久，12月16日，我们又参加一次大游行。有了第一次的经验，部分同学携带校旗和标语，提前一天进城，16日代表燕大加入各校学生大游行。游行队伍在长安大街被军警打散，数位燕大同学受伤，好友陈兰滋头部被打，伤势较重，送医住院。随即燕大和他校联合行动，开始罢课，由“民先队”队员组成自卫队，二十四小时轮流在校园中巡逻，以防当局派人到校拘捕领导学运的同学。寒冷的深夜，校外警车呼啸而过，次晨得知清华大学有同学被捕，燕大因属教会未遭滋扰。同学们的情绪本已失控，在压力下，更一发不可收。读医预系三年级的朱祥麟、李宗瀛等三位同学以救国为由，向学校提出转系要求。医预系导师博爱理苦苦劝阻，请他们再三考虑，最后，三人坚持改变做医师的初衷，转读它系。

朱祥麟改读新闻系，后来成为《大公报》的名记者，以“朱启平”的笔名写过不少新闻报道和警世文章。抗日胜利那年（1945年）9月2日他代表《大公报》参加在东京湾内“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典礼。（海峡两岸音讯隔绝40余年后，我们在台北、洛杉矶见过两次面，都已到老年，彼此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沉默代替了言笑。我这才知道，他终于结了婚，育有四子，全家移居美国旧金山。）学潮平静后，北平各大学终止罢课，恢复上课，同学们加紧准备年底的期末考试，表面看起来，校内一切已恢复正常，不过，课外各种救亡活动不断增加，“民先队”积极招收新队员，加以训练，巡逻校园仍照常进行，大家经常参加集会，听演讲，参加各种训练班，每天早晨在操场举行团体健身活动。反抗政府的情绪仍在各校弥漫，未曾稍减，呼吁政府放弃对日懦弱退让的政策，以积极的态度抵抗日本的侵略。不久，寒假开始，同学们纷纷离校返家与家人团聚，校园顿现寂静，我仍留下，闲来提着由哈尔滨带来的溜冰鞋，到校内未名湖或城里北海公园溜冰，逍遥自在地玩上大半天。和竹青姐姐在哈尔

滨初学溜冰的情景又浮现眼前，无忧无虑的日子竟是那么短暂！同样是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而自己的心境竟如此苍老。桂云和桂毓已离开北平，转学上海沪江大学，桂毓后来又转到齐鲁大学习医。

冬去春来，满园百花盛开，姹紫嫣红，校园中又充满笑语，自己的心房豁然开朗。可惜好景不长，日本军阀早已依照既定战略，大举侵略中国，于1937年（民国26年）6月先将驻屯天津的旅团集中北平、丰台一带，为挑起事端作准备。

九　海滨老家朱由村，和父亲最后一次聚首

1937年6月下旬，燕大放暑假。我按照事先和父亲的约定，提着简单的行李离开学校，乘平沪火车到济南，换乘烟潍（烟台、潍县）公路的客运汽车到掖县朱由村，和先我从哈尔滨回来的父亲会合。父女已三年没见面了。我们的计划是在乡下同度暑假，然后，父亲返哈，我回北平燕大读完最后一年（四年级）。

靠海的朱由村，是充满温馨亲情的小村庄，宁静、淳朴，没有人世血腥的战乱，只飘散着咸咸腥腥的气味，那是海风送来的。七月和八月，我和父亲在这里一起生活了近两个月，记忆所及，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经过一连串忧患离乱，我长大了，懂事了，深深体会到亲情的可贵，亲人相聚的不易。我和父亲分住在里院一排的三间房子里。碰巧三弟复合和四弟复善也在朱由村上小学。

我千方百计为父亲做事，以尽孝道，为父亲洗衣服，他睡午觉时，我坐在炕边为他扇扇子。傍晚放下蚊帐，铺好被褥、枕头，再用大蒲扇扇凉，并驱除帐内的蚊虫。也在那个时候，我向父亲承诺，将来我负责弟弟们的教育。

回乡的第二天清晨，瞎了眼的奶奶把我叫到她房里，我坐在炕沿边，她用双手轻柔地摸遍我的脸，又爱又怜地说：“瓜子脸盘，宽额头，高鼻梁，是你娘的模样哩。”前院大伯、奶奶见到我们父女俩，不断摇晃着头，叫嚷：“想吃猪头肉！”乡村的墟场，五天一集，每次父亲赶集回

来，两手提的都是蛮好吃的，有猪头肉，有大螃蟹腿，有夹卤肉的烧饼、小土鹅、鱼、海蛎子，还有西瓜，够吃四五天了。西瓜马上用木桶盛着，放在井中。土鹅熬汤下面疙瘩（面粉加蛋）。前院瞎眼奶奶嘀咕着，“抗议”父亲用了她的锅。两个幼弟放学回来，喊肚子饿，家中的气氛要多亲热有多亲热。

父亲个性开朗达观，心地良善，思想进步，对我这个独生女特别钟爱。从前在哈尔滨，父亲总抽空提着我爱吃的香蕉和巧克力糖，到瓦娃家看我。巧克力在北方很是稀罕名贵，从欧洲进口的白巧克力是我父亲最先买给我吃的。我上中国小学开始练毛笔字，父亲认为我写的“飛”字最出色，逢人就夸奖，有时还要我当场表演写给人看。我在他的扇面上画了一串绿叶红荔枝，他整夏拿在手中，到处向众友炫耀。从我能记事开始，父亲每年送给我的生日礼物，都是纯金戒指，有时一个，有时两个，有的镶宝石，他说将来我都用得着。可惜离家求学时，我只带了一个金戒指作纪念。我在北平慕贞高中上学时，有一年生日，父亲送给我一个镶钻石的戒指，我戴在指上，同学不断问我是不是“订婚戒指”，我烦了，摘下放进宿舍衣橱内，被室友看到，一天下午室友请假外出，我的钻戒不翼而飞。为此我继母责怪父亲，说他太宠女儿，没见过学生戴如此贵重的戒指的。父亲只说：“破财免灾，丢掉就算了。”父亲是美食家，不但懂吃也会做菜，他的拿手菜有“熬松花江白鱼”，做法是：鱼切段，放醋加胡椒粉。还有“干烧明虾段加大葱”。他也十分讲究衣着，即使在乡下，也穿着绸缎裤褂，口袋里装着带盖的挂表，金表链系在对襟衫的纽扣上。他是哈尔滨一家大绸缎庄的老顾客，做了衣服都是年底结账。我的衣服也是在那里订制的，记在父亲账上。我离哈赴平时，父亲为我定做了一件冬天穿的咖啡色毛呢料长大衣，水獭皮做领子，里子是狐狸皮毛加绸衬，配上镶水獭皮的帽子和手笼，还做了一件灰蓝色毛呢夹大衣。瓦娃也把她自己的一件名贵的黑紫羔皮大衣，改成短外衣、帽子和手笼，送给我。这些衣服，质料上乘，款式帅气新潮，在燕大校园里出过大风头。我的溜冰衣、裙、围巾、帽、袜、手套，都是在哈尔滨特别定做的，全是深蓝色加紫红边，十分美观考究，获得不少赞羡。

在朱由村居住时是夏天，父亲带我到离家约二三里的莱州湾。海边天气晴朗，眼前一片浩瀚的大海和金色的沙滩。父亲说，我们下海玩。他找来一根长竹竿插在沙子里，把我脱下来的旗袍和他的衣褂挂在竹竿上，我穿着衬裙跳进海水里。正赶上退潮时间，我们也随波涛越漂越远，海上游来各种小鱼，有一种圆圆的，像皮球似的，身上有刺，瞪着眼睛，十分滑稽，父亲说这种鱼叫“气鼓鱼”，爱生气才长成怪模样。走回沙滩，看到不少人弯腰捡“真凉鱼”，这种鱼，嘴巴比身体长两三倍，长嘴陷进沙里游不走。真凉鱼体内只有一条灰蓝色的骨，肉细味美，我们也捡了不少回家。父亲拿来熬汤，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第二天，复合、复善弟放学回来，说村里议论纷纷，大家都声称，看见女生下海，是“生平第一次”。有时父亲骑脚踏车，带着我到平里店买报纸、寄信、打听外边的消息，顺路到东路宿外婆家坐坐。

我一直后悔，父亲好几次要带我到张家祖坟，让我拿纸笔，记下地点、方向及家人埋葬的位置，好在日后祭拜我的亲娘、祖父母和别的祖先。父亲还说，也该让我知道他将来过世后埋葬的位置，可是我说什么也不肯去，恐怕是不愿也不敢面对事实的缘故。事后总觉对不起父亲一番苦心。数十年后回顾，老家的祖坟早就被夷平，种上稻粮，即使当时清楚记下，也无法寻找。

7月8日傍晚，平里店传来消息：日军在河北宛平县卢沟桥制造事端，炮轰县城。国人推定，这次日军行动不是突发的“意外事件”，而是实施侵占华北的计划。7月下旬，烟潍公路上出现一批一批逃亡的年轻人和学生，他们由北方各地辗转到大连、旅顺、营口各港口，乘船到烟台，改搭烟潍公路的客运车，经掖县平里店、潍县到济南，再乘平沪铁路火车到首都南京。

由海路逃亡的人越来越多，从父亲在平里店收集到的消息看，局势越来越严重。北平于8月4日沦于敌手，政府不再忍让，我军奋起抵抗，全面抗战一触即发。我和父亲再三商量，结论是：我既无法回北平，也不可能回哈尔滨，更不能留在朱由村，只有随流亡学生去南京一途。到了那里，再看情形，转学读完大学或找工作。决定做出，父亲和我都极彷徨痛苦，

但此外没有可行的办法。好在父亲对我应付恶劣环境的能力很有信心，他再三叮咛：女孩子家绝对不要到前线工作，一定要完成大学教育。临行前又嘱咐我，若有机会到四川，别忘记去到成都张家铁角湾看看。那里是我们张家的根。常言道："蜀道难于上青天"。谁想到，父亲的期望我一一付诸现实，但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到前线"这项承诺我未能遵守。抗战八年，我都在四川。进成都燕大读四年级时，没忘遵父嘱去找张家铁角湾，但张家祖先之根已渺不可寻。

到了动身日期，父亲送我到平里店，我手提由北平带来的简便行李，两人心情异常沉重。没有想到，在等候南下汽车时，遇见了桂毓。他也是利用暑假，由上海到麻渠村探望父亲。见到睽违多年的父子俩，大家很是惊喜。"男大大"带着期许的眼光对我说："有桂毓和你结伴，我们都可以放心了。到南京找桂籍，他会替你们想办法。"

经过无比拥挤和慌乱的旅程，终于抵达南京。但不见桂籍的踪影，原来他已被派往沿陇海、津浦、平汉铁路的车站，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所编定的小组，组织培训，并进行宣传，在河南、山东、苏北工作数月。

在南京我遇到不少流亡的燕大同学，也见到家在南京的朱祥麟。大家纷纷到"流亡同学服务中心"报到，接受分到的食宿地方，并填写个人志愿。我参加了医护训练班，但不是和流亡的同学同住，而是应周克太太康淑敏之邀，住在傅厚岗三号桂籍空出来的房间，白天外出参加各种活动。就在这个时候，我和周太太建立了良好友谊，此后维持数十年。

在南京，安定日子过不了几天，北方局势日益紧张，日军大举向南侵犯，南京方面人心惶惶，机关、学校、居民纷纷作疏散及撤退的准备，逃进南京的各地难民和学生也与日俱增。教育当局对流亡学生采取了紧急疏散措施，分批将他们由长江水路送往武汉（武昌、汉口）。大统舱内不分男女，沙丁鱼似的睡满年轻人。大家尽管忐忑不安，但表面上有说有笑。

到了汉口，我和桂毓暂时住在桂云家。桂云和胡震夏在上海结婚，和婆婆及小姑胡九思同住，已生长子胡千里，尚在怀抱中。胡震夏在汉口海关工作。逗留在汉口胡家的那段日子，我亲身体会到桂云做南方家庭媳妇所承受的压力和委屈。她曾再三偷偷地对我说："北方人绝对不要嫁给南

方人。”桂云的婆婆并不是老封建，而是所谓“文明婆婆”，她在都市长大，知书识墨，但婚姻不美满，年轻时就被丈夫遗弃，自卑感和占有欲很强，一面口是心非地“示好”，虚情假意地“关怀”，一面处心积虑地排斥媳妇。她的干女儿成群，桂云要应付这些干姐干妹，既痛苦又无聊。早餐吃稀饭，只有一盘咸菜，一盘花生米。婆婆还煮两个鸡蛋，蒸三个小馒头。六个大人坐在桌前，不知谁该吃，谁不该吃。桂云左右为难。婆婆平时还常指摘某某人吃得多，吃相不好，“真是粗人！”不知她影射哪一个。

9月，武汉各学校开课，我申请进入私立华中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四年级。这两所大学都在武昌，要从汉口乘渡轮过江去上学。住进武汉大学女生宿舍时，天气渐凉，我所带的衣服，加上桂云给的一条薄被，不够御寒；另外，我染上疟疾，发高烧，忽热忽冷，全身颤抖，头痛欲裂。这种病很难根除，曾纠缠我多年。战时到过后方的人，多患过疟疾（四川人称“打摆子”），有特效药奎宁药片，但此药十分伤胃。

各地流亡学生都集中到武汉，各找出路。许多青年人结队到陕北延安去了，燕大同学中，我知道的有王若兰、吴贵宜、龚普生、龚维航（龚澎）等。1949年以后，这些同学都成了中共的要人，尤其是龚氏姊妹（龚普生、龚维航）及吴贵宜（吴清），他们都担任过外交部的司长。龚普生还嫁给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龚维航一直做周恩来的机要秘书，随同访欧、美。男同学王汝梅（后改名黄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埃及、加拿大等国大使。

还有不少男同学，后来响应政府“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投笔从戎，到云南昆明参加青年军。我留在武汉，一心想毕业以后找事做。就在这时，我和王玉彬在汉口重逢，她也是由南京逃难来的，住在女青年会。多了一个朋友，心中觉踏实许多。10月，景荷荪抱着不满一岁的女儿谢尊一，随同大批军眷从南京乘船疏散到后方，途经汉口，要到四川泸州投靠她的叔父。谢承瑞已升任教导团团长，负责留守南京。兵荒马乱中，荷荪和玉彬及我，在汉口虽仅相聚数日，但已觉极为难得。前途茫茫，大家都有朝不保夕之感，今日一别，又不知何时再能相见了。善解人意的荷荪看我身上衣服单薄，她巧妙地笑着说：“从前你喜欢我这件短外套，我

不舍得给。你看，我现在有了这件更漂亮的长大衣，假若你还喜欢，这件短的就留给你，好不好？”那件外套对我来说最有用了。她临行前又悄悄塞了些钱给玉彬，嘱她代买围巾、鞋、帽、手套给我御寒。她到了泸州后曾写信劝我速离汉口去泸州，信中说：“只要我有一碗稀饭，也是由我俩分吃。”程应鎏也随流亡学生来到汉口找我，他邀我同他返江西九江家乡避难。在北平时，赵锡霖邀我同赴德国留学，我拒绝了。这次程应鎏提出邀请，我不知如何处理。适逢桂籍因工作关系路过汉口，我就让他俩相识。两人经过长谈，程应鎏留下长诗一首，黯然乘船离去。40余年后，我于1990年到北京探亲，并参加了燕大创校70周年庆典，从同学郭心晖口中得知，程应鎏曾打听我的下落。郭还告诉我，程应鎏和李宗瀛的妹妹结了婚，现住上海。不幸的是程应鎏患了鼻癌，病况严重。我到上海玉彬家后，按址写了一封信给他，告诉我的近况，并说我离沪在即，无法去探望他们了，信中没有提及他患病之事。

战云笼罩的动荡青春（1931—1937）Ⅰ

北平慕贞女中1934年毕业照，后排左五是我

漫天大雪中游戒台寺

喜见儿时玩伴孙桂毓，我在左一

与好友出游，左二是我

1934年9月1日，我到风景如画的燕京大学报到

燕大学生课余辅导街坊儿童课业

战云笼罩的动荡青春（1931—1937）Ⅱ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燕京大学正门口

燕京大學圖書館
借書證
姓名張郁廉註册號
學院　系
大學三年
1936-7
注　意
1. 每次借書單上簽名須照本券所簽字樣
2. 本券所借書籍皆由本人負責
3. 補領借書券時須繳大洋五角
4. 借書到期須即歸還本館不另通知

我的燕京大学图书馆借书证

与同学在校园草地上野餐，后排中是我

与同学春游，右一是我

与同学冬游，后排左是我

轻松惬意的大学二、三年级

北平大学生绥蒙考察团（1936年）Ⅰ

备好行装准备上路，中间坐着的是我

出发前在北平南口火车站合照，后排左六是我

到达内蒙古，左四是我

车到五当召附近的包头县政府办事处，右六是我

参观绥远国立大专学府，右五是我

黄河边上的包头南海子乡

北平大学生绥蒙考察团（1936年）Ⅱ

绥远昭君墓，站立者左十一是我

绥远烈士公墓，后排中坐在墓碑前的是我

包头一景，右二是我

历经艰辛的旅程，三张照片我均在左一

北平大学生绥蒙考察团（1936年）Ⅲ

参观新村的路上，右边第二辆车上是我

坐在骡车上、左一侧视坐着的是我

包头转龙藏，右三是我

我身着蒙装、头戴蒙饰

与小喇嘛合影，左一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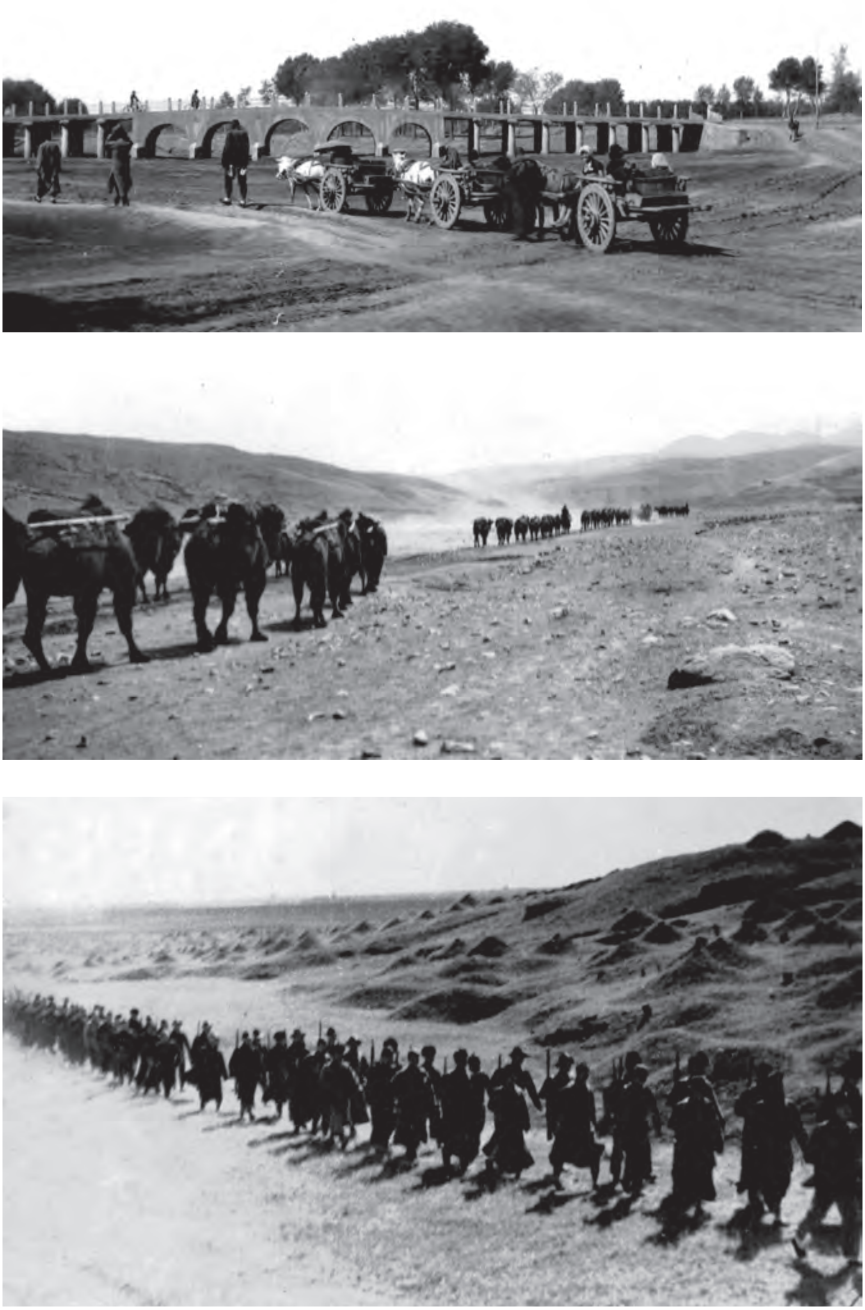
与蒙古族妇人合影，右一是我

北平大学生绥蒙考察团（1936年）Ⅳ

与石王合影，后排左二是我

与绥远省政府官员合影，右四是我

石王府前与军人及蒙胞合影，中排右三是我



战云密布的绥蒙自治区，以及当年运输工具——马匹及骆驼拉车

|第二辑| 记者生涯（1937—1945）

一　战火中加入苏联塔斯社汉口分社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政府宣布对日全面抗战的初期，苏联是第一个给我国提供军事及经济援助的国家，运来不少飞机和武器，也派遣许多军事顾问、技术人员和新闻记者。在陪都重庆，军事委员会设立了顾问事务处，由中央执行委员张冲先生（字淮南）负责。桂籍与张冲先生早在1929年已认识，当时张冲被派赴东北，在哈尔滨任特派员。张冲是浙江温州人，和杜桐荪是同乡好友，桂籍因此也认识了杜桐荪。桂籍大学毕业后到南京中央宣传委员会任职，也是张冲推荐的。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专门管理和苏联顾问有关的一切事务，当时急需谙熟俄语的人才，凡来自东北尤其是哈尔滨、会俄语的青年都被罗致，让他们学以致用，为国家服务。桂籍精通俄文，由中央宣传部调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苏俄顾问处，任上校编译科长、秘书及总顾问办公室主任等职。五六年后，韩墨林、韩松林兄弟在重庆时也经桂籍介绍进顾问处担任翻译，当时松林只有十五六岁。

设于汉口的苏联塔斯通讯社扩充业务，增加工作人员，而我的条件正适合：会俄语，大学副修新闻。再经张冲先生及桂籍的推荐，马上被录用了。这时我正需要一份工作，以维持生活。虽已借读国立武汉大学，也只好申请休学。稍后，胡伯威工作变动，被调离武汉，派赴城陵矶海关工作。桂籍也随之迁移，临行前退掉居所，但言明留一房间给我，因此，我也居有定所。可惜的是遇到恶房东，我用水电受限制，只能煮简单的早餐。我只好在“菜根香”餐馆包食素菜客饭（只有这一家答应每晚送饭菜到家来）。有一天下班返家途中，对面走来一位手牵幼子的妇人，有点面熟，但一时也没认出，擦肩而过。回头再看时，该妇人也站住，回头看，走回来问我。我才想起，她夫姓韩，自己姓白，是桂籍母亲在哈尔滨的朋友，她也在十六小学医务室工作过。她告诉我她携两子逃难来此，现住某客店。次日我带了一盒西点去探望他们。她的两个孩子都在十岁上下，长子韩墨林正患病卧床，次子叫韩松林。韩伯母告诉我，两个孩子在哈尔滨用溜冰鞋打伤了一日本儿童，他们怕惹祸，连夜逃离，打算经汉口到后方

去。韩伯母受西式教育，俄文很好，24岁时下嫁长她数十岁的韩姓商人为继室，连生两子，28岁时丈夫逝世，她不见容于韩家，只好独立谋生，养育两子。

1937年（民国26年）年底，我初到汉口苏联塔斯通讯社上班，社长罗果夫先让我学习使用俄文打字机，然后让我把每日中文报纸上的消息翻译成俄文。罗果夫年纪四十开外，体型矮胖，精力充沛，能言善道，交际手腕灵活，广交各阶层朋友，会说点中国话，被誉为“中国通”。

全面抗战开始。日寇向北平进犯，飞机数十架轮番轰炸我平津守军。7月30日，日军攻陷天津，8月4日北平沦陷，日军大肆焚掠，疯狂破坏。紧接着，8月13日，淞、沪也发生战争。日军借口一日军官被我击毙，制造事端，日军舰27艘驶至吴淞口，登陆上海。我军全力抵抗，浴血奋战近三个月，到10月底，由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孤军，死守上海苏州河畔四行仓库。英勇的女童军杨惠敏将一面国旗围绕身上，深夜泅渡苏州河，匍匐至仓库，将国旗交给守军。次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国国旗飘扬在四行仓库上的天空。抗战时期，前后方流行，每个人都会唱的爱国歌曲是：“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飘荡……”

就在此时，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表示了“共赴国难”的意愿，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发表合作宣言。朱德率领第十八集团军从陕北出发，赴山西参加抗战。当时日寇侵华的总兵力为20个师团，分散在晋北、鲁北、豫北及江南两千公里的地面，占领的仅是城市和交通线，沦陷区多数地方仍为我退入敌后的正规部队控制。日寇本意在速战速决，但泥足深陷，欲拔不得，于是孤注一掷，于11月中旬向山东进犯，12月27日攻陷济南及泰安。12月13日，首都南京失陷。从12月至次年3月，日本强盗在南京犯下反人类的滔天罪行，无辜民众包括妇孺老弱，被枪杀、刀砍、轮奸、火烧及活埋，死亡人数达20余万，另加八九万俘虏，占南京总人口（80余万）的四分之一。南京大屠杀见证人王千日写道：

> 12月13日日军到时，南京城鸡鸣寺、清凉山等处，还有成千上万的守军，敌人先用炮轰，继以机关枪扫射，再用催泪毒气喷洒，然后收缴枪械，一群一群的要他们自己掘坑，再以机枪射倒于坑内……南京城内电杆上、围墙上、垃圾桶、排水沟、破瓦颓墙的废墟上，到处悬挂着断腿残肢，堆着头颅白骨，流着肠肚鲜血，腥臭难闻，惨不忍睹……

现任日本政府不知悔改，竟在50余年后篡改血腥历史，洗刷屠夫罪名！我们中华子孙后辈又如何能淡忘此深仇大恨！

日寇攻陷南京及济南后，为打通津浦路，实现南北会合，积极南下，欲占取战略要地徐州。而国军为确保徐州，屏障武汉，于1938年（民国27年）2月初迎战进犯徐州的日寇，徐州会战于是展开。

二 “你是到最前线我旅部的第一位女记者”

战云密布之际，莫斯科塔斯社总社派来数位军事记者，社长罗果夫就分配我随同这批记者到徐州战区，协助采访。3月中旬我们从汉口乘火车经洛阳、郑州、开封到徐州，住在城内“徐州花园饭店”。重庆派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及其他外国及国内各通讯社、报馆派来的记者，也集中住在这里。于是，这家旅馆成了日军每次空袭的目标。徐州城内没有防空设施，百姓缺乏防空常识，空袭警报一响起，大家纷纷往外跑，能躲到郊区最好，不然藏在空旷的地方，如大树下、树林中或石堆旁，双手抱头，蹲着或脸向下躺着；有时来不及跑远，就躲进民房的桌子下面，生死全靠命运。花园饭店中弹数次，部分房舍被炸毁，但我们没有搬走。

不久，我们离开徐州，奔赴前线。记者们年轻力壮，满腔热血，身负使命，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到过的最前线，是枪林弹雨中的国军旅部。在枪炮声中，旅长覃异之接见我们，详细讲解、分析前线的战况，不厌其烦地回答记者们提出来的问题。他是广西人，工诗词，态度稳健、坚毅，谈吐温文，“儒将”之风教人钦敬。前线战事激烈，我们不能停留太久，被安排到离战火较远的偏僻村庄过夜，村民早就离家逃难去了，里面

空无一人。带路的副官找到了一间破旧的老屋，供我们休息。屋里四边透风，木板上放了些稻草，一盏油灯发着微弱的光，忽然在屋角发现一口黑色大棺材，上边盖着草，又神秘又恐怖。我带着些微不安，和衣躺下，睁眼等天亮。我们离开旅部时，旅长覃异之对我说："你是到最前线我旅部的第一位女记者，使我敬佩。这支德制勃朗宁小手枪送给你，需要时拿来自卫。"我带着这支小手枪，辗转于鲁南、湘鄂、长沙、武汉、重庆，到成都燕京大学续读大学四年级时才卖掉，钱拿来作路费和学费。

1938年3月14日起，日军主力由津浦路正面南下，猛扑滕县，拟袭取台儿庄。不料日军在以为唾手可得的台儿庄前，遭到我守军严重打击，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台儿庄空前大捷，传至后方，民心士气大为振奋。我们一群记者正在附近前线访问，于台儿庄大捷后第二天就赶到台儿庄。城中仍弥漫着火药味，建筑物一半以上被毁，有的房舍还在燃烧，冒着烟，断垣残壁间散布着血肉模糊的尸体。国军正忙着挖坑掩埋死者，坑浅土少，土堆中还有残肢露出，被野狗拖食。眼前处处景象，残酷无比，教人想到血战的惨烈，实在难以描述！

国军在徐州外围已和日寇正面激战三个多月，数次大捷，已达成消耗敌人、实现战略相持的目的。5月15日，数十万大军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开始有计划的转移。5月19日我军放弃徐州。全部中外新闻记者、军事顾问、战区内的文职及政工人员，集中起来，分队分组，在大军前、后、左、右的保卫中，浩浩荡荡徒步突围。白昼为躲避追踪的日军飞机轰炸和扫射，大家分散在各村庄的空屋内，绝对不准出外活动或晒挂衣物，以免引敌注意，天黑马上整队随大军开发。有时途中经过日军占领的据点，我强大的前头部队得先予以拔除，肃清敌人，再让大队人马通过。往往要走过一些发生过战斗的街道，火药味犹新，房屋倒塌，尸体横卧，墙壁上鲜血斑斑，我们一组女同志人人掩面疾走，不敢稍停。每晚要步行至少十小时，到天将亮才休息。一个个双脚起泡，发肿，拖着疲倦的身躯，小心翼翼的紧跟队伍。一夜总有两三次，带队者由后面传来"休息片刻"的命令，我们马上原地坐下或躺卧，闭目养神。多亏我在路上认识了一位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名叫李丕祖，他一路殷勤照顾我，停下来休息

时，他马上把身上的外衣脱下铺在地上让我坐。大家分到一块大饼，他也留一半给我，我再三推却，但总拗不过他的好意。另外，康乐队一位王姓女孩，一路不离我左右，总说：“张姐姐，我好喜欢你！你若把头发放下来会更美。”不幸，这女孩半途得了伤寒病，她的同伴们用担架抬着她走，一到汉口就送进医院，我没有来得及去探望，她就与世长辞了。一位苏联军事顾问实在走不动了，从村民处买到一匹无鞍的小毛驴，骑在上面，两条长腿拖在地上，一歪一倒的跟着队伍走，样子十分滑稽，但大家都笑不出来。可怜的小毛驴，负荷不了，加上又饥又累，未能支持多久就倒毙路旁。在漫长而艰险的突围途中，战区司令部曾派来三辆黑色轿车，指明运载苏联顾问及外籍记者一段公路路程，到某据点再聚齐。轿车白天行驶需特别注意敌机，我们挤进车厢后，分批探头向车窗外，注视天空。忽然看到远处有二三架日机朝我们的方向飞来，赶紧停车，大家纷纷向两旁稻田及村庄躲避。日军飞机低得我们可看到机翼上血红的太阳标志，轰轰地掠过，轰炸停在路上的汽车，扫射附近的田野。我赶紧面朝下抱头躺着，子弹像雨点在四近仆仆作响，身旁有人呻吟。不知过了多久，敌机飞走了，我清醒过来，坐起，浑身是泥土，腿上有血。心想，一定受了伤，这下可完了。再摸摸全身，没有痛的地方，才弄清是旁边的人受伤，血溅到我腿上。突围途中也有轻松的时候，有人送来一包煮熟的鸡蛋，我高兴得喊起来：“有鸡子儿吃，太好了！”大家轰地大笑，我莫名所以，才知道把“鸡蛋”叫为“鸡子儿”的，只有东北人，其他各省份的人压根儿不懂。还有一次，我们白天躲在村庄空屋内，有人捉来一只活鸡，大家合力把它宰了，拔了毛，但没有足够的水洗净肚肠，只好将就，还把从抽屉里找到的一包绿豆和鸡一起煮，大家大吃大嚼，发觉味道有些怪异。这顿“怪味鸡”大餐久久停留在我的味觉记忆。

我们昼伏夜行，走走停停花了21天，6月初才突破日军的包围圈，脱离危险，到了河南信阳，乘火车，两小时后平安抵达汉口。每个人虽然疲惫不堪，蓬头垢面，衣履肮脏，身上寄生了虱子，奇痒难忍，但能亲自经历名垂青史的“徐州大突围”，实在是极为难得的人生际遇！

回到汉口，我马上到塔斯社上班，忙着整理资料，写报告。七八月

间，我和部分同事奉调到四川重庆塔斯社工作，一行乘船离开武汉，沿长江经三峡到重庆。三峡（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全长193公里，素以壮丽惊险闻名于世。沿途江流湍急，有万马奔腾之势，江面迂回曲折，险滩处处。两岸高峰入云，重岩叠嶂，鬼斧神工，走过才真正领略“蜀道难”。每艘入川的船，一定要有经验的舵手领航。三峡这一段，还有成串纤夫，光着上身，在江边乱石丛一步一步拉着纤绳。船近重庆朝天门，向江面看去，江心一条齐崭崭的长线，一面黄浪滚滚，一面碧波滔滔，原来扬子、嘉陵两条大江在此相会。重庆建在两江中间一片狭长的山岭上，三面环水，房屋依山坡而筑，高低起伏，稠密异常。路随山崖坡形蜿蜒，梯级动不动就是几十级、数百级。

重庆塔斯通讯社坐落在枣子岚垭。“枣子岚垭”名字雅致，在当时的重庆名气不小：一来，要爬数百级陡峭石阶（可以雇滑竿代步，但汽车和黄包车就派不上用场了）；二来，苏联和其他各国的机构多聚集在这里，在抗战时期算是最舒适、最安全的。塔斯社社址是一幢石块砌成的两层楼房，楼下是办公室。顶层是一间阁楼，由我和一位来自上海的打字员同住，她是白俄女孩，名叫索妮亚（Соня）。社长罗果夫和太太、儿子住在二楼。另有一位副社长，中文名字叫“叶夏民”，会说一点中文。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几位中国同事，其中有两位是燕京大学的学长——李宜培和苏达夫，他们和我一样担任编译，负责把中文报纸、杂志的有关资料译成英文，而我负责把中文报纸的社论，摘要译成俄文。需要时，如参加记者招待会或社长作访问，我也做口头翻译。

石头围墙内除了苏联塔斯社外，十余级石阶下，有一幢长方形两层石砌楼房，是苏联大使馆武官处官员的办公室和宿舍。他们的生活起居及伙食，由一对广东籍谭姓夫妇管理。谭姓夫妇俄文极好，但中文不会说也不会读。我和索妮亚的伙食由他们包下，通常饭菜按时送到我们的住处，有时我和索妮亚会跑下去蹭一顿，多半是又可口又有营养的俄式西餐。就此，我的生活起居有了着落，工作上受上司器重，胜任愉快，薪水优厚，在新闻界也声誉鹊起。

我到重庆后，武汉的局势日紧。日本军阀“三个月亡华”的美梦已遭

粉碎，战况胶着，使他们颇为恐慌，于是分兵五路，调遣飞机五百架、战舰一百艘，配合海军陆战队，企图沿长江西犯，占领我抗战重心武汉。就在这个时候，另一批苏联塔斯社战地记者和《消息报》摄影记者卡尔曼来到重庆。社长罗果夫又派我随同，取道汉口，赴湘鄂（湖南、湖北）的战地采访。我毅然答应前往。我们一行四五人从重庆搭一架送邮件的小飞机飞汉口，沿途在丰都、万县、巴东、宜昌等地降落，送收邮件。飞机小，摇摆得厉害，又不断上下起落，在机上每个人都头晕呕吐。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痛苦甚于他人。傍晚，在空袭警报中，我们总算平安抵达汉口。武汉居民正在紧急疏散，一片混乱。停留两天后，我们乘车赶赴湘鄂前线，到了那里反而觉得比在汉口安全多了。

我们先到濒临湘江东岸的湖南省省会长沙。八年抗战期间，长沙以三次会战得胜而成享誉中外的名城。当时日军主力全部转向武汉，湘鄂前线无战事，我们在长沙附近访问一批日本俘虏，他们一共13个人，低头坐在路旁，有的头部缠着纱布。路的左边是耸立的青山，长沙市在路的下方。古老庙宇的金黄色屋顶在阳光下闪烁，恬静、和平笼罩着小村落。我先问在大学上过两年学的汤田良仁：“为什么到中国来打仗？”他先是沉默不答，然后说，他也不知道，是征兵强迫的，初来时只知道到华北，很快就可以回去，没想到根本没有回家的可能。又问另一个叫谷一市的俘虏，日军捉到中国士兵怎么样处置？是否活埋、砍头。这个带小胡子的鬼子狡猾地说：“杀中国俘虏，我从来没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我只知道全送到后方去。”我们拿出从日本兵身上搜到的日记本给他看，上面写着：“将所有捉到的中国俘虏处死。”我恨眼前这一群，他们是受了日本军阀欺骗的野兽，不知道杀死多少我的兄弟姐妹！ 正在这时，晴空中回荡警报钟声，敌机前来轰炸衡山，炸弹爆炸的声音刺着我的心。每一声，不知炸死多少无辜百姓！敌机飞走，我们强忍着仇恨，回到俘虏前，姓张的同伴对俘虏说：“你们放心，中国不杀俘虏！几天以后，你们都会穿上新的干净衣服。”

我们还采访了自愿参加战时工作队的三十余位女同志。我们一起到她们的住宿处，围着小桌谈话。其中一位来自甘肃的女同志，高个儿，长得

很美，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很健谈。据她们介绍，工作队的主要职责，是每到一个地方，召回居民，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初步训练，让他们学会救护前线的轻伤战士，还派人到敌后探听敌情。

座谈中，一位姓尤的同志说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一天夜里，她们行军到一个离城六七里的小村庄，在村边找到一间茅屋，轻轻地敲门。一个老太婆手拿油灯来开门。她们说明来意，请求借宿一夜。老太婆立刻请她们进屋，不但把仅存的菜和米拿出，还献出不知保存了多少日子的半罐盐（湖南缺盐）。同志们看到老太婆有病，便请她休息，说有了东西，她们可以自己做饭。但老人家无论如何不肯，一个劲地说："你们替老百姓打日本鬼子，已够辛苦了。"她把饭做好，端给女兵们吃，她坐在旁边，看大家吃饱了，才去睡。

我们在前线会见了指挥作战的关军长和战区汤总司令，然后，由长官部派来的王参谋陪同，我们骑马前往第二军军部。湖南的乡间很富庶，我们在稻田间的小路上走，四边水田环绕，整齐的房屋建在山前，山上绿松夹着红叶。到了军部，才知道长沙一场大火，全城烧光，损失极大。长沙大火是怎样发生的，传说纷纭，迄今无肯定的证据。有一说：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可能领会"焦土抗战"的指示有偏差，在错误的时间把长沙城付之一炬，造成"敌人未来，自乱阵脚"的大祸。

在军部遇到派驻战区的两名苏联军事顾问和担任翻译的刘政因。刘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获工程硕士学位。抗日战争初起时，他由美返国参加救亡运动。其父刘哲先生（在台湾曾位居"考试院"院长），东北人，曾任工大校长。刘政因是桂籍的好友，和我早就认识，在前线邂逅，惊喜万分，像见到自己的亲人一样。他急忙告诉我，他的女友龚德明去了陕北延安，他寄去的信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他为此焦虑不已，还从怀中拿出她的照片给我看。他对她感情的真挚和执著，使我深深感动。

我们奔走于湘鄂前线各处之际，武汉会战于10月27日结束，我方有计划地撤出武汉。蒋委员长就撤出武汉发布告全国军民书："固守武汉之战略目的已达，后方布置亦已完毕，政府一贯决策，坚持长期战争，赢得最

后胜利。”自“七七事变”展开全面抗战至武汉撤退，为时一年有半，使得日军消耗惨重，战场扩大，兵力分散，攻势到了极限。在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我工厂、物资、学校安全西迁，建设了坚强的大后方，为长期抗战奠定胜利的基础。

局势变动如此重大，我们不能前往武汉。长沙虽遭大火烧毁，但仍在我方掌握中，只能先到长沙，再设法回重庆。在返回长沙的路上，除了一些到后方休整的部队，找不到居民。经长久的跋涉，终于回到面目全非的长沙，只见焦土一片，许多地方还在冒烟，断垣残壁林立，外出躲避的居民陆续回来，在废墟中重建街屋、店铺。不到一年的时间，死亡的长沙城“还阳”。复活的长沙，又招致日机后来的滥炸。

我们在长沙和当局研究返回重庆的路线。司令部派人员和吉普车，把我们护送到衡阳，然后见机行事。可以说我们的运气好，在衡阳遇到大批由武汉撤退的政府及新闻界人员，我们被编入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员工及眷属组。组里有魏景蒙和他的妹妹魏惟仪、沈剑虹等，魏、沈二人都是北平燕京大学的学长。停留在衡阳的一段日子里，日机不放过追踪，加紧轰炸扫射。我们利用走空袭警报的空隙，结伴爬著名的衡山，待警报解除再回城。苦难中取乐，只在年轻力壮时期能办到。

担任苏联《消息报》摄影记者的卡尔曼，气质高雅，文采超群，是谦谦君子，他不但拍照，也撰写新闻和文学作品。在漫长的逃难途中，他偶尔为疲惫的同伴们高歌一曲，动听的声线往往牵动每个人的心弦。卡尔曼回到苏联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原文及译文在附录三）。

离开衡阳往重庆的准备工作终于妥善完成，动身的日期确定了，这将是一趟十分艰苦和危险的路程。数十辆各型号的汽车，浩浩荡荡地前进。抗战期间汽油奇缺，车子用的是煤油或柴油，常常出毛病，一路走走停停，不记得走了多少天，经过多少城市和村庄。只记得在“风景甲天下”的广西桂林停留数日，补充物资，并恢复精力，也顺便游览胜景。从桂林到贵阳，多是盘山公路，路旁是崎岖的山，有一段“七十二拐”的山路，被称为“鬼见愁”，常出车祸，人人心惊胆战，好在平安走过。贵州山高地瘠，人民生活困苦，沿路看见不少肩扛或挑盐砖的挑夫。战时物资匮乏，食

盐最为紧缺，尤其是在贵州，“一担谷子换一斤盐”是乡间普通的叫价。

三　敌机狂轰滥炸下，不屈的陪都重庆

回到重庆已是1938年岁末。这时的陪都，取代了首都南京和上海、北平等大都会的地位，作为这三个城市的“结合体”，一跃而成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我在塔斯社的工作以及生活起居恢复正常。工作之余，我根据1938年一年中在各前线亲历的台儿庄大捷、徐州大突围、武汉撤退、湘鄂前线战况、长沙大火等，写成文学作品，投寄各报副刊。重庆《中央日报》于1939年2月4、5、6三日连载的《在前线》是其中一篇（原文在附录四）。

战前，重庆已是中国西南最富庶的区域及文化重镇，文风鼎盛，文人辈出。八年抗战中，重庆是司令部和根据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名城。全国有名的中、大学校多迁到四川，精英云集，无形中促成了不同地区、语言、种族的大融合。生活虽然艰苦，但人与人之间极为亲切，不分军民，不分老幼，不分本地外省，同心抵抗敌人。中央政府迁到重庆以后，为了避免日机轰炸市区，遭受无谓损失，把从重庆到北碚这一区域（长80公里、宽约20公里的地带）划为“疏建区”，不少机关、学校和军公教人员的眷属都分散居住在这一带。沙坪坝是有名的学府区，距离重庆“疏建区”约20公里，著名的中央大学、复旦大学、重庆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四川省教育学院、南开中学等，都分布在这个区域内。报社、通讯社及全国性的文艺团体，也集中在重庆。

日本军阀妄想以空袭挫抑我军民的抗战意志，瘫痪我的生产力量，动摇抗战基地，日机大举空袭重庆从1939年5月3、4两日开始，从此每年5月初旬，雾季一过就来袭，直到10月中旬雾季来临才停止，长达半年之久。每日上午10时到下午5时左右，差不多没有一天间断，轰炸、扫射、扔燃烧弹。有时明月当空，还来一场夜袭，日夜不歇，我们称之为“疲劳轰炸”。重庆是名副其实的“雾都”和“山城”，多亏人和、天时、地利，重庆得以屹立不倒，军民流汗流血，抵抗到底。重庆的房屋，每年春、

夏、秋三季遭受狂轰滥炸，几乎成了平地，但一到冬季便又重建起来。冬季雾太浓，有时别说车、船不能开，连走路也会迎面相撞，但难不倒重庆的居民，大家趁着雾季赶建房子，用木头做屋架，以竹篱笆和稻草做墙，石灰一涂，十天半月，一栋三层楼便立起来了。

为了对付变本加厉的空袭，政府全力开凿防空洞，整个重庆市建筑在圆顶形岩石上，沿江马路旁的峭壁间及陡坡上，都有大小深浅不等的防空洞，一些机关、团体和家庭也凿了防空洞。重庆最大的防空洞在市中心商业区，可容纳一二万人。传说这条又宽又长的地下通道，早在明代就有了，从前用来囤储粮草。它有好几个进出口，抗战时用的是石灰市附近的一段，敌机用五百磅，乃至一二千磅的炸弹也炸不透。每遇敌机前来窥探，重庆最高岗“浮图关”上就挂起一只大红球，同时，高山或建筑物顶端上的许多长竿子也挂起红球，人们开始上下坡，进防空洞。挂上两个大红球，表示敌机即将来临，警报响了。敌机入市区，红球马上全被放下，同时拉紧急警报。敌机疯狂施虐后离去，“解除警报”的信号拉响，不久，人们离开防空洞，返家或回工作处。有时刚出洞，第二批敌机来袭，赶紧回到防空洞，接二连三地进出。通常洞内都有电灯设备，但灯光微弱。没有电灯的防空洞，要自备蜡烛、煤油灯或手电筒。洞内两旁设有长条木板凳。洞里很潮湿，水珠从石洞顶滴落，积在地面。一些机关的防空洞，有首长办公小间，有桌椅和电话，可与外界联系，批谈公事。大家进防空洞坐定，都静下来，清楚地听到洞外日军轰炸机隆隆地掠过天空，不久，传来炸弹、燃烧弹的爆炸声，我方高射炮的发射声和房屋倒塌声。炸弹掉下来，即使不是直接落在防空洞顶或洞旁，洞内的人也被震得蹦起来，耳边犹如铁锤猛敲。洞口虽设有回墙，但强劲的风阵阵鼓入，使人坐也坐不稳，连喘气也费力。一时间，紧张、恐惧和愤恨充塞每个人的心。倘若防空洞不幸被炸弹击中，倒不一定随声崩塌，但会强烈震动，洞内泻下泥土石块，有如天崩地裂的大地震。有一次枣子岚垭附近的学田湾遭到轰炸，塔斯社及其他机关受到波及。我和索妮亚居住的阁楼，门窗和一部分屋顶及墙壁都被震毁，屋内尘埃弥漫，凌乱一片，幸好无人伤亡。“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在1941年6月5日，其时正值雾季刚过，日机又开始灭

绝人性的“疲劳轰炸”，一波一波轮流来袭，爆炸声如天崩地裂，到处是熊熊的火海。市中心商业区的大隧道内，约有两万人，十分拥挤，因时间太久，加上通风设备发生故障，洞内的人因氧气不足，呼吸困难，向外挤出，但栅门冲不开，洞内的人或者因踩踏、或因窒息而亡，很少幸免于死。事过很久，那一带的商店与民居依然全关着门，因为人都死在隧道中了。据少数生还者说，他们逃过此劫，是因为没有一窝蜂地向栅门口冲，而是尽量往后缩，面向下躺在潮湿或有积水的地方。日寇这种完全以平民为攻击对象的反人类行为，轰动全球，引起全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

四　访问延安，听毛泽东演讲，看江青照相

国民政府为集中党、政、军、民总体力量，与敌人周旋到底，指令各战区在战地划分游击区，派遣部队渗透敌后，在绥察、河北、山西、江苏、河南、安徽、湖北地区的敌人后方建立游击根据地。山西的太行山、中条山及吕梁山区的游击队最为活跃，被敌人视为心腹大患。

就在这种形势下，我和数位苏联战地记者到山西中条山战区及陕北延安采访。这一趟路程，十分漫长而艰苦，要经过耸立在川陕边界、绵亘一百多公里的剑门蜀道，要越过有七十余大小山峰、遍布绝壁悬崖的大巴山和秦岭。没有火车或飞机可坐，只能坐以煤炭为动力的汽车，走崎岖弯急、险象百出的公路。我们先从重庆到成都，再经汉中、宝鸡，由宝鸡乘坐一段火车到了西安，一路心惊胆战，总算平安。

我们一行经过黄陵时，到中国元祖黄帝陵前祭拜，以示敬仰。然后北上，到了名闻中外的延安。这是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周恩来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为该部第三厅厅长。在延安，有培养干部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及“中央党校”，还有“抗日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八路军在重庆及西安两地设立办事处，在陪都重庆发行《新华日报》《群众杂志》《解放周刊》等。

在延安，第一个印象是高高低低的褐色山丘上，蜂窝般分布着窑洞，窑洞有木制门和纸糊的窗户。城里树木很少，灰尘很大。泥土路上年轻人

来来往往，都穿着蓝黑色或草绿色粗布列宁装，脚上是稻草编的草鞋，看起来朴实、富有朝气。

我们被安排到招待所住宿，那是一座面积不小的窑洞，有数间卧室和客厅，墙壁是石灰粉刷过的，墙上挂着列宁和毛泽东像，有电灯和军用电话。抗日大学坐落在招待所山脚下的一大片空地上，校舍是新搭成的，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是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罗瑞卿，他接见了我们。每天早晨天初亮，听到抗大学生在操场上洪亮的歌声。

虽然我没有机会采访毛泽东，但他接见了我们。在一场露天演讲会上，和他握过手，并坐在人群中听他讲话。也看到年轻活泼的江青，她梳着两条短辫子，手拿照相机，跑来跑去给毛泽东拍照。

我本以为到了延安可以见到一些燕大的同学，联络员回说他们都上了前线，不在延安。有一天早晨，我从窑洞出来，看见不远处一座山丘窑洞门前，站着一个女孩，她虽也穿着草绿色衣服，但草鞋面上钉着耀眼的红色绒线球。她看到我，走过来打招呼，急切地问我：认不认识也是哈尔滨籍的刘政因？他近况如何？又说寄去的信都无回音。我这才想起，为什么似曾相识，原来她就是我在湖南长沙前线遇到的桂籍朋友刘政因日夜思念的女朋友龚德明，我见过她的照片。我告诉她，刘政因也写了许多信给她，但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她听后，又激动又难过，匆匆道别，说找机会再来看我。但她没有来。以后我知道，她在延安嫁给抗日大学副校长罗瑞卿，名字改了，叫“龚明因”（也许是因思念刘政因而取此）。

还有一天，一位中共要员来看我。他不但是桂籍的同乡，还是桂籍中学和大学的同学，叫吴庆祥，我也认识他，看样子，他在这里蛮得意的。寒暄后，他请我转告桂籍，他需要一只手表，还请为他的干女儿买一副毛手套，让桂籍设法带给他。吴庆祥后来改名吴德，曾担任北京市领导多年。

我们在延安参观了各级学校及其他设施，停留三四日后，乘车到陕西和山西边界，要渡过黄河到山西中条山战区。适遇黄河涨水，无法横渡，只有等水落了再乘渡轮过河。过了黄河，骑马数日，上山下山，又一次亲身体验最前线将士的艰苦。

中条山战区是我在敌后建立的游击基地之一，在这里，流动性和危险性较大，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出击。部队生活条件也较苦。但我游击队深得民众的拥护，战术机动灵活，随时化整为零和化零为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日寇频频“扫荡”，却损兵折将，伤亡万余人，并无所获。我们离开中条山游击区以后，循原路返回重庆。

五　烽烟中人生百态，邓颖超和我们一起跑警报

重庆是大陆有名的“四大火炉”之一，七、八月温度常在摄氏38度以上，炎热难当。日机仍不分昼夜的空袭重庆及其近邻地区。重庆没有自来水，也无法凿井，饮用水靠挑水夫一桶桶地从江里挑上来，盛在水缸里，先用明矾打一打，水才会清，但缸底总有一寸左右的沉淀物，舀水要小心，太猛了会盛出黄泥。大家用水都很节省，早上一盆水，先用来洗脸，留到晚上再拿它擦身子或洗内衣裤。但我和索妮亚住在塔斯社宿舍，用水好像没有受到限制，也不觉得太热。可能是因为石块砌成的墙够厚，室内有电扇，和一般政府机关及住家的情形不大相同的缘故。

这年头，逃难到重庆的人太多，加上敌机狂轰滥炸，焚毁的房屋太多，到处可见简易的竹屋和茅舍。一般公务员、学生和老百姓，衣着以朴素实用为原则，男人多穿“罗斯福布”（美国援助的绿色棉布）制的中山装，女人穿阴丹士林布（深或浅蓝色棉布）缝成的旗袍或衣裙。而我所穿的衣服算得“讲究”，上班多半穿滚缎边的旗袍，配同色的毛衣或外套。我还有一件颇为“名贵”的“海福绒”大衣和玻璃丝袜，这些在战时的重庆买不到，是王玉彬托她的好朋友虞春富代买的，虞的先生担任飞行员，经常往返港、渝，可以买到这些。玉彬这样做，理由是我在外国机关做事，穿着一定要体面些。她也从汉口到了重庆，在重庆卫生署药品管理委员会工作。她有实干能力、为人热心，在多难的重庆多亏有这么一位知友，多方面关心照顾我。

罗协邦也逃难来到重庆，她已和“飞将军”易国瑞结婚，两人都是湖南人，情投意合，成就“英雄美人”的姻缘。朋友们常开玩笑说，易国瑞

是“开着飞机苦追，才追到协邦”，不过，也经过不少波折。易原有妻室及两名子女。

南京失守后近两年，景荷荪得到国防部正式通知，其夫谢承瑞团长在南京被围一役中殉职。随后，荷荪毅然把女儿尊一留在泸州，只身赴成都，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由南京迁来）续读化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李赋萧也在迁校成都的中央大学续读医科。我收入较丰，每月都汇款资助她们。与谢承瑞同在教导团任团长的钮先铭，在南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避过劫难，逃至一庙宇中躲了八个月，然后化装逃出，到后方去寻找他的妻儿。千辛万苦找到时，妻子已改嫁他的赖姓好友！这是谁的错？又能怪谁？战争造成天人永隔、妻离子散的人间大悲剧！他以后在香港和谢承瑞的妹妹谢承美结婚，并写了一本有关的书，名叫《大江东去》。

1940年，我的室友索妮亚与一位苏联武官过从密切，发现身体有异时已怀孕数月，只好辞去塔斯社的工作，潜返上海父母家待产。这时，我经由社长罗果夫的介绍，认识了哈尔滨同乡朱新民先生。他不久前由苏联来重庆，他的俄文极好，小学、中学、大学都上俄国学校，中文会讲，但认不了字。不久，他被政府罗致到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负责俄文方面的工作。

抗战初期，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军事方面和我国紧密合作，在重庆的俄国人相当多。国际宣传处的处长是曾虚白先生，而真正的负责人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先生。处内分设编辑、外事、对敌、摄影诸科。外事科内又分为英文与俄文两组，英文组组长是沈剑虹，俄文组组长是朱新民。魏景蒙一直负责外国记者新闻稿的检查，后来则由沈琦及徐锺珮协助。

国际宣传处虽然名义上归中央宣传部管辖，但实际人事权与经费划拨都直接由军事委员会负责，蒋介石委员长亲自指挥。抗战八年，宣传部的部长换了十位，而国际宣传处的主管一直是董显光副部长，没有换过。这可证明国际宣传处在抗战中的贡献及受政府重视的程度。朱新民接掌国际宣传处俄文组后，急需人手协助，再三向罗果夫社长请求借调我。而我在塔斯社已工作了将近三年，也愿意换个新环境，何况室友索妮亚离开

后，我颇有孤单寂寞之感。

1940年6月，我请辞获准后，离开了苏联塔斯社，到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报到。我被分配到外事科俄文组任专员，工作性质和在塔斯社时相似：把每日中文报纸及杂志上有关各方面的消息，特别是前线战况及各报社论，择要译成俄文，油印后，当日即分发到有俄国军事顾问及技术人员的机构，包括苏联塔斯社。并尽量分寄到有苏联人员的战区及敌后各游击区。我在国际宣传处比在塔斯社更加忙碌，也更觉有意义。

俄文这一组，除了组长朱新民和我外，还有一位秦太太，她先生秦涤清在外交部工作，和桂籍相识。秦太太人很友善，也是俄文好而不会中文，她年龄比我大许多，经过多年交往，我们成了好朋友。我燕大毕业后，由成都返回重庆到中央通讯社工作时，有一段时间就住在秦家。举行婚礼时，桂籍也是来秦府迎娶我这新娘。后来外交部派秦先生到苏联任外交官，秦太太也就辞去了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他们没有子女，临行前领养了孔祥集五六岁大的女儿，一起远赴苏联。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动荡不安，他们没有回国，由苏联直接到美国定居养老去了。客居外国的生活并不如想象的安适，多年前秦太太去世，女儿结婚离家，秦先生回大陆老家去了。

国际宣传处借用坐落在重庆上清寺的巴县中学（巴县中学因躲避日军轰炸，已迁至疏散区）原校址办公。该校几栋砖瓦水泥建筑，做了办公室和宿舍，并在广阔的校园内搭建了许多茅屋，供单身男女职员及有眷属人员居住。处长曾虚白及董显光两家也住在这里。我们十来个单身女职员住在有两个房间的茅屋内，雇请一位女佣打扫、洗衣及烧洗澡水。茅屋泥墙草顶，冬暖夏凉，比竹屋好，可惜重庆是建于岩石上的山城，散热不易，夏天固然酷热，而冬季刮起西北风，雪花纷飞，棉袄、厚外套也挡不住刺骨的寒冷。

住进茅屋后，才真正领教了重庆“三害”：臭虫、老鼠、跳蚤，外加蚊子。重庆的臭虫无处不有，无孔不入。家里、办公室、旅店，甚至饭馆、渡船、人力车及滑竿上，有缝隙就有臭虫，手一摆，身一靠，马上被臭虫咬出红疙瘩，又痒又痛。宿舍里每人一张竹板床，床脚用加满水的大

土碗或铁罐垫着，把臭虫隔开，但臭虫还是有办法，爬上天花板再“空降”，或沿蚊帐绳子爬到床铺上。大家隔一阵就轮流把竹床搬到院子里，用烧开的水烫臭虫。重庆的老鼠满街跑，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大奇景：上千老鼠成群结队大搬家，大摇大摆，横过马路。“跳蚤处处有，唯独重庆多”，跳蚤随老鼠而来，老鼠既然歼不尽，跳蚤也就灭不了。

食的方面，大家都吃伙食团的包餐。食堂里每桌八至十人，我们这一桌有：朱、秦、我，以及叶公超、魏景蒙、朱抚松、徐锺珮、沈琦等人。吃的是政府提供给公教人员的“配给米”，色多半黄褐，掺杂谷子、麦子、稗子、沙子、石子乃至老鼠屎。每次吃饭前，先挑拣出杂物再动嘴，因而谑称之为“八宝饭”。菜肴方面，常吃“辣椒炒豆豉”、“清炒空心菜”，每月两次“打牙祭”，可吃到“红烧五花肉”或“粉蒸肥猪肉”。平时我们这一桌轮流“请客”，加炒一大盘“肉丝炒青椒”或“肉丝炒榨菜”，在当时算是十分奢侈了。

国际宣传处为职员、眷属及外籍记者在附近石坡旁，凿了一座坚固的专用防空洞，内部设备较齐全、舒适，空袭警报拉响时就不必跑太远了。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也到我们防空洞内躲避过。那已是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夫妇和机要秘书龚澎等来到重庆。国际宣传处所在地上清寺和国府路、牛角沱一带是国民政府的机关及蒋委员长官邸所在地，所以成为敌机空袭的主要目标。因此，我们只要见到高岗上挂起一只大红球，预报敌机即将来袭，就不等拉起紧急空袭警报，先躲进防空洞以策安全。余梦燕也在国际宣传处工作，她已和燕大学长黄遹霈结婚，没有和我们一起住宿舍。

和我常来往的还有燕大同学周光瑚（笔名韩素音），她父亲是四川人，母亲是比利时人。她抗战前离开燕大到英国留学，继续读医科。政府宣布对日抗战时，她放弃了在英的学业，返国参加抗战，在轮船上遇到年轻英俊的军官唐保黄，两人一见钟情，返抵国门就结婚了。唐在重庆军事机关服务，光瑚在家看顾初生女儿蓉梅。那一段时间我们常常见面，也十分谈得来。不久，唐保黄被派到伦敦，任我国驻英使馆武官。我结婚时所穿的枣红色旗袍布料、麂皮灰蓝色鞋等物，就是光瑚托人从英国带给我的。抗战胜利后，唐保黄先回国就任某师师长职务，被派赴沈阳附近打虎

山驻防。他赴任前曾来看我们，对新职表示满意，但对驻防“打虎山”有些疑虑，他说：“我属虎，派驻打虎山好像不太妥当。”果然，上任不久死于国共内战。光瑚没有马上回来，留在英国读完医科，获医学博士学位。返国后曾在马来西亚、香港等地行医，并以“韩素音”为笔名出版了以英文撰写的小说，其中《生死恋》一书轰动一时，后被好莱坞拍成电影。我们移居台湾后，和她还有书信往来。

桂籍由前线返回重庆后，在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任职，他住在离上清寺不远的国府路，和他的同事刘在勤（也是哈尔滨籍）、丁志伦夫妇分租一栋民房。刘、丁两人都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已育有一子一女（刘宇、刘樵）。刘在勤和刘德成、孔祥集同时毕业，丁志伦读工大预科，年纪不满二十岁就出嫁了。刘、丁两人热诚好客，哈尔滨工大、法大在渝的同学经常到他们家聚会、“打牙祭”，我也在那时认识了他们。后来，为了躲避日机昼夜不断的轰炸，国防部眷属被疏散到重庆附近的小岛——唐家沱，有轮渡往返，刘府也迁居唐家沱，和张剑飞、马熙诚两家合住一栋两层楼房。张、马是学俄文的，都在军委会顾问处工作。刘在勤被调到成都空军单位服务时，丁志伦已怀上第三个孩子，即将临盆。刘在勤到任后两三个月，有一天清晨，同住成都励志社共一寝室的同事，睡梦中忽闻枪声，惊起查看，发现刘仍卧床不起，原来被枪击中要害，气绝身亡。查不出死因，到底是他杀、自杀或枪支走火，一直成谜。朋友们深感惋惜，丁志伦更是痛不欲生，拒绝饮食，哭闹不休，由我和工大谢之熙太太黄静轮流陪伴。轮到我看顾她时已是下半夜了，志伦忽然向我要水喝，我很高兴地倒了一大杯水给她。没想到，她趁我不注意，竟扯下颈上戴的粗重金链子，吞进肚子，还喝下一瓶“来索”消毒水，把嘴巴、喉咙、食道烧伤了，送到医院急救。她精神更加恍惚不安，胡言乱语，哭笑无常。庆幸的是金链子第二天就排泄出来了，没有伤及内脏。她的情绪也随着遗腹子小钢的出生而稳定下来。伟大的母爱使她毅然担负起独自养育三个幼小子女的重责。战时的生活原本就艰苦，她的处境更加困难了。

这期间对我而言还有一件“大事”。丁志伦知道，能干的药剂师王玉彬是我的好朋友，再三要求我介绍她俩认识。她想请玉彬帮忙，拿抚恤

金当本钱，托人在香港代购一批西药，在重庆转售，赚取二三倍之多的利润。桂籍知道这桩事，坚决反对。最初玉彬也不肯，说这是“卖命钱”，她不能拿来冒险。经不起丁志伦苦苦恳求，玉彬的口气松了，但说只能用抚恤金的半数。就这样，玉彬开好药单，转托虞春富的飞行员丈夫飞港代购。谁也没有料到，就在这时，香港陷敌，日军占领了香港。虞春富的丈夫滞留香港，情况不明，消息全无，急坏了我和玉彬。我和玉彬商量，决定先不告诉丁志伦，两人设法筹足款子，再还给她。第二天，玉彬匆匆跑来找我，让我马上到唐家沱把丁志伦手中存的抚恤金余款全部拿来，她在重庆当地买进重要的进口药品。不数日，重庆的药品价格，因香港货源断绝而飞涨数倍。玉彬不但把丁志伦的本钱全部还清，还赚了不少钱，都送给了她。

1941年12月7日，日寇偷袭珍珠港，引燃太平洋战争，美国正式对日宣战。1942年1月，中、美、英等26国在美国华盛顿发表反侵略共同宣言。同时，同盟国宣布成立中国战区，蒋委员长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国际形势的转变对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产生了有利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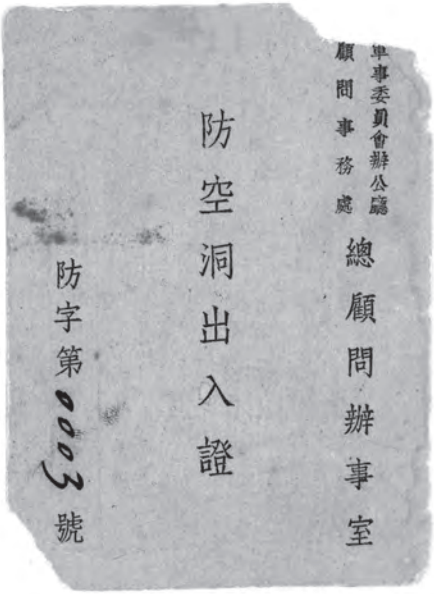
战火中加入苏联塔斯社（1937—1940）Ⅰ

由前线返回重庆，举行记者会，我任翻译，左立者为我

战情简报，对座左一侧视者是我

我接待来访国军女军官

摄于重庆塔斯社大院



軍事委員會辦公廳
顧問事務處
總顧問辦事室

防空洞出入證

防字第0003號

我的防空洞出入证

枣子岚垭塔斯社与来访国军军官及友人合影，右二是我

战火中加入苏联塔斯社（1937—1940）Ⅱ

日机疯狂轰炸重庆，我居处墙壁屋顶多处震塌

摄于塔斯社大院内

我在塔斯社聚精会神审阅俄文文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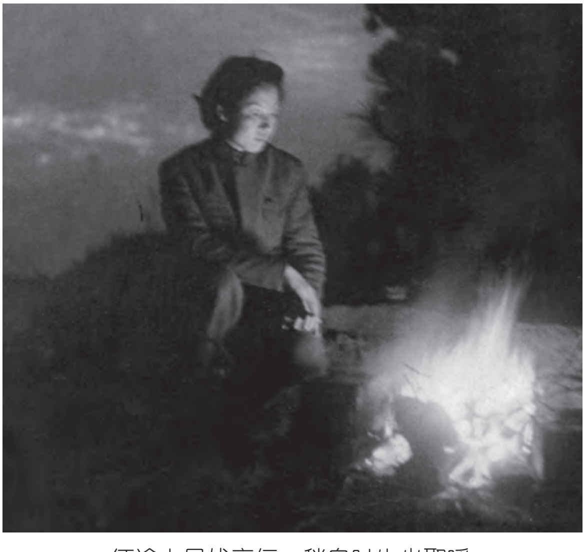
塔斯社副社长叶夏民先生略谙中文

与友人在山城合影，后排右是我

我与塔斯社室友索妮亚及儿童合影

亲赴战地最前线采访报道 I

1938年11月，我与卡尔曼在湖南前线



征途上昼伏夜行，稍息时生火取暖

我在路旁丛中躲避日机低飞扫射及轰炸

湘鄂前线采访，途经恬静小村落

“还照？”面有嗔色，但实在太累倒头睡去

左下图：黄河边等待摆渡。其余三幅为战地剪影

亲赴战地最前线采访报道Ⅱ

1938年11月我到湘鄂战区前线采访，马背上右一是我

卡尔曼抢拍长沙大火现场镜头，由我摄下

顺访洛阳龙门石窟，我在右一，卡尔曼在后左一

后立者左一是我

赴山西中条山战区途中，在黄河边躲避日机轰炸

已近夜晚烧火堆取暖，一旁汽车用树枝遮掩伪装

战地夜宿偏僻村庄内，空无一人的破旧老屋

龙门石窟前的合影，左一是我

父亲生前所嘱“不到前线”，我未能遵守

六　成都续读燕京大学，完成父亲遗愿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迅速以武力占领了华北。当地各大学多迁往后方。燕京大学乃是例外，它以校产及经费均为美国所有为由，继续悬挂美国国旗，对付日本，借以维持校务，勿使中断。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对日宣战。北平燕京大学即被日军包围，宣布解散。学生及教员被拘押数十人。司徒雷登校务长也被软禁，直到战争结束，方恢复自由。燕大被日军解散的消息传到重庆，燕大校友群情激动，一致决议要在后方复校，遂召开临时校董会，推举梅贻宝为复校筹备处的主任。当务之急是解决校址，迎接由沦陷区来到后方的燕大师生。筹备处经权衡利弊，最后仍以成都为首选。理由是成都为大后方的重心，又接近陪都重庆，是四川稻谷的汇聚点。成都讲文化，素有“小北京”的称号，而最有说服力的因素，是成都基督教大学联名表示欢迎燕大在成都开课，共同营造“教育之都”。四川省主席张群先生及燕大校董孔祥熙先生也大力支持。

我听到好消息，说1942年（民国31年）北平燕京大学将在四川成都复校，6月开始招生，10月开学（较其他大学迟两周），十分兴奋，向已工作了两年的中宣部国际宣传处辞职，到成都续读一年，完成大学教育，以不负父亲对我的叮咛和希望。

离开国际宣传处，虽然不失为明智，但也经我事先反复衡量、取舍，毕竟不容易。国际宣传处在抗战期间的重要性、声誉、地位，除了中央通讯社，少有同类机关可与之分庭抗礼，而同事之间感情融洽，犹如处于一个大家庭，同甘共苦，工作、吃、住都在一起。我的工作很有意义、很重要，而我胜任愉快。国际宣传处培养出来的青年才俊，以后不少成了国家的栋梁。叶公超、朱抚松做过“外交部长”，董显光、沈琦、朱抚松、沈剑虹、凌崇熙、温源宁、叶公超、邵毓麟、夏晋麟、郑宝南等人当过派驻各国的“大使”。在台湾，原国际宣传处同仁担任“新闻局长”的先后有沈琦、沈剑虹、魏景蒙三位。经几番挣扎，我决定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

辞职手续办好了，入学许可也得到了。离开重庆前，偶然遇到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先生，我把去成都读书的事告诉他。他很赞成我的决定，

并说："毕业后回重庆，欢迎你到中央社来工作。"短短几句话，对当时的我，是多大的一份力量，一份鼓励！于是，我满怀信心地到成都去了。

9月底，我在成都就学的前夕，接到继母托人从哈尔滨辗转寄来的信。她告诉我，我的父亲在日本的统治下，受尽了折磨、屈辱和饥饿，感染了斑疹伤寒。得病后，因得不到良好的营养和治疗，于1942年（民国31年）5月在哈尔滨不治死亡，那个时候他还正值56岁的中年时。父亲临终时不断叫着我的名字。每念及此，心如刀割。失去父亲，使我悲痛逾恒，我无比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无力和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在世时，女儿无法遵循他的意愿读完大学，这是重大的遗憾。如今，哪怕遇上千难万难，也要完成父亲的遗愿。多年来，我所看到的、听到的、亲身经历的都是妻离子散或生离死别的人间大悲剧，而这些都是日本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所造成！这血海仇恨永烙我心，中华儿女又岂敢稍忘？！

许多年以后，我见到复成弟，他还告诉我一些我远在四川，和家人断绝了音讯那十年所发生的事情。父亲再三嘱咐复成兄弟，假若有一天，生死不明的叔叔回来，一定要把家产分一半给他。复成弟最后一次回山东老家朱由村，是护送父亲的灵柩回乡安葬。那时外婆还健在，四姨父也回来了，四姨生了一个男孩子，和外婆住在一起。而瞎眼的奶奶复明了，我想她患眼疾是当时生活过于清苦，营养不足所致。

燕大在成都选址颇费周折。美、加教会合办的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校址在成都城外岷江南岸，称"华西坝"，校园广阔，校舍壮观。但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及济南的齐鲁大学，已先后迁到成都，与华西大学合作，共用华大的课室、图书馆、实验室等设备，并在校园旁的边缘地带建造临时宿舍。华西坝既已"客满"，燕大只好另作打算，在成都租下华美女子中学及启化小学的校舍，这两所学校毗连，地址在陕西西街廿七及廿九号。两校的师生因躲避敌机轰炸，早已疏散到外县。两校对街就是卫理公会礼拜堂和同仁眼科医院，桂毓即在此医院实习。华美女中的主要建筑，是一栋两层高楼宇，内有教室六七间，还有小型礼堂和阅览室。原来的顶楼、阳台、过道等，加以简单装修，即可辟为办公室。大楼的前院较小，后院较大，建有三层楼房一座，下层是女

生食堂，上两层是女生宿舍，住进120名女生。我和室友——湖北籍的耿曾荫住在三楼，室内双层木板床，她睡上铺，我睡下铺，一张书桌共用。耿是由沦陷区来后方就读的，好像是大二生。我们相处融洽，只是她较懒散，衣物、书籍乱放。有一天深夜，宿舍发生火警，浓烟弥漫，我睡梦中惊醒，急忙穿好衣服，先把被褥、衣服、书籍用床单包好背上，用手提着大皮箱，由三楼急速走到对街的同仁医院人行道，再返回宿舍帮助耿曾荫收拾凌乱的衣物。这一教训倒使她知道，必须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耿曾荫的男朋友阮某是驱逐机飞行员，他每次出任务，我陪着她提心吊胆，直到他安全返回基地为止。所幸一年多后，抗日战争胜利，他们结婚生子。后来我在台湾还和他们见过面。

启化小学规模有限，校舍用作教员宿舍，每家两间，梅校长一家也在内。男生和单身男教员则借用离陕西街和华西坝不到半里的文庙，还算方便。200多男生挤在各庙室双层木板床上睡觉，大成殿则用作餐厅，就这样，勉强解决了男同学的食宿问题。战时生活越来越苦。成都人口骤增，电力不足，只好分区轮流停电，先是每四夜停电一次，后来每三夜停电一次。晚间学生集中在礼堂，学校发给菜油灯用以温习功课，但油灯下看书效果不佳。再就是人人营养不良，疾病丛生，医药又缺乏。我当时身体瘦弱，极度贫血，低头弯腰头晕眼花，甚至晕倒过几次。多亏成都不是军政要地，日机很少来空袭，免去跑空袭警报之苦。另外，成都有我的好朋友景荷荪、李赋萧、罗协邦，还有孙桂毓，他们尽心尽意地照顾我。景荷荪已再嫁，丈夫是湖南籍的营建商何远经先生，何不到40岁，为人正直忠厚，婚后生活美满。荷荪还在金女大任助教。李赋萧医科毕业后，在成都市立医院做实习医师，并有了男朋友王培仁，他也是医师，两人情投意合，已有结婚的打算。罗协邦由重庆迁居成都，是因为其夫易国瑞调职，到成都郊区新津飞机场任场长。协邦曾抱着一岁多的女儿易榕青到燕大来看我。我毕业前，协邦生下长子易正宇，派吉普车接我到新津住所吃满月酒。

1937年在汉口马路上巧遇的韩伯母（韩松林的母亲），也到成都励志社任职，工作与苏联空军有关，免费供应营养伙食。韩伯母经常把她那

份早餐中的一只鸡蛋煮熟，自己不吃，带来给我，战时能吃到鸡蛋很不容易。她的长子韩墨林被派到新疆工作，那边情势复杂，到职不久就失去联络，从此失踪，生死不明。那时她的次子松林的工作即将结束，他体格粗壮，身材高大，因年龄、经济及学历的限制，无法进入普通中大学校，我建议他去投考军校。

1942年（民国31年）10月1日，在四川成都复校的北平燕京大学正式开课。注册学生依照预计共有300名。从北平来成都复学的旧生，无法限制，随到随上课。第一学年结束时，学生共计364人，其中约150名是来自北平的旧生。我和余梦燕虽然来自重庆，但算是燕大的“老旧生”。缴清全年学费500元后，选好科，住进分配的宿舍，开始上课。

交了学费，身边留下每月的伙食费，至于零用钱，则没有着落了。幸好我在学校申请到一份工作——帮助哲学系施友忠教授上课时点名及批改同学的考卷。我除选读了一两课教育必修课程外，还选读了梅贻宝教授的《哲学概论》，并和余梦燕选了政治系一门颇难读但叫座的《国际公法》，是吴其玉教授的，每周两次，还要到华西坝和别校同学一起听课。另外，我选了家政系杨敏娴教授的《营养学》，对各类食物及各种维他命有了较深的认识，使我一生受益。

在成都回炉当学生，生活虽然清苦，却是一生中最轻松愉快的一年。好友们知道我哪天没有课，就到学校来看我，不忘带些食物和必需品。每个周末，我固定到荷荪家住上两晚，周一再返校上课。荷荪的家舒适雅致，在那里无拘无束，感觉实在好。住所是一栋两层小洋房，前后有院。每个周六一下课，我就迫不及待地往荷荪家跑，一进门就闻到炖肉的香味。荷荪悠闲地坐在客厅火炉旁，一边烤火，一边细心炖煮浓郁的肉汤，供我进补。荷荪永远是那般善解人意、真诚亲切、从容不迫，让人从心底感到温暖。学校伙食很差，主食仍是难以下咽的“八宝米饭”和炒空心菜，偶尔有几片肥猪肉。周一清晨返校时，荷荪总不忘让我带一罐熬好的猪油，每餐往热饭中加一匙猪油拌酱油，滋味至今难忘！另外，每天午餐时，学校厨师特别会为我蒸一小碗猪肝，这也是荷荪看我严重贫血而商请校方提供的。何远经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文质彬彬，不慌不忙，话不多，

也像荷荪一样，待朋友肝胆相照，对荷荪专一，爱护备至，十分顾家。他从事营造业，每日很忙，有自用三轮车一辆上下班，每次他返家时，老远就听到三轮车的叮当声，这是他先通知家人：我回来了。有一次，我在荷荪家，荷荪预备了一桌丰富菜肴，嘱咐何远经早点返家共进晚餐，结果左等右等不见他回来。荷荪见菜饭凉了，一次一次拿去再热，端进端出，等得实在不耐烦了，脸越绷越紧，争吵有一触即发之势。不一会儿，远处传来叮当声，主人回来了。我躲到一角，不想参与纷争。只见荷荪态度忽然大变，笑脸迎门，嘘寒问暖，端茶递巾，愉快地招呼大家就座进食。事后，我问荷荪为什么那么"虚假"，装模作样？荷荪说："假若我不忍耐，这顿饭大家还能吃么？过去就算了，要多为他人着想。"遇到李赋萧值班的周末，她不能外出，我和荷荪会带去肉、菜、馒头到赋萧医院宿舍，炖上一大锅罗宋汤或大锅菜，大家又吃又喝又唱，其乐融融！住在学校，晚上饿得发慌，耿曾荫会带我溜出校门，到街口摊贩处买个烧饼夹猪头肉或猪耳朵，有时到附近有名的"吴抄手"吃碗猪油拈面（猪油拌干面）或一碗红油抄手（馄饨），这对我们穷学生来说，是十分奢侈了。

做学生的日子过得特别快，转眼到了寒假，有家的纷纷离校，学校虽然为无家可归的学生留下几间宿舍，但停了伙食，学校里冷冷清清。我被荷荪接到她家，住在楼上主卧房隔壁的房间。正赶上荷荪生产坐月子，她为何远经生下一个儿子，全家喜气洋洋。女主人声明在先，坐月子期间绝不下楼，也不管家务。每日清晨佣人王嫂端来一大碗"酒酿蛋"（加两三个荷包蛋）给产妇"发奶"，接着敲我房门，送来同样一大碗"酒酿蛋"，说是太太吩咐的，不能拒绝。如此，整个寒假我陪着产妇，晨、午、晚都在楼上，吃同样的滋补食物。荷荪说一定要把我弱不禁风的身体养壮。每天下午，大家聚在楼上小房间，喝"下午茶"。赋萧差不多每天都来，享用加糖和牛奶的红茶，另有荷荪早就备存的各式小点心。她们总是把最大的那碗热腾腾、香喷喷的奶茶给我喝。不知喝了多少次，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看见荷荪把她的乳汁挤入一个杯子里，加上好友们每天喝奶茶时的眼神，证实了我的想法：我喝的是荷荪的乳！为此，我曾大喊大叫，又吐又呕。吵闹平息后，赋萧说："人乳最富营养，医院中多少人想

买都买不到。照照镜子看你现在的脸色多红润亮丽，这都是荷荪的苦心啊！”

寒假结束，返回学校，我确实是精神奕奕，身体强壮多了。再苦读半年，就要毕业了。这时，对日抗战已进入第六个年头，在日伪的全面封锁下，物资更形匮乏，通货渐见膨胀，全国同胞艰苦支撑，同学们的生活越来越苦。幸好四川素称“天府之国”，粮食勉强可以自给。学校当局也费尽心力，维护同学们学业的正常进行和人身安全。

有一天，荷荪到学校来看望我，我拿出一双灰蓝亮色的新麂皮皮鞋，请荷荪代我在拍卖行寄售。这双鞋子是好友韩素音从英国伦敦托人送给我的。当时后方小型拍卖行林立，家中存有舶来品和较值钱的衣物的人，会拿去寄售，得款用以贴补日常开销。荷荪先是不肯，后来被我说服，但她再三说我定价太低。我说能卖出就算不错了。几天后，她兴奋地跑来告诉我，鞋子一寄售就卖掉了，并强调当初她就说价钱订得太低，提高些就好了。把售款交给我后，嚷着要我请客，到华西坝“TipTop”咖啡店喝下午茶。六月我毕业之际，荷荪买了三件同花色的绸料做成旗袍，分送给我和赋萧，一件留给她自己。我穿着这件旗袍照了戴方帽子的毕业照。参加毕业典礼时，荷荪叫我到她鞋柜找一双合意的鞋子，我打开鞋柜时，我那双灰蓝麂皮鞋赫然在其中。她说：“不要生气，我知道你喜欢这双鞋，就算是我送你的毕业礼物吧！”她的用心怎能不深深感动我！

这时，荷荪和赋萧还不放弃，又忙着为我介绍男朋友。荷荪请何远经邀请一位单身工程师，赋萧邀了两位年轻未婚的医师到荷荪家吃晚饭。结果他们无意，我也无心，“相亲”一幕无疾而终。最后荷荪谆谆劝我：“我看来看去还是那位孙小子对你最诚心，你还是回重庆吧。快三十了，还东挑西选，当心没人娶你。”

我即将离开成都返回重庆时，燕大校长梅贻宝夫妇邀我同游峨眉山，我欣然应允。梅校长夫妇、教育系廖泰初教授、一位女士（忘记姓名，是梅家友人）加上我，一行共五人，包租一条带篷的木船，由船夫带路，沿岷江向西南悠然划行。沿途数度停船登岸，除欣赏两岸美丽的自然风光外，还体验了四川村庄的朴实民风。船行至乐山，改乘公路客车到邻县峨

眉，抵达目的地峨眉山。在乐山，我们应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在台湾曾任“教育部长”“国史馆馆长”等要职）的热诚邀请，停留一日，参观四川大学及从武昌迁来乐山的武汉大学。

峨眉山海拔三千多公尺，在四川西南的峨眉县境内，是我国的著名佛教圣地。重叠秀丽的山峦，蓊郁的林木、飞瀑、流泉，神奇的金顶佛光、佛灯，两百多所大小寺庙，教人流连忘返，连高山上成群的猴子，也为游客们津津乐道。山下有出租的滑竿（滑竿是两根粗竹竿中间悬挂着坐椅，由两个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前后抬着，是年老者或妇孺登山的工具），但我们取步行，一路慢慢地走，随兴观赏。共走了三天，夜宿寺庙客房，倒也方便自在。游过报国寺、万年寺、白龙洞、清音阁、一线天、洪椿坪等名胜后，到了最高也最有名的金顶寺。这里海拔高，气压低，空气稀薄，六月炎热天，山上也有如冬季，十分寒冷。我们都从庙中租了棉衣，围炉烤火取暖。第二天清晨起床，发现每个人的脸部都变了形，脸和手、脚都肿胀了，眼痛头晕，呼吸急促、困难，山上住持告诉我们是“高山症”，其中最严重的是梅贻宝校长，雇了滑竿被抬下山。说也奇怪，到了平地症状马上消失了。不过，在金顶，除了梅校长，我们四人未放弃机会，在导游引领下，下午两点钟左右爬到金顶最高处的平台，俯瞰悬崖下万丈深谷，看到对面山谷中出现太阳反射出来的大光圈（俗称“佛光”），光圈里映着自己的倒影。这种自然界绝奇之景，一生中难得一见！有些乡下来的朝拜者见到这种影像，认为自己“得道”，遂忘我地跳下悬崖，葬身谷底。为此，这里用粗铁链隔开，并写有“想一想，跳不得”的告示。傍晚天色将暗时，可以看到千万盏光闪闪的“佛灯”，在苍绿的山谷深处飘浮。据说是这一带山中蕴藏丰富的磷矿所致。回程我们顺路还游览其他的名胜，如乐山、岷江东岸的世界独一无二的石刻大佛，名妓薛涛殉情的古井。二十一天峨眉山之旅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梅校长夫妇的关怀和廖教授一路上殷勤的照拂，虽使我无限感激，但我去意已决，不愿多生枝节。

我终于读完第四年大学课程，于1943年（民国32年）6月正式由燕京大学毕业。父亲当年的叮咛使我受用终生。持有大学毕业文凭，在重男轻女的社会，我站得住脚，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为社会服务。

七 重返新闻战线，进重庆中央社

从成都返回离开一年的陪都重庆，已是1943年（民国32年）初秋八月，虽经敌机无数次轰炸，人民生活多苦多难，但山城不屈不挠、巍然屹立。我也为自己学成后能顺利重返抗战岗位，为国家服务，感到自豪。

9月起，我正式加入中央通讯社，被派到总编辑室工作，职位是编译，总编辑是新闻界闻名的前辈陈博生先生。他毕生献身于新闻事业，曾任北平《晨报》及《中央日报》社长等职 。民国25年，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先生亲往北平，聘请陈博生先生为中央社驻东京特派员。陈先生精通日语，对日本政情了如指掌。民国26年对日抗战爆发，他回国担任中央通讯社总编辑，中央社新闻报道业务全盘由他督导，这也是萧、陈两氏为中央社业务发展合作的开始。后来中央通讯社成为世界重视的国际级通讯社，也是萧、陈两氏的贡献所促成。抗战胜利，陈博生先生代表中央社，赴日本参加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的受降仪式。民国37年他被新闻界选为立法委员。

在中央社服务的，不少是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学长，尤其在总社英文部、编辑部、编译部及国外各分社。其他各校新闻系毕业生，也以“进入中央社工作”为最高理想，引为莫大荣耀。在中央社编译部任主任的李宜培学长（他的太太陈兰滋也是燕大校友，我的好朋友）告诉我，我进入中央社工作的事曾轰动全社，同仁多以先睹“芳容”为快。

抗日战争爆发后，设于南京的中央通讯社总社被日机炸毁，中央通讯社按原订计划随着国军的转进，逐步向内陆迁移，由南京、武汉、长沙迁到陪都重庆，业务照常进行。不幸的是，1939年（民国28年）5月，位于重庆铁板街的中央社总社再次遭日机轰炸，两位同仁被炸死，损失不轻，好在事先有妥善的安排，工作没有中断。我于1943年（民国32年）进中央通讯社时，中央社已在上清寺两路口购置了一幢傍山建筑的四层楼房，非常宽敞，尽够全社所有部门使用。这栋大楼位于南区公园顶端，道路循山坡蜿蜒而下，直到嘉陵江畔的南区马路。由两路口的马路可直接进入建筑物

的二楼，主要的办公室如英文部、采访部、编辑部、编译部等，都分布在这层楼里，人众声杂，十分热络。而摄影、电务、征集等部门都在下层一楼。社长萧同兹、总编辑陈博生、机要秘书曹阴稚的办公室及会客室、会议室等，都在三、四楼，两路口总社大门对面是一座山坡，社方向有关方面请准，占用一个可容四五十人办公的大防空洞，一旦遭遇空袭就把编辑部和电台搬进洞内，继续运作，不致影响通讯和接发稿件。其他员工及眷属跑警报，沿公园路下坡，到重庆著名的燕喜洞去，那是一排庞大的防空洞，可容三四千人。山顶距离洞口六七百公尺，五百磅的炸弹落在山上，洞中人只会感受些微的窒息，但不会受伤害。

总编辑陈博生为人严肃，不苟言笑，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宽阔的房间内只有他和我，两人往往终日不发一语。我与他的长女陈琬若（她是桂云在北平女师的同学）早就熟识，所以称他为陈伯伯，倒觉得他平易近人。在社里，陈博老上班无定时，自由来去，我的工作也不固定，和在国际宣传处时的忙碌无法比。这种情形经过一段时间，我仍难以适应，因此，请求借调到其他部门去工作，也借此免除在总编辑室的拘束和不自在。

我曾在总社英文部和编译部工作过一段时间，两部的主任王家松和李宜培都是我北平燕京大学的学长，相处十分融洽，虽然他们已移居英、美多年，但直到现在还有联系。我的工作问题顺利解决了，但住宿却成了麻烦，中央社没有宿舍，我只好暂时借住离中央社不远的上清寺谢之熙黄静夫妇家。谢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毕业生，会俄语，由资委会借调到军委会顾问处，成了桂籍的同事。谢被派到前线工作，我就和他太太黄静一同住在他家。以后我又迁到秦涤清夫妇家，他们有一小房间给我住。秦太太曾是我在国际宣传处的同事。她当时已辞职，夫婿到苏联莫斯科任外交官，她准备随他前往。我在他们家住到1944年3月，我和桂籍结婚为止。

中央通讯社不是政府机构，但是在国际通讯事业中，声名显赫，是我国独一无二的国际性通讯社，被认为足能代表政府。自1924年（民国13年）4月1日创立，至今天（1993年）已有将近70年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时，中央通讯社曾被列为世界五大通讯社之一（其他为：美国美联

社及合众社、英国路透社和苏联塔斯社）。中央社当时在国内的分支机构扩展到52处，国外25处，全社员工近三千人。

中央通讯社初成立时是中央宣传部所属的一个小单位，1932年（民国21年）改组，称为“中央通讯社”，由萧同兹先生出任第一任社长，自中央党部迁出，社址设在南京洪武路寿康里，成为独立经营的事业性新闻机构，自设无线电台，建立遍及全国的大通讯网。

中央社在抗战期间及以后虽经数度搬迁，但对全国的新闻广播未尝中断一日。在前线，在国外，在各个战场，中央社记者非常活跃，非常辛苦，甚至冒生命危险。在后方，在重庆，在各地的分社，情形也一样。中央通讯社能成为全国新闻事业的主要推动力量，社长萧同兹先生居功至大。萧同兹先生是湖南省人，不是学新闻出身，但半生精力贡献给中央社，一共服务了32年。新闻界认为，假若没有萧先生，就不会有成绩辉煌的中央社。萧同兹1932年奉命主持中央社时，贯彻三大方针：工作专业化、业务社会化和经营企业化。将中央社改成独立机构，延揽人才，增添设备，自设电台。领导作风是鼓励、容忍和信任。他善于团结全社同仁，使进入中央社的人都能敬业、乐群、谨守岗位、淡泊自甘，更能相处无间，亲如家人，这就是“中央社精神”。他是卓越的创业家，令人心悦诚服的领导者，是中央社全体同仁的畏友和益友。我在中央社工作了六年多（1943年至1949年），假若不是迫于时势，我和多数同事不会自请遣退，离开中央通讯社。“中央社”迁台40多年来，每逢4月1日的成立纪念日，离职多年的社友们自发参加庆典和聚餐。今年（1993年）适逢母社成立69周年，老少社友欢聚一堂，充分表现了“中央社精神”。每个人都感觉到真实的亲和力和归属感。萧同兹社长于1973年11月11日谢世，至今已20年，但感觉上他仍和我们左右相伴，留下了不尽的追思和永恒的怀念。

八　青梅竹马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1944年，抗日战争已进行了七个年头，是形势最为险恶的一年。4月，日军进犯河南。6月，灵宝、长沙、湘潭相继失陷，8月衡阳失守，11月，

桂林、柳州陷敌，日寇进迫独山，陪都重庆受到严重威胁。

而桂籍和我就在这一年的3月26日在重庆结婚了。桂籍33岁，我30岁，相识已整整22年。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在大后方四川，与远在北方日军占领区内的亲人完全隔绝，多年来音信全无，其间两家的家长又相继病故，身边没有亲人，只有数十位好友参加了桂籍和我的婚礼。事前印了红字短笺，署上我俩的名字，通知好友及同事们。短笺上还提及到重庆名胜“南温泉”度蜜月，其实，当时的大环境、自身的经济条件及心情，既不允许，也不适合。

喜宴设在重庆一家饭店内，参与者都是我们的证婚人。国难期间一切从简，喜宴上，我们彼此交换戴上了刻有结婚年、月、日及对方名字的金质婚戒。这戒指是多年前父亲送的生日礼物，我由哈尔滨带在身边仅有的纪念物，由好友王玉彬拿到银楼改铸成两只结婚戒指，上面刻上新人的名字和结婚日期，意义非凡。我没有穿礼服、披婚纱，穿了一件枣红色滚同色缎边的旗袍，衣料是好友韩素音由伦敦托人带来的。玉彬还替我们买了双人床、饭桌、凳子及锅碗等。在我们事先租下的两间茅草房内布置了新房，虽是克难式，但胜在喜气充盈。这座用竹竿、茅草依山搭成的两层茅屋，上层住着房主一家四口，早、晚小孩的吵闹哭叫声，清晰地传到楼下，小孩的尿液也经常滴下。房东还利用我们房屋下边的空地，用几根粗竹竿撑起，圈养几头猪，我们在房间内不断听到猪的呶呶声，并闻到随风飘来的臭味。

婚宴后回到“新房”，两人心情异常沉重、复杂，更觉茫然，默坐片刻后，终于忍不住，相拥哭泣。这时意识到，从今以后，两人必须为共同的“未来”打拼。婚姻，赋予不同于前的磨炼和承担，更须我们坚强勇敢地面对挑战。

继我结婚之后，好友王玉彬也结婚了，新郎是其福建同乡、在航空界咨询部门服务的郭棣棠先生。玉彬的婚礼较我的风光，她说结婚是大事，她一定要穿白色礼服、披婚纱，在重庆最有名的“胜利大厦”礼堂举行。婚后和夫婿离开重庆，迁居甘肃兰州。那里没有日机轰炸，物产丰富，物价低廉。

带着三个孩子的丁志伦也向她供职的茶叶公司申请，调到兰州。玉彬和志伦在兰州合资开设了西药房，生意相当兴隆。李赋萧在成都医学院毕业后，和王培仁医师结了婚，也迁居兰州，在兰州市立医院担任妇产科医师。

我怀上宇同的时候，这三位在兰州的好朋友，不断来信邀我到兰州去生产，桂籍也同意了。主要因为重庆仍遭受日机不断的轰炸，人民生活除了艰苦，还极度不安定：经常要跑警报，在潮湿阴暗的防空洞内担惊受怕，强忍饥渴及疲劳，蹲踞在矮窄的板凳上数小时，有时一天之内数次进出防空洞。体力的消耗和精神的折磨，男人尚且难以承受，何况孕妇！孕妇所需要的基本营养品，如乳类、鱼类、水果等，四川本来就缺乏，战时就更难见到。重庆几家医院的设备、环境、业务及专业人才，因日机多年摧残，只能勉强撑持。而况我们在重庆没有亲人或好友可以在生产期照顾我，自己初为人母，缺少知识和经验，兰州岂能不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可是重庆和兰州相距甚远，乘坐汽车穿山越岭，对怀孕的人绝不适合，而重庆和兰州之间没有定期航班，只有业务飞机不定期往返。好在玉彬的丈夫热心帮忙，巧作安排，我才得以在生产期前一个多月，乘机顺利到达兰州。临行前，玉彬特别嘱咐，有朋友托带一包东西，会放在我座位旁边，到了兰州机场将有人登机取走，我不必为此费神。事后才知道那包东西是黄金。当时黄金交易并不犯法，重庆和兰州的黄金价格差别相当大，只是两地相距太远，而做生意讲求时效。我知道后生气地责怪玉彬，她却说：“你生产所需要的一切费用，包括往返机票等，不就有了着落吗？”产前我住在玉彬家，每天大杯大杯地喝牛奶，吃营养食品。兰州价廉物美，尽可满足孕妇产前所需，胎儿体重快速增加。

1944年（民国33年）9月7日晚上十时左右分娩开始，我受了不少苦痛，从发作阵痛到生下近八磅的婴儿，耗时24小时以上。幸运的是，在兰州医院，身为妇产科医师的好友李赋萧始终陪伴，由她接生。产后，我由玉彬家搬进丁志伦家坐月子。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有育婴经验，也知道如何照料产妇。近11月的秋凉时节，我们母子愉快平安地飞离兰州，返回重庆。我们回家前，桂籍已请到中年女佣杨嫂，帮我照顾婴儿及料理家

务。所以我很快就能到中央通讯社销假，恢复上班。这期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政府已调回驻华大使，并命令全部在华军事顾问回国。桂籍也借机换了工作，于8月辞去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总顾问办公室主任一职，转到外交部亚西司任专员科长。很多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法政大学读书、会俄语、抗战初期被政府征调到军委会工作的年轻人，纷纷辞职，回到自己原来的服务机关或另觅工作。世事多变，国和国之间，没有所谓“永远的朋友”和“永远的敌人”，确是至理名言。

桂籍和我虽已为人父母，有了自己的家，但两人仍以工作为重，在家的时候不多，家务及婴儿交由杨嫂照料。我自认不是尽职的母亲，但在能力及时间允许的范围内，会全力以赴。幸好我工作的中央通讯社离住处不远，十分钟内可以走到。遇有空袭警报，我马上飞跑返家，抱着婴儿，带着杨嫂到附近防空洞躲避。每天中午休息时，我都回家喂奶。我的奶水虽不多，但母乳最富营养，一直喂了十个月。市面上没有奶粉或鲜乳出售，喂不饱只好以“米糕”（“米糕”是将大米加水，磨成粉，晒干成块，加水及少许白糖或盐煮成糊，是抗战时婴儿的主食，食品店有售）补充。从朋友处收集旧床单，撕成长方小块，洗煮过作尿布用。秋冬时节，重庆潮湿寒冷，洗过的尿布不容易干，杨嫂在煮饭、炒菜后，趁煤球还热，在火炉上罩上竹筐，上边铺上一条条尿布，慢慢烤干，除此别无他法。婴儿穿的衣服也是用旧衣改缝的“和尚领”装，再用布带捆绑。丁志伦还做了一件小棉袄，并从一双男用袜子拆出毛线，织了一件小毛衣。艰难困苦，由此可见。

从结婚至今，数十年来，家用全靠我们二人的公务员薪水维持，这使我养成勤俭持家的良好习惯。桂籍和我一直以“小宝贝”“宝宝”称呼婴儿，没有起乳名，稍长则以“博比”（与“宝贝”音相似）为名。孩子在南京、台北读幼稚园，都用“孙博比”注册，一直到入小学，桂籍才为他正式取名“孙宇同”。博比小时候十分聪敏乖巧，长得端正健壮，活泼调皮，人见人爱。稍长，除了仍吃母奶外，每天开始加食两次用肉骨头汤熬的厚稀饭，内加刮细的猪肝、鸡蛋和菠菜泥。十个月后，我停止喂母乳，他开始加吃面条、肉末和鱼肉，还有蔬菜和水果。碰巧这时，离我家不远

处，开了一间早晨卖新鲜牛奶的小店，当场喝，不外卖，每天一早我上班前，杨嫂会抱着博比去现喝一杯牛奶，再买块发糕给他当早餐。杨嫂工作认真、勤快，照顾博比无微不至，是我的好帮手。杨嫂拿手的红烧肉（用五花肉做）在朋友圈中很有名气。桂籍的好友如刘政因、孔祥集、常荫集，还有刚从美返国的孙运璿，这群哈尔滨工大毕业的青年才俊，经常到我们家“打牙祭”，为的是吃杨嫂做的红烧肉。我另外煮一锅罗宋汤，炒一盘青菜，在当时就是最丰盛的佳肴，大家痛快地解了一次馋。

也是这年的年尾，王玉彬由兰州来探望我们，正赶上我们为住处发愁。房东限期要我们搬家。玉彬先问桂籍能否在附近找一块空地，正巧原为军委会苏联总顾问办公室的停车场旁有空地。苏联派来的顾问全已奉召返国，桂籍曾任总顾问室主任多年，与各方关系很好，很快就获准建屋。然后，玉彬把从兰州带来、已送给我们的十大块苏制巧克力糖要回，拿到重庆商业中心区都邮街去卖掉，凭所得之款买了竹竿等建材，雇请工人，次晨开始搭建茅屋。不数日，茅屋建好，共两间，另有小厨房和仅够放一张竹床的小房间，作为杨嫂的睡房。竹篱围绕的后院很狭窄，只够洗涤衣物及晒衣之用。门前搭出一个走廊，廊头用木棍围出一段有栏杆的空间，供博比扶栏学步和玩耍，地上铺上草席，放上他的玩具。屋内外都用白石灰漆成白色，水泥地，木门、木窗框则是红赭色，屋顶用干稻草铺成，十分美观。桂籍好友常荫集一时兴起，站上木凳，在前门上方白墙壁上，用毛笔写了斗大的两个字“廉庐”。从此朋友们多以“廉庐”称呼我们家。室内也很简洁、典雅，窗户虽以白色薄绵纸代替玻璃，但我挂了窗帘，饭桌上也铺了桌布。（好友罗协邦买了一匹四川花麻布，缝成窗帘和桌布，作为新居的贺礼。）卧房内靠墙多做了一道两尺宽的隔墙，进口处有布帘遮挡，算是“储藏室”，而主要是为了放马桶，也可兼做厕所，这一设计得到众多友人的赞赏。其实，大家都明白，国家和自己都正处于最艰难时期，只是强颜欢笑，苦中作乐而已。这时易兄已由成都调返重庆空军总部任职，我们又多了一家经常往来的好朋友。

九　侵略者终于投降，四处累累战争伤痕

1944年夏季，盟军在欧洲反攻，开辟了第二战场。麦克阿瑟在太平洋上展开跃岛进攻，使日军惊恐万状，改变作战计划，调集兵力，向我河南、湖南、广西的主要交通线进攻，企图打通从中国大陆到中南半岛的陆上交通，策应南洋。稳定近两年的战局突然逆转，我抗日基地陪都重庆及大后方受到严重的威胁，人心惶惶。1945年，中国对日抗战进入第八年，人民生活益形艰苦，但大家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我国军虽然牺牲惨重，但始终不屈，牵制百余万日军在中国战场，让盟军能从容反攻。

1945年8月初，美军在日本广岛及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迫使日本军阀不得不于8月中旬向中国和盟邦宣告无条件投降。8月14日夜晚，日本投降的喜讯传来，后方各地军民欢喜如狂，涌向街头，欢呼狂舞，争放鞭炮，敲锣打鼓。残酷的战争终于结束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胜利了！

这场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空前浩劫。我海、陆、空战士阵亡、负伤、失踪的总数近四百万人，而人民直接或间接死伤在两千万人以上，流离失所者达一亿以上。资源、财产的损失更不计其数。生离死别，妻离子散，惨绝人寰！这期间，我亲身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目睹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自己成熟了许多。战争使我变得坚强、自信和现实，对是非、善恶、恩仇更形分明、固执，往日的乐观和天真已被磨掉，这种改变连自己也觉得诧异。

回顾这场战争，桂籍的好朋友中，不少身受其害，多以悲剧终其一生。先说我们的好朋友刘政因，他家世、学历、经历优于常人，其父刘哲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及政府“考试院”院长。刘政因工大毕业后赴美深造，获工程硕士学位，抗战初期返国参加抗战，认识了年轻貌美、从事新闻工作的龚德明小姐，两人感情进展迅速，已论及婚嫁。当时许多年轻人向往陕北延安，两人说好同去延安，龚先行，刘后随。但刘因家庭原因未能履约前往，刘给龚写去无数信函，都没有回音。龚德明在延安苦等两年，这期间，龚被万里长征英雄、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罗瑞卿看中，成为罗的爱人。前文曾提到我到延安采访时遇到龚，她已改名“龚明因”，知道

刘政因还在苦苦等她，万分无奈。刘在重庆得知龚的近况，也悲痛不已。后来刘和从上海逃难来的女孩小俞草草结了婚。婚后刘政因被派到陕西西安任军委会驻西安顾问办事处主任。有一天他带着太太，手抱女儿，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突然碰到迎面走来的龚明因和尾随的“勤务兵”，场面尴尬。龚不知刘已结婚，她是以“外出治病”为借口，想脱离这个地方，到重庆找刘政因。最后，还是由刘设法，帮她甩掉跟随者，把她送到宝鸡，再转乘公路车去重庆。刘嘱她在重庆等他，说他一定会离婚。结果婚没有离成，次年即1945年抗战胜利，刘被派到东北接收，出任中东铁路局董事长，龚无奈地返回南京家乡，最后和别人结了婚。他们两人各自的婚姻都不美满。刘政因来台湾后，在遗憾中英年早逝。

孔祥集是桂籍小学时的学长，山东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在情报及军警单位服务，多少带些秘密色彩。抗日战争期间，曾派赴苏联、伊朗、日本等国工作。个性风流倜傥，所到之处都有女友相陪伴，并以“子女满天下”著称，到台湾后虽有日籍妻子小叶子及两子（双胞胎），但后来小叶子携两子返日本省亲，没有回台。孔兄老年生活孤寂，子女虽多，但缺少情感和联系。他于1993年6月病逝台北，只有曾被他遗弃不顾的儿子孔令诚为他送终。

最让朋友们惋惜的是常荫集，他也是哈尔滨工大毕业生，满族旗人，一表人才，高挑俊挺，才智出众，人缘好，流落后方的东北人尤其哈尔滨工大的年轻人都视他为领导者和大家长。他在资源委员会服务，许多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尽办法接近他、追求他，都遭他拒绝，原因是在东北家乡已有妻室和子女。对日战争持续了六七年，看来结束无期，留在故乡的亲人全无消息，不知生死，在后方许多人渐渐开始建立新家庭，“抗战夫人”这一名词应时而生。常荫集不再坚持，和西安来的志同道合的女孩邬汉贞结了婚，接连生了两个儿子。

常荫集和刚从美国受训三年返国的孙运璿，由他们所服务的资源委员会派赴东北辽宁，接收电力系统。两人和其他四位接收大员到了重庆白市驿飞机场，还有十分钟飞机就要起飞，忽然接到经济部电话，要孙运璿留下来招待几位美国工程师，孙只好从机场折回重庆。而常荫集随其他几

位，带着孙运璿的行李先行飞往东北。后来孙运璿又应老长官黄辉之邀去了台湾，放弃去东北的机会，尽管东北的发展前途最被看好。从此也注定了两人完全不同的命运。孙运璿在1989年出版的《孙运璿传》中提到："一通电话，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如果那通电话晚来十分钟，我上了飞机，如今不是身陷大陆，就是早已升天了！"

常荫集返回家乡，接收并重建东北被破坏的电力系统，并和老母、妻儿团聚，邬汉贞携两子暂返西安娘家。原配不能谅解常再娶的事实，终日吵闹不休，逼常和邬离了婚。"文革"时期，常荫集遭到迫害，在种种压力下，竟跳楼自杀了。邬汉贞的两子后来被常家以"归宗"为名强行带走，逼得邬汉贞精神失常，疯疯癫癫至今。

孙运璿后来在台湾，从电力株式会社机电处处长做起，而后升为总工程师、协理和总经理。他在台电工作了近二十年，为台湾的经济起飞铺上跑道。离开台电后，他在政坛平步青云，1978年，被委任为"行政院长"，直到1984年2月突然中风病倒辞职为止。蒋家两代对他的器重固然是主因，桂籍在"立法院"对他的学识和为人的赞扬及对他的种种协助，也功不可没。孙运璿和我家的交往，始于1945年，此时他在美国结束受训，返回重庆，由常荫集带来，从此成了我们的"廉庐"的常客。他和桂籍的个性有不少相似处，两人颇谈得来。

迁到台湾后，孙运璿和俞蕙萱结了婚。他夫妇和我们两家交往密切，互信互助，桂籍和运璿成了莫逆之交。我们家的世交好友如杜桐荪威莉夫妇、易国瑞罗协邦夫妇、王墨林夫妇等，也都变成了他们的好朋友。《孙运璿传》第149页这样提到桂籍：

> 曾任立委党部书记长的孙桂籍，是他相交四十年的好友，年轻在哈尔滨时就在一起畅谈国事。孙桂籍把政坛派系、官场惯例、党国大老的好恶，都一一传给了这位小老弟，并摆平他与'立委'间的歧异。如果孙运璿对立委有不周到之处，孙桂籍往往会出来打圆场："他是书呆子，不懂官场礼貌，千万不要跟他计较。"

1976年7月3日，桂籍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开会会场，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好友孙运璿悲痛逾恒，挽联写道："患难交深爱我如弟视君如兄，后死敢忘

一言诺；天人永隔大业未安赤气未靖，先生胡不十年留。桂籍吾兄千古，弟孙运璿敬挽。”

1945年（民国34年）夏天，日本政府向盟方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密苏里军舰上签订投降书，正式向盟军投降。我政府派何应钦将军代表我国出席，同学好友朱祥麟（笔名朱启平）以我新闻界代表、《大公报》名记者的身份参加，实地报道受降典礼经过。中国战区（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东三省不包括）包括台湾、澎湖及越南的日本陆、海、空军应向我指定的受降主官全部投降。当时日本投降的总人数为1283240人。自1931年（民国20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民国34年）8月宣布投降为止，14年战争中，我国军民的生命财产伤亡和损失惨重，据估计：国军伤亡共计320万人，支出军费14643亿元。由于日军大肆屠杀和滥行轰炸，一般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实难以估计。

抗战胜利以后，在大后方尤其是陪都重庆，处处充满兴奋、渴望、忙碌中的混乱。政府机关、工商各业、民间团体、学校、个人、家庭纷纷作还乡的打算。最需要解决的是交通和善后问题，但空运和水运工具有限，且由政府官员及机关人员优先包用。陆路交通工具较多，虽费时又很辛苦，但许多归心似箭的人都走陆路。重庆街头出现了不少拍卖行和地摊，急于离开的人，廉价出售家具、衣物，甚至锅盆。我们的朋友中，不少人已随所服务的机关先行离渝，眷属不能同行，多留在重庆等待。

大学毕业，成家，重上新闻战线（1942—1945）

公民證
張郁廉 男女 現年三十 歲 業 新聞係
山東省 縣人 業 道上規定於
卅四年 一月 四 日在重慶市第
七區舉行宣誓登記特給此證
中華民國卅四年八月六日
重慶市第七區區長

燕京大學學生證
姓名 張郁廉 學號 W34005
學院 文 學系 教育
入學 廿一年九月 年齡 廿七
籍貫 山東掖縣
大學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研究院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重庆第一个家，是十块巧克力换取建材搭建的，博比一岁

中央社同仁。中间坐着的是董显光、曾虚白、叶公超、余梦燕、徐锺佩。后排是朱抚松，前排是魏景蒙和郭琴舫，第二排右二是我。

第三辑 乱世沉浮（1945—1949）

一　东北接收，希望转为失望，挽狂澜于既倒

桂籍和我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却面临重要抉择。最后，桂籍决定离开外交部，放弃出国任驻苏使馆二等秘书或领事的机会，接受政府的派遣，随杨绰庵市长到哈尔滨接收并担任社会局局长之职。此前杨市长请桂籍担任财政局长，但桂籍属意社会局，他认为在社会局可直接为民众服务。

桂籍于战争结束的1945年10月，满怀着希望和热诚，离开了重庆，先飞北平，再转赴东北。我和博比仍留在重庆，我继续在中央通讯社工作，看局势的发展，再作返乡的打算。

接收东北的工作并不如预期的顺利。政府派去的军队及各行各业的接收人员，处处受到苏联方面的阻挠，对方不惜使用暗杀手段作为威胁。经济部派去接收东北矿区的特派员张莘夫，在抚顺附近被害即为一例。苏联借口“雅尔塔密约”进军东北，封锁大连，拒绝我国军登陆，迫使国军改由秦皇岛登陆，再向关外推进。苏俄撤退时将东北轻重工业机器拆卸运走，不能移动的加以破坏。东北的交通一片混乱，难民拥塞于途，不得还乡。赴东北哈尔滨的杨绰庵市长和其他接收人员，包括桂籍在内，终于在1946年3月，在哈尔滨展开接收市政的工作。在哈市工作了三个月，形势又恶化，接收人员奉令撤至沈阳待命。杨市长率部属先行撤离，由桂籍留哈，代理市长职务，收拾善后，最后撤离。

在哈工作期间，发生了中共要员李兆麟在哈尔滨被暗杀事件。市府为此召开追悼会，杨市长以自己是福建省人，国语不标准，又不善讲话为理由，派桂籍代他登台讲话。情势十分紧张，桂籍在台上，态度从容，用词平和诚恳，终顺利完成使命，未发生意外。

撤离哈尔滨前，桂籍曾到道里故居东顺祥院内探望，只见建筑依旧，人事全非。东顺祥商铺关闭，见不到熟人面孔，陌生人杂居其间。只是在仓库内一角找到一部分桂云的运动奖牌、奖状和一辆桂籍从前骑过的破旧脚踏车。在日据时代，桂籍的父亲在东顺祥院内住过，后被一日童抛球击

中心脏部位，不治逝世。

哈尔滨市政接收人员留驻沈阳时，桂籍于6月间曾被借调到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任常务委员兼储运组组长。后来经行政院任命，桂籍出任旅顺市市长，从事接收事宜，但因为苏联的阻挠，未能赴任。不久以后，桂籍出任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整个局势越来越混乱、复杂、多难、多变，抗战胜利时的希望和欢乐随之消失，面对的又是战乱、伤亡、离散、苦痛和不安。

我和博比在桂籍离开重庆以后，又停留了近半年。我继续在中央社上班，忠心耿耿的杨嫂仍留在我家，照顾博比和管家务。不断有从各地还乡的好朋友路过，来我家歇脚并找寻还乡的交通工具，而主要是借机相聚。

好友中第一个投宿的，是荷荪的丈夫何远经。他由成都来，再乘船返家乡湖南长沙。随后来的是荷荪，她携女尊一和小儿子，正巧玉彬带着她母亲专程由兰州来看我。抗战胜利后，好朋友们再度见面，齐聚在“廉庐”，小屋里彻夜有说有笑，兴奋之情笔墨难以尽描。又是荷荪出的主意：大家轮流买菜，烧自己的拿手菜。这么一来，顿顿有好菜吃，味道多变，众人胃口大开，更增加了欢乐情趣。我明白，这是荷荪的美意，她处处为人着想，唯恐我用钱多，所以由大家分担。

相聚两周后，好朋友们又要各奔前程，但每个人都坚信不久会再见。荷荪离开重庆前，悄悄塞了一两黄金给玉彬，请她稍后转交给我，说是让我买鞋和日用品的。她回到长沙后，曾写来一封信，由中央社转交，可惜我已离开南京到东北去了。信中她告诉我，她已为我生下我希望有的女儿，并说她不久要来南京，为前夫谢承瑞修衣冠冢，到时和我好好聚聚；又说她准备了一些布料，要亲手为我儿子博比做几件衣服。她和我都没有想到，重庆一别竟是近五十年。大陆开放后，从1987年起，我返乡探亲四次。见到好友王玉彬，和她一起搜寻荷荪的消息，至今没有结果，不知她人在何处，今生有无再见之缘。好友李赋萧医师于1944年在兰州为我接生博比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确知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自杀身亡，原因不详。我和玉彬为她难过良久。生命中，有些事情昨天发生，今天就忘记了；有些事情却相反，时间越久，印象越鲜明！

二　历尽艰辛，我终于履行了给父亲的诺言

我比这些朋友幸运，1946年（民国35年）4月，我抱着已满周岁的博比，手提着总编辑陈博生托带的一个保温瓶，乘坐中央社的包机，和各部主任及重要人员一起，由渝直飞南京。说起那个保温瓶，在当时可是十分名贵，我一路小心翼翼地捧着，怕碰怕摔，比带儿子还要小心。

南京中央通讯社总社坐落在南京中山东路，是一座新建的七层高楼，尚未完工。中央社的工作，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中断过。抗战胜利后，中央通讯社迁回首都南京，马上开始向国内外传播最新消息。

总社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和乔迁新址，举办了一次盛大的舞会。萧社长身着一袭藏蓝长袍，致词后，潇洒地走到我面前，请我跳了第一支开场舞，我感到无比荣幸，至老难忘。到南京以后，我带着博比住进社方为女职员准备的临时宿舍。这是一间大通仓，有十几个床位，床边有柜，带来的衣箱就放在床下，我和博比同睡一铺床上。白天我上班，请了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孩来带博比，我们都吃社里饭堂的伙食，有时为博比蒸蛋或肉饼。每天早晨博比一醒，我马上抱他到厕所，给他一根香蕉吃，怕他吵醒其他同事。待女孩来到，把他抱走，我才梳洗，去上班。这种日子过了两个多月。

6月间，我为了配合桂籍的工作，请调到东北沈阳中央分社。带着博比离开南京，经过上海乘机到北平。当时桂云一家还留在云南，桂毓在成都，我到了上海住在周克家，几天后，才搭上飞北平的飞机。在北平玉彬家住了一阵，等桂籍从沈阳来接我们，再同返沈阳。那个时候，东北最高行政机构东北行辕及政府派赴东北的接收人员，都奉令自各地撤至沈阳，集中待命。我们来到沈阳以后，住的问题顺利解决了，经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宫其光先生介绍，我们住进民富街的一幢两层楼房。宫其光是沈阳人，曾任第五战区参谋，我在为徐州突围做采访时认识的。

我的工作随即在中央社沈阳分社展开，职务是采访组组长，领导四五个年轻记者采访新闻。其中有齐振一、陈嘉骥、李宗熙、吴铎，编辑组长

是林家琦。他们刚从大学毕业，工作能力强，精力充沛，都是“单身贵族”。我自己也不过32岁。沈阳分社社长律鸿起夫妇是我认识的人之中人缘最好的，律夫人陈荣礼抗战时在重庆，曾在蒋夫人宋美龄主持的妇联会工作，为人诚恳，乐于助人，对社里同仁照顾备至。他们最先被派来沈阳筹组分社，正值政府积极遣送日本侨民返国，日侨将家用物品在街头廉价出售。律太太没有放过机会，选购了数十床鸭绒被，分送给后来者，给有眷属的送两床，给单身的送一床。在天寒地冻的东北，无疑是最实惠的礼物，更难得她有这番心思。单身的年轻人都成了她家经常的食客，经她介绍，林家琦、万存仁等都娶了东北姑娘。（撤到台湾以后，我们先后都离开了中央社。律鸿起到陈纳德飞虎队工作。沈阳分社这一批旧人还经常聚会，直到律太太陈荣礼患了忧郁症，跳楼自杀为止，留下独子律锦江。）我们在沈阳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十分愉快。工作方面，有律社长夫妇的领导和照顾，全社同仁融洽相处，有如亲密的大家庭。我们的好朋友易国瑞罗协邦夫妇，丁志伦携子女，刘德成、刘政因两家及孔祥集等，都由四川来到沈阳。易国瑞任东北空军副司令，刘政因是中东铁路的董事长，刘德成、丁志伦都在铁路局工作，彼此经常来往。

我抗战初期在朱由村当面答应父亲，我学成后一定照顾弟弟们。去世多年的父亲虽然不能亲眼看到，但我尽力而为，逐步实现了这一诺言。第一位由哈尔滨来投奔我的，是二弟复钧，十年别离，道不尽家中变故和苦楚，姊弟痛哭失声，久久不能自已。接着来的是四弟复善，十五六岁，剃俄式光头，清瘦，我马上为他办理入读中学的手续。二弟妹赵培懿把大儿子俊杰留在哈尔滨，让外婆照顾，带着一岁多的女儿秀梅，由三弟复合陪同，绕道来到沈阳。她的母亲是俄国人，在生活习惯上和我很合得来。她年轻，能干又勤快，分担了不少家务，博比也有了秀梅这个小玩伴。二弟复钧经易国瑞介绍，进空军汽车修护厂工作。三弟复合在物调会找到差使。最后逃离哈尔滨的，是大弟复成夫妇，带着四个儿子，最大的习真七八岁，最小的习宏才几个月，尚在襁褓中。一家子混在难民群中，冒着重重危险，在饥寒交迫中，徒步跋涉一个月。复成弟想事周到，怕把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形同乞丐的家人带来，有伤姐夫的面子，也怕吓着多年

未见面的姐姐，到达沈阳后，他把家人留在车站，自己先来我家。我见到日夜思念的亲弟弟，来不及多说什么，雇了马车直奔车站，把寒风中缩坐一堆、不断颤抖的侄儿们和弟妹接回家中。在家的桂籍已烧好数锅热水，第一件事是要孩子及大人把长满虱子的脏破衣裤脱下，堆在院子里烧掉；第二件事是轮流洗澡、剃头发，换上临时找出来的衣裤。这时习宏患了严重的肺炎，时发高烧，呼吸困难，幸好沈阳已有盘尼西林上市出售，挽救了这小生命。我买来两匹白蓝色棉布，由培懿和复成太太连夜为孩子们缝好内外衣裤。把饭厅的餐桌和椅子搬到客厅，里边搭好床铺，给复成一家六口住。复钧一家三口和我们分住楼上的房间，楼下书房由复合、复善合住。

后来桂籍的表弟曲占魁（二姨母的儿子），在沈阳医学院就读，也要求住在我家，便加上一张床。桂籍开玩笑地说："我每次进门，看见的面孔全是张家的，还以为走错了门，到你们张府来了。"说来也是，不算我在内，孙家住着十一个张家的人。就这样，除了住在山东朱由村老家的五弟复本和我继母没有到沈阳来，张家人差不多齐了。大家在沈阳暂时安定下来，三个弟弟都找到了工作，四弟和侄儿们都进了学校读书。兵荒马乱之际，一家人能团聚，有了工作，实在不容易，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我对父亲的诺言，终于一一实现。

说也凑巧，我原在徐州前线认识的覃异之旅长，调升为第52军军长，派驻沈阳，见到我们家人口众多，便主动每月送来一大袋军粮，使我们减轻了负担。一年后的1948年，桂籍当选为立法委员，我们迁居南京，还和他见过面。他提出把他在南京的一幢楼房借给我们住，我们此时已有住所，遂婉拒了他的好意。后来听说，他太太难产去世，他再娶了一位学音乐的女孩，这位新娘在延安受过训，是受派遣的。1949年，覃异之没有随军到台湾，留在大陆，命运如何，不得而知。五十余年前，他送的象牙图章，我一直用到现在。此章是专用来在台银取款、存款的。这些都是后话。

前面说过，韩松林抗战时在成都，听从我的建议投考了军校，已毕业，现随部队经过沈阳，要到四平街参战，经桂籍向有关军方说项，把他留在沈阳，保住了性命。另一位好友，才智过人的常荫集，也在沈阳。他

来看我们的时候，心情十分沉重。他是最早被派来接收和修复东北电力的，未能顺利展开工作，却被困在沈阳，郁郁不得志，加上家庭纠纷，更使他愁眉深锁。这是我们见他的最后一面。

在沈阳，我和好友协邦都怀孕了，两人常在黄昏时分，携手去逛沈阳最热闹的马路——春熙街，在地摊上选购价廉物美的纪念品。那里不乏珍稀古画，可惜当时对中国画一无所知，错失机会。倒是桂籍从地摊买回一幅日本名画家所作的《双猴摘桃图》，正好我家宇同和宇昭都属猴，这幅画很受家人喜爱。后来黄君璧老师见过，也爱不释手。

有一天，易国瑞亲驾飞机，借公务之便，带着桂籍、我、协邦和丁志伦，由沈阳飞北平，我们趁机去探望郭棣棠王玉彬夫妇，并庆贺他们乔迁新居。途经天津时还停留半日，去看桂籍的三哥孙桂山。兄弟分离多年，相见分外亲热。三哥桂山是天津殷商，拥有数间绸缎庄，他以有弟如桂籍为无上荣耀。临别时，桂山送我们每人数件衣料、大衣呢料、西装料和毛围巾，作为礼物，殷殷嘱咐多保重。没有想到，那次短促的相聚，是他们兄弟最后的一次。“文革”时期，开朗、乐观、进取的桂山，无法承受劳役和污辱，以结束生命作抗议。

三　辗转于哈尔滨、沈阳、长春、南京、上海、广州

桂籍于1947年（民国36年）初秋八月，被任命为长春市市长。那时我们在沈阳已生活和工作了一年多，一切上了轨道，只好又一次向中央通讯社南京总社请求，调往长春分社工作，获准后，才安心离开沈阳，随桂籍去履新职。沈阳的家留给弟弟们居住。

长春市不同于中国其他都市，被当时的新闻界看成“远东一块最神秘的地方”。它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了实现复辟美梦，在日本军阀的引诱和旧臣的怂恿下，在长春做了13年“皇帝”，到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为止，下场十分凄惨。在长春的傀儡生涯，是溥仪个人生命史上的大悲剧，是世界政治史上一段颇富戏剧性的闹剧，长春市市容和东北其他城市相比，较为整洁美观，街道宽

阔平坦，楼宇新颖壮丽。建筑在小岗坡上的“皇宫”，红色宫墙和黄色琉璃瓦保有东方风格，气魄雄伟。桂籍到任前，长春市数度被共产党军队占领，又被国军夺回。前任市长赵君迈和后任市长尚传道均被俘。

桂籍到任时，长春外围仍在林彪大军重重包围中，铁路及公路交通中断，军粮、军饷都靠空中补给。桂籍时年36岁，市民多以“青年市长”称之，他干劲十足，为完成使命不惜生命。由于林彪大军的长期围堵，长春市内的粮食、燃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严重缺乏。而严冬如期降临，大雪纷飞，气温迅速下降到零度以下。这时桂籍多了一项要务：每日征召数百名市民，天亮前清扫马路等要道和机场跑道上的积雪，以便往返于沈阳和长春之间的军机，准时、安全地运送补给，给守卫长春的孙立人和杜聿明的部队。在飞雪漫天的深夜，桂籍由警察局长乐干（到台后任台湾警务处长）陪同巡视，慰问守军和值班警员。

由于燃料供应中断多时，库存告罄，只好停止发电。停电前，桂籍通知工务局将所属的数十辆电车停在车库。不料桂籍所倚重的工务局长、同学兼好友孙宏济是潜伏的地下共产党员，他提早停电，故意把电车如棋子般停在市区要道，阻碍交通。

我们住在市府分配的宿舍里，那是一幢大楼，原为“伪满”某大臣的居所，每日需烧四吨煤取暖。桂籍认为太浪费，坚持迁出，另觅住所。迁居后房舍较前小很多，但仍要烧一吨煤，才够供应暖气管、水管及卫生设备。我们为了减少市府开销，节省能源，停用锅炉，全家住在一间大房中，其他房间全都关闭。改用一个煤炭炉取暖，家人穿厚衣，披毛毡。能与长春市民共甘苦，也觉得心安不少。

因受战乱的影响，中央通讯社长春分社的规模尽量缩减，除社长刘竹舟以外，只有二三人协助采访和发稿。我在分社没有固定职位，经常是上午到社转一转就回家。每周倒有两个下午，到天主教教会外国修女处学习英语会话，这是桂籍代为安排的。后来，我才了解到桂籍的用心，想让我和教会建立联系，如果长春发生战事，他无法照顾我们，怀孕数月的我，将带着博比，躲到教堂修女处。回想当年在冰天雪地中，无电、缺粮、缺水、孤单奋斗的种种往事，余悸犹存。更难忘好友协邦雪中送炭，她利用

军机送粮饷到长春的机会，托人带来御寒衣帽、水果糖、饼干、腊肉、香肠，救济饥寒交迫的我们，其实他们在沈阳的日子也不好过。

有一天，桂籍的三姨母和姨丈由哈尔滨逃难到长春，在关口被拦住，不允进城，不知所措之际，抬头看到布告板上“市长孙桂籍”字样，惊喜异常，忙说市长是他们的外甥。为求证，关口负责者打电话到我家询问。我立刻打电话给桂籍，并请他派车去接。他说车是公家的，不能私用，让我雇马车去接，此时外边正下着鹅毛大雪。

在紧张不安的气氛中，我们在长春度过了1947年的圣诞节，迎来1948年。1月一个严寒的夜晚，我们接到好友易国瑞由沈阳打来的电话，他说，沈阳各界正在积极准备选举民意代表，桂籍既有意竞选立法委员，就要有人回到沈阳主持，否则怎么能竞选呢？他又说，军方有了新规定，以后军机不能载运妇孺眷属。他嘱咐我带博比，利用明晨最后一次机会返沈阳，并答应我带桂籍的三姨母同行。第二天清晨，我们三人带着简单的行李，赶到机场，登上引擎仍在转动的军机（因天寒地冻，不能熄火），军机不久即腾空而去，离开了我居住了半年的长春。

我回到沈阳后，马上着手安排为桂籍助选立法委员事宜。沈阳的形势和半年前比，没有多大改变。只是东北的冬季太长，几乎占全年时间一半以上，从11月开始下雪到次年5月冰雪才化尽。夜长昼短，下午5点天就黑了，沈阳的戒严时间也从5点开始到次晨7点。为了节约能源，街道上及家家户户灯光暗淡，入夜后全城死寂无声，车辆行人绝迹。多亏友人相助，我由军方借来一辆有戒严通行证的吉普车，桂籍好友刘德成负责策划选举事宜，刘政因每日晚饭后陪同我，到各哈尔滨籍的同乡家中拜访、拉票。

1948年1月21日，东北区立法及监察委员选举，在沈阳如期举行，桂籍以最高票当选为哈尔滨院辖市立法委员。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选举。桂籍3月交卸长春市长职务，5月到南京向立法院报到。桂籍带到长春市政府的专才，随后在易国瑞的协助下，也搭军机返回沈阳。桂籍特别在名单上列进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他叫杨庆，来自南方，无依无靠，流落在东北。长春市府主任秘书李少白是好友王玉彬的舅父，他在长春一直逗留到新市长到任后，代表桂籍办好移交手续，才最后离开炮火中的孤

城。现在，事过已近半个世纪，回想当年，如果桂籍没有机会当选立法委员，而仍留在长春的话，我们的下场又将如何？

我自己也曾有担任国大代表的机会，6月25日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前，中央通讯社总社由南京打电报来，问我是否愿意出任新闻界妇女保障名额内的国大代表。桂籍反对一家出两个民意代表，我便婉言拒绝，后来此职改由徐锺珮出任。

桂籍当选立法委员后，我也返回南京中央通讯社总社工作。我们初到南京时，暂时住在桂毓和傅曾矩的家（中央医院医师宿舍）中，我在待产，桂籍则积极找寻适合我们的住所。桂毓夫妇都在中央医院任医师，桂毓在眼科，后任眼科主任，曾矩任小儿科医师。两人是齐鲁大学的同学，抗战胜利后结的婚。桂云和胡震夏（字伯威）夫妇这时也由云南返回上海，已有两子——胡千里和胡又佳，胡震夏当时在银行任职。

到南京不满一个月，我于5月25日（农历四月十七日）清晨约6时，在中央医院生下次子宇立。我每个孩子都是亲自哺乳十个月，并以奶粉补充母乳的不足 。婴儿到十个月大，就可以喂麦片、稀饭、细面等容易消化的食物了。不久，我们一家四口，还有四弟复善，由桂毓家迁到在南京鼓楼区租赁的一栋中式平房，与哈尔滨工大毕业的徐培尧夫妇合住。我们两家分住左右两侧，正房两间做卧室和客厅，我们住左侧，中间堂屋做两家共用的饭厅。徐家人口少，没有子女，需要的房间不多。我们在后边多用两间小房，一给复善弟住，另一间供女佣住，厨房则在后院。我们搬迁前，选购了一些必需的简单家具，为次子买的一张精致的婴儿床，是唯一的奢侈品。

桂籍一到南京就去立法院开会，我满月后也开始到中央社上班，中午回家喂奶，下午再去上班。博比已四岁，送进鼓楼幼稚园，次子在家中由女佣照顾。复善弟就读高中的手续已办妥，每天上学。经过桂籍和我的努力，总算在南京把家安顿好了，生活基本恢复了常态。

当沈阳还在国军掌握中，东北至华北交通也畅通的时候，经我事先安排，我的三个弟弟和他们的家人及时离开沈阳。二弟复钧、培懿带着女儿秀梅先到北平，暂时住在我们的友人谢之熙黄静夫妇家中。最后他们决定

留在北方，不到南京来投靠我们，原因是家中有老小（继母王氏及他们长子俊杰），他们离不开。三弟复合返回老家掖县朱由村探视妻女，后来到南京找我们。可惜的是，大家历尽艰危，才从沈阳来到这里，也只住了不到一年，就再次走上逃难路。

这时的中国，战事日急，共产党军队节节逼近，南京到处可见逃难人潮，火车站、机场、码头更是一片拥挤。能搭上交通工具逃到台湾的，实在少之又少。大弟复成一家六口在我的催促下，离开沈阳，先到天津，住在丁志伦的小叔刘仲和家中，再乘船到上海，搭乘京沪铁路的火车到南京。战乱中拖家拉口，费时、费力、费钱，艰辛一言难尽，完全靠毅力和决心，最后都平安抵达南京，和我们会合。我马上把他们送到我事先租定的一栋平房中。这地方离我在鼓楼的住处不远，是一个当地住民的社区，有水电供应，有小学和商店，环境幽静，玄武湖就在近旁，岸边垂柳随风飘动，景色宜人。刁真兄弟们很快就到玄武湖小学上课了，刁真就读三年级，刁宽和刁远读一年级。不久，复成弟经我们在军方的朋友介绍，到海军总部工作，每月领取配给眷属的军粮及油、盐，解决了一大家人“吃”的问题。

而最幸运的是，当局决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自南京有计划地疏散，最先乘军舰离开南京的是海军眷属。复成太太带着四个孩子及姨老爷吴殿芳，最早到了台湾，被安排住在凤山大寮乡，以后又迁到高雄左营海军自治新村。

吴殿芳是我父亲的姨父，姨母早逝。从前，他们夫妇在我母亲过世后，替我父亲养育才几个月大的复成弟，他们到了老年，生活由父亲负责照顾。复成弟一家离开哈尔滨到沈阳后，姨老爷也决定离开哈尔滨。他先来沈阳找我们，当时我们都已离开。他辗转找到南京，除简单的行李外，他手中拿着我高中时的一张照片和一个刻我名字的木质图章，居然找到了我，那年他已81岁。

没有想到，我们到南京不到十个月，全国局势大变，内战的形势逆转。1948年冬，共产党军队发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国军实力快速缩减。林彪所率70万大军占领东北以后，迅速转入关内，天津、北平

两地同被围困，到1949年元月，整个华北变色。徐蚌会战中，国军弹尽援绝，被迫退出。四面楚歌的蒋介石“总统”于1949年1月21日发布引退文告，离开南京回到奉化溪口故里 。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和中共进行和谈。全国的经济一团糟，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法》，发行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法定货币）三百万元，每四元折合美金一元。同时停止发行法币，并限期收兑民间持有的法币及金银外币。以上海为全国金融中心，派蒋经国为经济督导员监督执行。由于战局日渐恶化，工商界对政府前途信心动摇，各地发生抢购风潮，社会人心大受影响，整个局面不堪收拾。

首都南京更是人心惶惶。行政院迁至广州办公后，政府各机关也纷纷迁移和疏散。我们的朋友们都携家带眷逃离，到上海租界或其他地方去了。在兵荒马乱之际，谁也顾不了谁，自己能保命就好。好友罗协邦于1948年底在南京中央医院生下次子易正寰，产后第三天就躺在担架上，被送上军用飞机，到陌生的台湾去了。

我们仍留在南京，等候立法院的安排。一直到1949年2月，才忍痛抛弃精心布置却住不到九个月的家，手牵着博比，怀抱老二，手提着盛婴儿用品的轻便行李袋，从成千上万难民的缝隙中钻过去，挤上开往上海的火车。车厢顶部也爬满了逃难的人，凄惨景象触目惊心！

到了上海，我们倒不大像一般的逃难者，住在万航渡路一栋舒适的三层楼房中，家具、厨房用具齐备，还有两个佣人（母女），这是桂云和伯威的家。胡伯威不久前由所供职的银行调派到香港工作，他们的家就留给我们住。桂云不但和桂籍、桂毓手足情深，待我也如姊妹，她一生都这样关怀照顾我们。她的两个儿子——胡千里和胡又佳，自幼至今称呼我“亲姨”。我的三个孩子——宇同、宇立、宇昭对“姑姑糖”也一直念念不忘。我们到上海时，桂毓已申请到医学奖金，过了不久就到英国深造去了。

早在徐蚌会战之后，“总统”蒋介石就开始部署撤离大陆。政府所属五院及部会首长、工作人员、眷属，都经海、空两路到了台湾。我们一家就是乘坐立法院包机，在抵达上海三个月后，于5月中旬由上海直飞到台北的。每家限带15公斤行李。桂籍还为四弟复善、玉彬的丈夫郭棣棠和桂

籍在东北时的同事李乃扬三人，申请到立法院包船的舱位，这种机会在当时实在太不容易了。此前，玉彬经易国瑞介绍，在空军服务，最先到台湾视察。初到台湾时，被日本统治了50年的台湾重归祖国不久，它长久遭受日本军阀的苛政压制、剥削，民不聊生，生活条件极差，各方面都十分落后。玉彬因此决定离台返沪。就在郭棣棠行将前往台湾之际，玉彬由台湾打来电报，说她“即返沪”，郭因此放弃了机会，二人从此留在大陆。

那时，谁都以为到台湾是“暂避”，不久就可重返家园。当时桂籍的一些会俄语、思想左倾的朋友，也极力劝我们留下来。而就我们而论，去台湾的意愿并不太强烈，只是出于本能的惰性，一味依赖立法院，加上对地处热带的宝岛充满好奇心，我更是天真，只是向往台湾的香蕉、菠萝和海水、阳光。更有诱惑力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杜桐荪一家、易国瑞夫妇和孩子们、丁志伦、孙运璿都已到了岛上。

而且，我们的台湾行差点泡了汤。五月，处处桃红柳绿，鸟语花香，我们决定去游一趟闻名已久的杭州。把次子留在上海，请佣人照顾，我们带着长子博比到了杭州。西湖名胜一览无遗，流连忘返，直到桂籍遇一熟人，他告诉我们，立法院已开始运送留沪立委到台湾，且因战事逼近，京、沪告急，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下午即将停开。我们马上冲到火车站，挤上火车，返回上海，一打听，我们已误了规定的行期。第二天清晨我们赶到机场，试探能不能破例让我们搭乘后离的立法院包机，这是最后机会了。很幸运，我们全家得以成行。

立法院虽然已将重要档案及眷属迁往台湾，但是院会在广州召开，所以桂籍和其他立法委员随后又有机会，都由台湾飞到广州开会。

东北接收，年轻长春市长夫人（1945—1949）

桂籍抱博比与我（左三左四），中立者是丁志伦

摄于南京，宇立不及一岁

与桂籍、桂云（前排左二左三）探望时任中央电检处长杜桐荪威莉夫妇（前排右一右四），我在前排右三

1946年秋天初到沈阳市，一家三口出游

游玩沈阳市区广场，此时博比三岁

1947年冬天在长春，此时我已怀宇立数月了

|第四辑| 宝岛年华（1949—2010）

一　初履斯土，物资匮乏，风雨飘摇

从上海直飞台湾台北，航程不过一个多小时，但心理上觉得十分遥远和陌生，心情也紧张不安。唯一感到安慰的，是大家都认为这次是“避难”，而不是“逃难”，用不了多时，我们就可以返回家乡。机舱里坐满了面带忧虑、沉默不语的立法院同仁和他们的眷属。桂籍抱着博比，我怀拥次子。按照规定，每人只准带15公斤的行李。我们临行前匆忙塞进衣箱的，是一些婴儿用品。经连年战乱，过惯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我们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一只一两重的金手镯，是我离开长春时，用中央社长春分社发给我的几个月薪水购买，作为纪念的。手镯上特意刻上了年、月、日和长春字样。现在，这只手镯我送给了次子宇立作纪念，那时我怀他已有五六个月了。还有一块一两重的金块，这就是我们到台湾时的全部家当了。那金块我们后来送给杨庆和张西箴，作为他们结婚的贺礼。

飞机缓慢地降落在台湾全岛唯一的台北松山机场，这是1949年5月初。地处亚热带的台湾天气闷热，走出机场，只见远处的林木青翠，几棵瘦高的椰子树和棕榈树随风摇曳，水田绵延，水牛漫步其中，长腿白鸬鹚相伴相随，这等景色在大陆从未见过。进了市区，市面萧条，偶尔有几辆老式人力车驶过身旁，车身高窄，轮子奇大。

我们以及同机来的同仁，被立法院负责接待的人员接到市区重庆南路，给安置在一座临街旧式楼房的二、三楼。这楼房的底层是商店，招牌上有“华侨肥皂”等字样。空旷的二、三楼，则用木板分隔为一间间小房，给每家分一间暂住。

我家隔壁，和我们一样有两个儿子，十岁左右。孩子的母亲王隽英也是立法委员。多年后王隽英的长子丁肇中，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携家带眷住在这里，实在太不方便了。没有多久，我们就迁到丁志伦处。她比我们先到台湾，任职台湾粮食局，带着三个孩子住在杭州南路和中正路（后来改名为忠孝东路）口的公家临时宿舍。这是一座木造大仓库，她一家住在仓库屋顶下，院子里一道窄窄的木楼梯直通到住

处。仓库顶空间很大，四周堆着木料和杂物。屋顶中央呈半圆形，也很高，向四周倾斜下来。丁志伦在离墙壁和楼梯口不远处，用木板作间隔，放上竹床和竹椅凳，木墙上挖开的洞当窗户，光线还好。丁志伦让我们学她的样，在离她的隔间不远处，也用木板围起一个地方当住所。中央社台北分社主任叶明勋送来木桌和四把木椅，我们自己买了竹床。志伦原来就请了一位“欧巴桑”，白天帮她做饭和照顾孩子。我们就搭伙一起吃饭，共同负担伙食费和其他开销。每天一大早，欧巴桑就由家中过来，先在院中生煤球炉子，烧开水，煮稀饭。

不久，四弟复善也乘立法院的包船，从上海到了基隆港口。我们把他接来以后，他也在仓库屋顶一角用木板搭了床，和我们住在一起。他随船带来了较笨重的实用物件——一个纸箱盛着我从沈阳地摊淘来的数十件日本瓷器。到现在，我们在台北的家还保存十多件。另外一箱装着手摇式大喇叭留声机和不少俄语音乐唱片。还带来一台体积不大、但很重的德国西门子电风扇，是二弟复钧在沈阳买来送给我们的。

当时的台湾，风雨飘摇，人口只有六百万，生产仍处于停顿状态。从大陆撤退的军民大量涌来，到处充满战乱避难的景象，物资匮乏，市面冷冷清清，连最基本的日用品如牙膏、牙刷、洗面皂等也难买到，只好用盐代替牙膏。次子喝的奶粉，也全是玉彬托人从上海带来的美国军用五磅装。物质生活的窘迫，对来“避难”的我们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心理上的压力。

我们抵台之前两年（1947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这是严重的历史悲剧。我们到达之后，事件所造成的伤痛和阴影尚未平复愈合，居民对外省人并不欢迎，彼此很少来往，更不可能交友或通婚。明显的例子，如外省籍主妇必到外省人开的商店或摊档购物，对本地人的菜摊则不屑一顾。外省籍的子女多送到外省籍老师多的学校或班级，像台北女师附属小学、私立复兴、再兴、静心小学或幼稚园。服装方面，外省来的男女，穿西装、旗袍、丝袜、皮鞋；而本地人因要适应炎热的气候，穿着随便，短裤、背心，或放在裤子外面的敞领“香港衫”，赤脚穿木屐或拖鞋。居住方面，本地人多半住日式木造平房，纸窗竹户，屋内全铺“榻榻

米”，浴厨也非常简陋。一进屋门就要脱鞋子或木屐，赤脚进入榻榻米房间。初来的我们对这项习俗难以习惯，盘腿坐在榻榻米上进餐更难适应。

就在我们抵达台湾的同一个月，当局正式宣布戒严，严厉的“戒严法”触目惊心，“扰乱治安者处死”“禁止非法集会、游行、请愿、罢课”“管制新闻、杂志、图书”。新台币兑换旧台币，比率为四万对一，物价涨了七千多倍。

在仓库屋顶住了几个月后，仓库要改建，要丁志伦限期搬出。在孙运璿的协助下，我们和四弟复善迁居浦城街，借住在孙运璿的杨姓舅父一幢日式住宅中一个榻榻米房间。环境的杂乱拥挤，不难想象。

有一天，桂毓的太太曾矩突然来找我们，她是搭乘空军大队长杨荣志驾驶的飞机，由大陆飞到新竹的空军基地再转来台北的，为的是找桂籍（当时桂毓已在英国深造）协助办理赴英国的手续。她和我们相聚数日后，就到广州去了，不久办妥手续去了英国和桂毓相聚。在兵荒马乱之际，她有办法来台湾再顺利出国，实在叫人钦佩不已。只是，他们于1951年学成归国时，途径香港，虽然桂云和桂籍再三坚持他们留下，在香港或台湾找工作，但他们执意回大陆去，可能因曾矩的父母兄姐皆在大陆之故。

在浦城街住不了多久，这条街道要改道，住处要拆迁。幸好桂籍的好友杜桐荪在杭州南路近齐东街的小巷，买下一幢20多坪大的日式房子。把我们一家四口，加上复善以及一个女佣，接到他家暂住。杜先生一家四口，还有杜先生的同事鲍姓一家也住在里面，晚上十多人挤在榻榻米上睡觉。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我们这些跟随当局迁台的人，逐渐认识到，这次离乡背井，不是暂时、短期，我们不能再居无定所了。开始计划租屋居住。杜先生的同事钟先生一家三口也在找房子，他一位未婚的张姓朋友有一幢含三房、厨、厕及后院的日式小房子要出让，条件是他自己要保留一间，以备将来结婚用，这正适合我们的经济条件。于是我们三家合租这幢坐落杭州南路101巷10号的房子。我家住前面的一间，这一间有窗子朝向巷子，过道有窄楼梯通往上面一间小阁楼，正好给复善弟住；中间空着的一间，是给原房主保留的；后边有小院的一间，由钟姓夫

妇及他们十余岁的女儿住。厨、厕共用。三个房间都铺着榻榻米，用纸门作间隔。

二　七岁的博比——母亲节大会的主席

长子博比已近5周岁，该入幼稚园了。经过口试，他考进了校址在南阳街一带的私立复兴幼稚园，这是设备、师资最好的幼稚园。博比对老师提的问题，无不对答如流，我特别记得一题，是老师要他从20倒数到1，他数得不但准，而且快。1950年7月，博比自复兴幼稚园毕业。毕业前的5月，该园举行庆祝母亲节大会，招待母亲们。由孙博比担任大会主席，发表开会词。次日新生报刊登出庆祝会的消息，特别报道了博比担任主席和他致词的内容：

> 7岁的小主席孙博比小弟弟，两手交叉胸前，以演说家的姿态，发表了长达一百字的开会词。他说：亲爱的母亲们！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妈妈，妈妈最辛苦，妈妈最爱我们，我们不能没有妈妈；没有妈妈，我们不容易长大。我们最爱妈妈，我们长大了，要孝敬妈妈。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准备表演节目来庆祝。小朋友，让我们大家高呼，妈妈万岁！

桂籍和我坐在台下，看到儿子的杰出表现，心中充满了欣慰和希望。9月博比顺利进入台湾省立台北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一年级就读，取学名“宇同”代替小名“博比”，次子取名“宇立”。这两个名字是桂籍和我经过再三斟酌和商量才定下来的。

我的四弟复善也经桂籍协助，进入台湾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就读。桂籍也帮助不少流亡到台湾的东北籍青年，到台湾大学、师大、工专学校就读，完成学业。这些年轻人每逢年节，总不忘到家里来拜访，报告近况。

大弟复成于1949年年底随他服务的海军，乘军舰到了高雄，把他家人由凤山大寮乡接到高雄左营海军眷村居住，习真、习宽、习远兄弟也进了海军小学读书。复成弟一人的微薄军人收入，要负担一家七口（加上姨老爷吴殿芳）的生活和教育费用，实在捉襟见肘。复成太太每天天不亮便起

床蒸馒头，习真兄弟在上学前提着蒸好的馒头，在眷村里沿巷出售，所得之款交给母亲，再赶去学校上课，就此养成勤俭孝顺的好习惯。我每月也固定寄200元台币给他们（那时我的月薪600元）。复成弟学电机出身，在大陆时在小丰满电厂工作过，经在台湾电力公司服务的孙运璿推荐，进入台湾高雄变电所工作，入住变电所分配的宿舍。宿舍在变电所附近，是一幢日式独门独院的房子。生活大为改善，复成太太不再蒸馒头出售，改种菜和养鸡，不但为家人添菜补充营养，还经常托人带处理干净的肥鸡给在台北的我们。那时菜场很少有鸡肉出售，除了年节，大家不舍得花大钱买鸡吃。

我辞去“中央通讯社”的工作以后，一时找不到适合的工作，也不习惯在家无所事事，曾去学过缝纫、做菜、做点心，但都提不起兴趣。

三　学习国画，成黄君璧老师最早期门生

1950年底，到台湾一年半以后，我才找到“正业”。经过是这样的：我在哈尔滨上小学及初中时的同学袁行廉，她的丈夫是桂籍在“立法院”的同事，叫冯正忠。冯正忠，广东人，和黄君璧是同乡，两人在南京时就有往来。袁行廉带我到温州街十八巷师大宿舍拜见黄老师，行礼如仪后，黄老师正式收我为门生。那时跟他学画的不过三四人，我是黄老师的最早期门生之一。

数间铺着榻榻米的日式房间，就是黄老师的客厅兼书房和画室，上课时学生们围着一张书桌，看老师画画。老师教画十分认真、仔细、严格，要求我们从山水画基础画法开始，先学画树干、树根，再学画各种树的叶子，大约有四五十种。之后学画石头和山，其纹理的皴法有数十类之多。老师强调要特别注意笔法、笔力和笔趣。上课两年后，老师才开始教渲染云、雾和着色。过了十年，在黄老师的鼓励和督促下，我于1960年及1966年先后两次开个人山水画展，颇获艺坛前辈的好评。使我甚感荣幸的是，在我展出的作品上，久负盛名的书法家和画家于右任、贾景德、孔德成、莫德惠、马寿华、叶公超、刘延涛、王壮为及张群都题了诗词，使展览增加了光彩，

提升了格调。黄君璧老师也在我的多幅画作上题了诗词，更欣然应允在有人重订的画作上再补题诗词。

第一次画展在台北中山堂举行。中山堂在当时是唯一够水准的展览场所。我展出从八分之一纸的小幅到整张宣纸或绵纸的大型山水画作80幅。展出四天，参观者络绎不绝，盛况空前，全部作品订购一空，另重订作品30余幅。我每一幅画的润笔，都事先经黄老师亲自看过，作出评价才决定。处女画展有如此成绩，固然由于我十年勤奋，黄老师教导有方，而我家至亲好友杜桐荪、孙运璿、易国瑞、杨庆等，桂籍“立法院”同仁和东北同乡，以及我台银、“中央社”及国际宣传处的同事的全力协助、捧场也是重要因素。画展结束后，我听从桂籍的建议，除掉开销外，把所得的三分之一用来“谢师”，送给黄老师现金台币三万元，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数目。老师和师母十分感激，那时他们的经济情形也不富裕，比起其他同学开画展后，送老师一具电扇、一瓶洋酒或一套西装料子，要实惠多多。黄老师和师母容羡余为了回报，送我几本《南画大成》画册和数幅大画，都是黄老师的杰作，到现在还悬挂在我家的客厅中。画展期间，台北市的日、晚报都登载有关消息，以及评论家、画家写的文章，语多赞赏和鼓励。画展结束后，我仍尽力设法，每周抽一个下午到黄老师家学画，数十年不断。

辞去“中央社”的工作后，我曾在“联合国同志协会”工作过一年多，1953年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那年代，经济窘迫，环境简陋，我除了当朝九晚五、忙碌刻板的公务员，还要处理家务，管教子女，尚能与画结缘，学习数十年不断，现在回想起来实在不容易。清楚记得，那时家中有一张放在榻榻米上的四方木桌，桌脚下垫了四块薄木片，以免压坏榻榻米。这张木桌的功用可真繁多！每日三餐，作全家人的饭桌，孩子们做功课靠它，桂籍批阅公文、写演讲稿、写信也靠它。孩子们入睡后，夜深人静时，它才是我的画桌。我的画具一向力求简单，够用就好。除了每月缴学画的学费外，没有余钱买画册作参考，也买不起较贵的笔、墨、纸和颜料。我倚仗的，无非是从小养成的独立自主的个性、战争逃难期间艰难困苦的磨炼，越是在逆境，我越是坚忍。

自1951年春起，蒋介石的夫人蒋宋美龄女士向黄君璧老师学国画山水，黄老师在画坛的影响力更大。他除了在师大美术系教书外，到他家求教的学生也大增，几十年下来，他的学生加上学生的学生，人数的总和相当惊人。

由大陆渡海的三位艺术家——张大千、溥心畬、黄君璧，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大家，在美术史上更是传统和创新兼擅的巨匠。黄君璧老师的画风平易，为一般人所喜爱和接受，却一点也不媚俗。他注重写生，功力扎实、敦厚，长于山泉、瀑布和云海泼墨。黄老师从来不随便批评别的画家，只欣赏别人作品的优点。他不但收藏历代名人的画作，也收藏许多现代画家的作品，他对古画真伪的鉴别能力极高，我们在“白云堂”画室上课时，他常取出收藏的作品，为我们讲解，供我们参考，使我们获益良多。

黄老师的画室取名为“白云堂”，是为了纪念他的母亲，取“白云思亲”之意。我曾受桂籍的好友杜桐荪之托，把他从大陆带来的一幅家传明代大家唐寅（唐伯虎）的山水画和一幅孙运璿家收藏的清代吕纪花鸟立轴画，拿去请黄老师代为鉴别，老师经仔细研究，最后肯定全是赝品，为此杜、孙两人颇感失望。

1963年，我参加了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出乎意料，我在六百余人的参展作品中，名列第二名。黄君璧老师是第一位以电话通知我的人，他连连表示：“实在太不容易了，差一点点就可拿到第一名！”他很高兴，以我为荣。他还告诉我，第一名是苏峰男，美专艺校毕业，主修国画，现任艺专助教。颁奖仪式隆重简单，由“教育部长”主持，在省立博物馆大厅举行。现场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教育部长”罗云平先生是东北人，桂籍的旧识，见到我领奖，颇感意外，欣然将奖状、奖品递到我手中，说：“大嫂！怎么会是你呢？恭喜！恭喜！”

从此，我在台湾画坛有了一些地位，历史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中山纪念馆等单位举办联展或国外巡回展览，都邀我参加。这些馆出版的月刊、季刊、年刊或请柬，都按时寄给我，并推荐我加入“中国画学会”和“中国美术协会”。

次年，即1964年，台北省立博物馆举行“白云堂师生国画欣赏会”，展出作品140幅，并出版《白云堂师生画集》。1967年全台文化、新闻、艺术团体为庆贺黄君璧先生七十大寿及国画创作五十年，将“画坛宗师”匾额赠送给他。这块金字匾额，一直高悬在“白云堂”画室内画桌后方的墙壁上。黄君璧老师是杰出的艺术教育家、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前驱和实践家，作为他的弟子，我们感到无比光荣。

四年后，老师于1971年辞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及美术系主任的职务，同时也停止了在家中教课。不过，他和老学生的联系不断。我和黄老师及师母数十年来，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经常去探望他们，看老师画画，或将新作拿去请老师指教。有两次出国到欧洲及菲律宾旅游，我都邀师母同往。

我1980年自台湾银行退休后，也是在黄老师的鼓励下，才开始在家中教授国画山水的。我还经常带领我的学生，带着她们的画作，到黄老师家，请他指正，并要求学生注意观摩他示范时挥毫的技巧和笔墨的运用。学生们都以“太老师”“太师母”称呼，黄老师和师母听了总是开怀大笑。

黄老师退休后的20余年，创作力仍甚旺盛，在岛内各地和韩国、日本、新加坡、欧洲、美国各大城市举行个展并应邀讲学。黄老师生平自奉俭朴，但对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极为热心，捐款从不落人后。他生前订下计划——在他九十大寿那年，日夜赶工，画“小品”一百幅，举行义卖展，所得新台币五百万元，全数捐给中视“爱心”专户，购买救护车12辆，分赠给孤儿院及老人院。92岁时，他在香港举行国画义展，得款二百余万港币，捐给东华三院，并将半生收藏的20余幅古字画和他自己的得意之作数十幅，分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台北历史博物馆。

而“白云堂”的弟子们，差不多每人都拥有恩师赠送的“小品”画作，件数与学画年月成比例。每年岁末，老师必定赶工画“小品”，拿来做送给弟子们压岁的红包。我将30余年来老师赠送的“红包”辑集成册（十二幅一册），分送给我的三个子女，作为传家宝。黄老师老年患有心脏病，93岁时因肺炎引发并发症，于1991年10月29日遽尔离世，门生们悲

痛不已。

1957年，我做发起人，邀请“白云堂”的女画友14人，成立了台湾第一个妇女画会——拾趣画会。每月于公职及家务之余，定期举行雅集，挥毫论艺，以绘事相勉。两年后的1959年，台湾中南部发生水灾，“白云堂”师生举行了救灾画展，得款15万新台币，全数捐付救灾。九年后，“拾趣画会”于1966年首次在台北英文《中国邮报》画廊举行联合画展，参加展出的会友有：王化民、刘衡静、闵湘、李运庄、徐莹、郝冠芳、邝书民、陈晓菁、徐行之、盛元芳、袁行廉、张一冰、于滋泓、张郁廉，轰动一时。新闻界赞誉为“把艺术带进家庭，有转移社会风气之功”。再六年，诸友各献佳作数幅，于1972年精印成集，名为《拾趣画集》，请黄君璧老师写序文，以资纪念。拾趣画会成立50年来，诸友之作虽未达登峰造极之境，然亦已得点墨成趣之意，咸认为系艺林盛事。如今，黄君璧老师和容羡余师母均已弃世，会友多人已作古，存世者不及半数，都已到耄耋之年，较少交往。

四　在台湾三年，我们第六次搬家

从1950年到1952年下半年，在杭州南路和钟、张两家合租的房子里，三家人同住了两年多。因我在“联合国同志协会”工作，请了一位20岁左右的女孩子协助做家务，要给她提供住处。孩子们也渐渐长大，这狭小的空间，容纳不下一大家人，只好另谋对策。

有一天，摇摇晃晃地学步的次子，手里拿着装满牛奶的玻璃杯，从铺着榻榻米的过道摔到浴室的水泥地上，把左眼下边的脸颊割伤，血流不止。桂籍和我惊慌失措，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外科医生，那时连电话也没有，急忙用毛巾按住伤口，抱着老二坐上停在巷口的人力车，请车夫载我们到住在长安东路的孙运璿家。不巧，孙家夫妇都外出，只有二姐孙慕贞在家，她带着我们到他们家斜对面一家私人牙科诊所。医生说孩子的伤势不轻，但他只能在伤口上敷上一些消炎粉。他介绍另外一位外科医生。我们又乘来时坐的人力车，到万华一带找到那位只动大手术、不做小手术的

外科医生，他勉强答应，为还在流血的次子缝合伤口。手术的结果并不理想，疤痕明显地留在面颊上，所幸宇立长大后戴眼镜，把疤痕遮住了。

我们住在杭州南路时，家中来了一位陌生的年轻人，名叫杨庆。他操南方口音，足蹬一双美军用短腰皮靴，见了面就向桂籍说："孙市长，我一直在找机会，要当面谢谢您的救命之恩。当时不是您的帮助，我绝不可能逃离长春市！"从此他成了我们家的常客，常常陪博比、老二玩，有时在我们家过夜，和复善弟睡在阁楼上。后来桂籍介绍他到台湾水泥公司工作。他和张西箴小姐结婚，我们代表他的家长当主婚人。他为人聪明、勤奋，投资股票赚了不少钱。他们育有两子两女，都已成家立业，全家很早就移居美国了，到现在和我还有联系，这是难得的缘分。

在台湾三年多，我们第六次搬家——从杭州南路搬到爱国东路26号，终于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家，那是1952年年底。一栋20多坪大的木造日式平房，独门独户，前后有小院，但紧靠着左右邻居。这栋房子原属于陈婉若，她是"中央通讯社"总编辑陈博生先生的女儿，桂云和我的旧识。她服务的"中央银行"给她分配了宿舍，所以把爱国东路的私宅出售。临大街的小院，以竹篱围成，大门也是竹做的，院内，一棵扶桑树开的大红花朵，有如笑脸。在大陆似乎少有开大红花朵的花树（至少我从来没有看过），但记得小时候瓦娃讲故事，提到过一个小女孩采到一朵稀有的大红花，花给她带来了好运气。那个时代的爱国东路像台北其他街道一样，路面狭窄，路旁一栋栋日式平房密集连接，我家对面是联勤总部（现改建为"中正纪念堂"），高围墙内面积广阔，大门前有警卫日夜站岗，给人严肃神秘之感。入夜，街道两旁的路灯在木杆上发出暗淡的光。隔壁陈姓邻居家的三个孩子，每晚赤膊坐在路灯下，一边做功课，一边乘凉，他们也是从大陆来的。

我们全家对新居都有好感，也有了长住的心理准备。房子虽然不大，但样样俱全。进门处有一小玄关，可以放鞋，挂衣帽，放伞和手杖。拉开左边的纸门，是两间相连的房间，一小一大，都铺着榻榻米，以纸门隔开。小间临大街，有窗户对着前院，做了客厅，放上四把用粗麻绳编织成底座和靠背、有木扶手的椅子和两个小茶几，还挂了一幅画。大间有壁

橱，是一家四口的卧室，拉开后边的纸门，隔着走廊，是两扇开向后院的玻璃门。走廊左角是一间厕所，仅容一人，蹲式白瓷便盆，旁边放着水桶，使用后，舀水冲洗，便盆下边的粪坑，每周有专人来倾倒清洗。我们买了改良式带洞木凳，供坐着如厕，不必蹲着，其他的就无法改善了。玄关前方右边，是一条铺地板的长廊，沿着左边两间榻榻米房间的墙壁，直通小厨房，并与后边走廊相接。饭桌放在长走廊尽头。迁居后不久，我们把厨房改做浴室，买了洗澡盆、脸盆及洗脸架，洗澡、洗脸时得把一桶桶水倒进去。厨房则移到新搭建的靠后墙小屋，上边再加盖一间，供女佣住宿，以活动木梯上下，给复善弟买的竹床也放在廊子上。后院还有小巷子，绕过别人的后院，通向大街。迁居不久后，我们把临爱国东路的竹围墙和竹大门拆掉，改成砖墙和木门，顿时焕然一新。但我们的负担加重了，修房子的所有开销，都用桂籍向华南银行拿到的信用贷款支付。

新居属于好学区，去女师附小只要步行五分钟，离建国中学和北一女中也不远，有名的南门菜市场坐落在邻街罗斯福路上。与我们亦师亦友的“立法委员”王兆民（墨林）和太太住在附近。

我们从1952年到1958年，在爱国东路26号住了整整六年。一切就绪后，全家生活步入正轨，长子宇同原来就读的女师附属小学离新居很近，减少了接送和赶时间的麻烦。他读小学三年级，学业成绩一直领先，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次子宇立已四岁，每晨由复善弟去工专上课之前，骑脚踏车先送他到和平东路私立再兴幼稚园。桂籍到“立法院”开会，我仍到“联合国同志协会”上班，家中请到一位健壮、笑口常开的客家籍女孩帮做家务。桂籍40岁生日是在新居里过的，王大哥、王大嫂（王兆民夫妇）也来参加，送来一只公鸡和一条活的大鲤鱼。公鸡养在后院内，每天天初亮就喔喔啼叫，吵得四邻不得安宁，只好送了出去。大鲤鱼养在缸中，孩子们很兴奋，忙着喂食，这样一来，全家就无处洗澡了，又不忍心把鱼吃掉。没想到，几天后，鲤鱼由澡盆中跳出，落在水泥地上摔死了，宇同、宇立两兄弟难过了好一阵。

我工作了近两年的“联合国同志协会”是民间组织，只有几个人上班，工作量少，也不固定，我一直想换工作。但大陆来了这么多人，僧多

粥少，找工作谈何容易。可是家中开销日增，桂籍一个人的收入难以维持，我不能不外出工作。

五　如我所愿——志在必得的求职目标

说来也很凑巧。有一天，我到哈尔滨同乡崔宏道家中做客。崔的丈夫李绍荣在台湾银行工作，他们住的宿舍在广州街，是台银分配的，一幢两层木造楼房，共四户人家。李家住楼上，一厅两房，厨厕齐全，厕所内有抽水马桶、沐浴缸和洗脸盆架。以水泥墙隔间的房间方正舒适，每间房都铺上地板，带玻璃窗，光线明亮，空气流畅，前门开向广州街，后门通爱国西路。这种木楼全院落内共有五栋，格局相同，是由从大陆迁来的“扬子建筑公司”设计和建造的。住着20个家庭，都是台湾银行的职员。

我一进李家，眼前一切，使我顿生熟悉、安适的感觉，这是我一直向往的住所啊！我更喜欢这大环境，可算闹中取静，是台北文化教育中心地带，台北最繁华的西门町、万华、衡阳街都距离不远，“总统府”和隔壁并立的台湾银行总行，步行十分多钟即到达。台北有名的植物园及历史博物馆、艺术馆、科学馆、“中央图书馆”都在近旁。最有名气的小学和初中，如南门小学、初中在台银宿舍对面，离女师附小、老松小学、私立静心幼稚园及小学也不远。建国中学、北一女中、女子师专全都在附近，孩子们以后就读太方便了。我离开李家后，暗中决定：我一定要到台湾银行工作，然后争取住进这里的宿舍。

有了目标，就有了希望，剩下的就是全力以赴。返家后和桂籍商量，得知当时台银总经理是东北同乡王钟先生，桂籍认识他，但不愿也不方便为自己的太太说情。次日我带着履历表、证件等，给王大哥（王墨林）看，请他代我打听到台湾银行工作的细节。

经一言九鼎的王大哥特别推荐，问题顺利解决。我于1953年11月到台湾银行人事室报到，职位是“办事员”即行员，底薪180元（当时大学毕业生入台银工作的起薪是130元），和我离开“中央通讯社”时的底薪260元相比，是低了一大截。但我自己所学与银行业务完全没有关系，再加上自

己到台银工作“另有目的”，所以不去计较。好在我被派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资料科，资料科附设小型图书馆，我可以接触和经济、财政、金融有关的书籍、杂志以及每日发行的国内外中英文报纸，倒也既符合我的兴趣，也可发挥所长。就为了这些原因，我在台湾银行心无旁骛地服务了27个年头（从1953年到1980年），即从39岁做到66岁退休为止。职位也由办事员升到副科长、科长、三等专员、二等专员、一等专员、研究员（当时全台银女性研究员只有两位）。

多年来，我在经济研究室资料科负责的工作是：（一）编撰《国内外金融简讯》，每周三、六两次，呈董事长及总经理阅。（二）选辑每日出版的国内外中、英报纸（国内中文报纸六份，英文报纸四份，即英文《中国邮报》、英文《中国日报》、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和香港英文《虎报》；国外有美国《华尔街日报》）上有关经济、财政、金融的资料，缮打成英文目录，每日中午以前呈交董事长和总经理。（三）为英文报纸财经资料做索引，逐期刊登在本室发行的《台湾经济金融月刊》上。（四）审阅资料科重要的英文文件及资料。虽然有同事协助做剪、贴、缮写、印刷等工作，但所有资料的选辑及编撰都由我负责。经济研究室的领导人是主任周慧文、副主任胡祥麟及后任潘志奇，他们都是曾任教大学的饱学之士，财经知识方面的专家。台银经济研究室出版的《台湾经济金融月刊》及以后请专家系统地翻译出版的《世界经济名著丛书》，如《国富论》等，在台湾风行一时，对台湾经济发展有相当的影响力。

我初在台湾银行上班，地点并不在重庆南路的总行，而在重庆南路六巷十号一栋宽大型日式建筑，经济研究室设于该处。多年后孙运璿担任“行政院长”时所居住的房子，就是由它改建成的。台银幼稚园就在我办公室的隔壁。我上班后，第一件事是将次子宇立由再兴幼稚园转到台银幼稚园，以后他上学放学由我顺路接送。我们那时仍住在爱国东路。次年，1954年6月，宇立由台银幼稚园毕业，上台表演山地舞，光着上身，穿着短裤，赤脚，脚腕上系着铜铃，头上绑着带子，插着鸡毛翎，有模有样地和小朋友们随着鼓锣声一起跳起来，博得一阵阵喝彩。同年9月，宇立随同哥哥宇同，上女师附小一年级，两兄弟清晨一同去学校，下午一起放学回

家，虽然学校离我们住家很近，但他们年纪还小，仍要家人接送。

我来台银上班前，在“联合国同志协会”工作时，遇到在协会教小提琴的马熙诚先生，他是我哈尔滨女一中同学郭淑娴的丈夫。宇立从5岁时就向他学习拉小提琴，到女师附小上课后，每周一次的提琴课仍继续。宇同喜欢吹口琴，请他姑姑桂云在香港买了一只德制口琴给他。俗语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学坏，大概是有根据的。

这期间，四弟张复善由台北工业专科学校毕业，服完兵役后，经孙运璿介绍，也到台湾电力公司基隆八斗子发电厂工作。他在那里认识了安徽籍的李训琪小姐，两人结婚，育有六女，以后全家移居美国。三弟张复合在台北士林地政事务所的工作，是经由王墨林大哥介绍、促成的。他也结了婚，太太秀美是台湾人，育有一男一女，都已大学毕业。

回想50年前种种，自己也难以相信，当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担当、毅力和决心？竟能在兵连祸结、交通不畅的年代，将我大弟复成一家六口、三弟复合及四弟复善，从严寒的哈尔滨千里迢迢地接到沈阳，再到南京，最后安排他们也到了台湾，一住40余年。他们在台湾都有固定职业，娶妻生子，生活无虞。当然，并非我一人之功，桂籍从旁协助及“贵人”相助，才使我完成我对父亲的承诺。

可惜天不假年，复成弟和复善弟都已先后作古，未能和大陆亲人见上面。大弟复成去世于1984年10月29日，得年69岁。同年我的继母王氏在大陆哈尔滨过世。四弟复善1989年10月20日病逝于美国，享年60岁。

我们有了自己的住所，生活安定下来，接着，我进台湾银行工作的愿望顺利实现，经济情形有了改善。儿子宇同、宇立都上了小学。桂籍担任“立法委员”，工作繁忙，每日早出晚归。这时我和桂籍都已过了“不惑”的40岁，踏实、稳健了许多，也更体会“平安即是福”的道理。

六　四十二岁如愿生下健康的女儿

1956年5月16日（农历四月初七），我们有了女儿“小三”，全家万分欣喜，尤其是我和桂籍，我们一直希望有个女儿，居然在我42岁如愿以

偿。我们健康乖巧的女儿，取名“宇昭”。

从怀孕开始，我就选择了位于仁爱路的李枝盈医师所开的私人妇产科诊所，他的妇产科医院则设于金山街的巷子里。李枝盈医师本人及其医院，以医术精良、设备齐全而饮誉全台。我怀孕期间按时到他诊所做检查，并决定在他的医院生产，由李医师亲自接生。怀孕过程一切正常，只是到怀孕后期，胎儿在腹中转动得厉害，李医师用两条卷紧的毛巾压在肚子两侧，再用布绳绑紧不使脱落，用来缩小胎儿活动的空间，但效果不大。所以李医师常开玩笑说，将来婴儿生下来，一定要打屁股。我说男孩可以打，若是女儿就不许打了。当时并没有测知胎儿性别的设备。朋友们尤其是王大嫂，常常摸着我的大肚子，经验老到地说：“又是个小子！”而我始终坚信我怀的是女儿。

临盆的当天晚上，桂籍在哈尔滨小学时的同学孔祥集，开着吉普车来请我们到“状元楼”餐馆去，晚饭还没有吃完，我的肚子阵痛发作，赶忙回家取了早就准备妥当的用品和衣物，仍由孔兄开车把我送到李枝盈妇产医院，那是晚上8点多钟。经过李医师检查，由护士长周太太作产前准备。两个小时以后，10点多钟，我顺利生下体重约七磅的可爱女婴。坐在产房外焦急等候的桂籍和孔兄，得知后才安心地返家休息。不过，生产过程也有惊险的一刻，幸亏李医师沉着细心，很快发现婴儿的脐带紧绕着颈项，马上做出适当的处理。如处理不当，或延误时间，婴儿很可能窒息死亡。我产后住院期间，一切护理，都由护士长周太太负责。我出院以后，有一段时间周太太下班后就到我家，替我及女儿做护理工作，减去了我带婴儿往返医院的麻烦。她的先生周祖基是医生，在南部军医院工作，他们有一个女儿叫周瑾，已上小学，他们祖籍福建，也是由大陆去台湾的。不久我们便成了好朋友。周医师由军中退役转至红十字会医院工作，是桂籍促成的。后来周医师被派出国，到利比亚工作，由那里移民美国，听说周医师一直未能考取美国医师执照，太太外出为美国家庭任管家，生活并不如意。从此，渐渐失去了联系。

我很幸运，坐月子期间，除了有周太太在医药护理方面照顾我之外，家中还请了一位50来岁的客家籍“欧巴桑”，她在日据时代就专门为产妇

服务，照顾产妇和婴儿的知识和经验都丰富，人又勤快，有耐性。她来前言明只做三个月，后来延长了几个月才离开。记得她给小三洗澡，是用温度适中的开水，也一定穿着衣服（和尚领的婴儿衫）慢慢放进浴盆，用左手臂托着婴儿身体，并用食指及大拇指压紧两耳，头部稍后仰，先洗脸及头发，再洗身体。有时会把婴儿穿的衣服脱下来，但仍遮盖胸前，她说不是怕婴儿冷，而是让婴儿有安全感，我认为颇有道理。我的三个孩子吃母乳，我尽量喂到十个月大。小三比她两个哥哥幸运多了，在台湾可以买到婴儿奶粉，还有美国进口的婴儿小瓶装食品。我用柔软的纱布制成尿布及其他婴儿用品。姑姑桂云特别由香港寄来全套婴儿床用品和多件漂亮的女婴衣服。小女儿在襁褓时期不缺任何东西，也没有遭受过什么苦楚，她是我们认识的宝宝中，最健康、美丽、出色的小公主。

七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的女科长

我们从抵达台湾，到1956年生下女儿宇昭，七年来一直处于国难家愁中。台湾经过“二二八事件”，陈诚继魏道明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宣布戒严，社会上弥漫着恐怖的气氛。桂籍、我和所有在台会俄语的人，都不敢承认自己懂俄文。家中的俄文书籍、信件、照片等，全部藏起来或烧毁，更不敢和大陆亲友通信，以免被扣上“通敌”的大帽子，遭拘禁乃至处决。

奇怪的是，人民生活虽然艰苦，民间“过年”的气氛却特别浓郁，家家户户竭尽全力弄些钱，去购买鸡、鸭、鱼、肉及年货。大街小巷挤满拜年的人。我们家初一上午，曾有过70余人来拜年或留名片。

陈诚继任后，励精图治，广集众人之智慧与力量，积极进行土地改革，厉行“三七五”减租。对台湾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影响力和贡献的，有尹仲容、李国鼎、严家淦和修复台湾电力的孙运璿等，以及从国外请回的杰出经济学家，如刘大中、蒋硕杰等。如今，致力改革和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功臣尹仲容、刘大中、蒋硕杰、严家淦等已先后去世。李国鼎和孙运璿虽在，也垂垂老矣，行动不便，他们都是台湾经济史上的典范，有他

们的贡献，才有今天的繁荣和富裕，后人不可或忘。

更须一提的是，孙桂籍过去近30年坚守“立法委员”岗位，从开始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参与“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事务，为当局审查、督导和推动经济政策实施，全心全力，对台湾的经济腾飞也不无功劳。

尹仲容先生自1952年起，承担财经决策的重任，他是财经小组委员，也是“中央信托局”局长。他在局长任内，全力发掘和开放银行的功能，鼓励设立大型工业。台湾第一座玻璃厂、嘉新水泥厂和许多纺织公司，都由他创办起来，再转移给民营公司。他历任美援会、外贸协会、台湾银行的主管。那个时代台湾基本没有外汇，全靠美援，外汇交易没有固定价格，他力主汇率单一、黑市与官定利率接近。他主张经济、贸易自由化，力求进出口平衡，开放进口，取消保护政策。他坚持发行百元大钞，又保证不会刺激物价，虽曾遭各方面的反对和指责，但事后证明他的决策没有错。尹先生才华出众，有学问，有决断，有行政能力，更有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我深感幸运的是，他主持台湾银行的时候，我在台银经济研究室工作，每日选集和编辑中、英报章有关世界经济、财政、金融的资料和消息，送给他参阅。有一段时间，他除担任台银董事长职务外，还兼任外贸协会的主管。他将台银经济研究室调查和资料两科的全体工作人员，借调到外贸协会，由经研室副主任胡祥麟先生领导和主持，每日下午协助推行该会部分工作，我也成为其中一员，仍负责收集及编辑外贸、商业方面的资料。

就在那个时候，台银经研室资料科科长职位出缺，人选久久不能决定，主要原因是各方面的请托太多，经研室主任周宪文左右为难。我当时抱着“机会不可放过”的信念和勇气，毅然走进尹主委的办公室，将履历表格及工作报告呈交给他，并说明我担任资料科副科长多年，相信自己有能力、有资格接任科长一职。不数日，台银人事室正式宣布我任经济研究室资料科科长。当时台湾银行各单位好像还没有女科长，我是第一位。

八 震惊全岛的俄船“陶普赛”号入台事件

1954年7月，台湾正处于戒严及“反共抗俄”最狂热的时期，发生了

一桩震惊全岛、引起国际广泛关注的事件：一艘悬挂“斧头加镰刀”红色国旗的苏联船只，不知是迷航还是投诚，竟驶进高雄港口。当局紧急征召在台会俄语的人员，赶到高雄。这队人马，以卜道明先生（他当时是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蒋经国留俄时的同学）为首，并由桂籍协助，还有刘德成、孔祥集、王春敏、陈士廉、韩松林、王宇枢、王语今、刘华昌等十余位，都是从各机关临时抽调的，加上其他学者和专家，共同研究如何安顿、处理和解决。

这艘苏联商船，名“陶普赛”号，船上共有41人，运载着油漆，由黑海出发，原来的目的地是上海，不知为何闯进了台湾高雄港。苏联与台湾早已“断交”，彼此已成敌对关系。为了“陶普赛”号事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台湾无条件归还该船、船员及货品。我“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据实反驳，拿出有“陶普赛”号半数以上船员20余人亲笔签名、要求台湾当局提供政治庇护的信函，并举出其他有力证据。这一事件拖延了很久。据说，这艘船后来归台湾海军，要求政治庇护的20余位船员留在台湾，由当局代为解决生活及工作问题，其余船员则遣送到香港再转返苏联。

桂籍放下身边所有公、私事，奉命随卜道明先生赶往高雄处理“陶普赛”号船事件那段时间，也是我家的多事之秋。最使我们焦心的，是宇同开始出现癫痫病症状，我们四处寻医问药；宇立将从幼稚园毕业，要选择小学，办理入学手续；复善弟服完兵役，需托人找工作；我初到台湾银行上班，忙于适应环境和工作。桂籍人虽在高雄，但放不下台北的家人，经常写来千叮咛万嘱咐的家信。

九　桂籍赴德会及欧洲之旅

小女儿宇昭转眼之间已经一岁多了，不但能在榻榻米上摇摇晃晃地走动，还牙牙学语，会叫“爸爸”“妈妈”“哥哥”，会摇头摆手，大声说“不要，不要”。就在这个时候，当局选派桂籍和朱士雄往德国慕尼黑参加一次会议，并到欧洲其他国家考察、游览。这可是极为难得的机会。

桂籍途径香港，和相别十余年的妹妹桂云一家相聚数日。桂云、伯威极热情亲切地接待到访的哥哥，坚请他睡主卧房，给他换了新皮箱，并添购了新衣物以壮行色。桂籍回程，再经过香港，桂云准备了给我们每个人的礼物，给宇同的是一个长方形如书本大小的收音机，他非常喜欢。还带来一大包各式各样的巧克力糖和饼干，都是在台湾难得吃到的奇货，孩子们把这包糖果称作“姑姑糖”，以后每到年节就盼望香港寄来的“姑姑糖”。那时台湾邮政不发达，对外部邮件和包裹检查特别严格，但是姑姑总想尽办法，托人如期带到。

桂籍离开香港，直飞德国慕尼黑开会。会议结束以后，到欧洲其他各国。首站巴黎，由在巴黎留学的董景昭和朱德群陪同。董景昭是东北乡亲董延平将军之女，在台北师范大学艺术系二年级肄业，后辍学赴巴黎深造。朱德群是师大艺术系讲师，也在巴黎习画，他当时还没有成名（以后，经数十年的奋斗，终于成为华裔画家中的顶尖人物）。桂籍一行参观了巴黎有名的古迹和建筑，如铁塔、香榭里大道、拿破仑墓，各著名美术馆、博物馆，最后进拉丁区逛画廊及书店。桂籍一时大意，被扒手从西装上衣内口袋中偷走全部证件及款项，赶快报警，但这种事在巴黎司空见惯，无法破案，虽万分懊恼，也只好认栽。陪行的朱德群却忍不住掉下眼泪，说他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对不起孙伯伯，而目前他没有能力资助。桂籍安慰他说：“将来你成名了，别忘记送我一张你的画作就好了。我现在赶快去补办手续和借款，好继续行程。”二十年后的1977年，我第一次到巴黎参加妇女作家会议，已名满天下的朱德群未忘前诺，果真送我一幅他的色彩艳丽的抽象画。遗憾的是桂籍已于一年前逝世。

朱德群、董景昭两人留学巴黎期间竟发生恋情，得不到家人及亲友的谅解，两人也有愧于心，良心受谴，深感痛苦。双方家庭更是气愤、悔恨。朱德群在台北已有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两口子一直恩爱。夫妻两人多年努力工作，省吃俭用，才存够路费、学费，供朱出洋留学。朱德群辞去师大教职，抛妻别女在基隆登船远赴巴黎。与此同时，董家夫妇依依不舍地为“掌上明珠”——不满20岁的女儿送行。此前，为了凑足董景昭赴巴黎习画的开销，董父曾托桂籍和我，把家藏的一幅宋代赵大年作的

青绿山水画，割爱让给黄君璧老师。黄老师对此画早有所闻，也极想拥有。一方需款，一方爱画，很快议定画价成交。（听说黄老师后来将此画以数倍的高价转售给日本某博物馆）

董家夫妇将女儿送上船，为她安顿好舱位，正欲离去，竟意外遇到景昭在师大的老师——同船的朱德群老师。董家夫妇十分欣喜，再三拜托老师代为照顾初出家门的独生女，却万万没有想到，此行酿成董、朱两家的大悲剧。朱、董师生在巴黎日久生情，难舍难离，朱德群只好要求和在台北苦等的妻子离婚，而妻子坚决拒绝，表示身为天主教徒，终生不会离婚。消息传到董家，两老又惊又生气，马上让留学美国的儿子到巴黎去，强行带走妹妹，让她转学美国。对董家更不幸的事竟在此时发生了：董家儿子带着初到美国的妹妹和友人，乘小船游湖散心，不慎翻船，船上数人都被救起，唯独游泳技术高超的哥哥意外溺毙。董景昭也就离开美国，重返巴黎。董家两老把儿子的不幸归罪于女儿，悲痛加上悔恨，董父宣布与景昭断绝父女关系。接踵而来的重大打击，使董家两老难以承受，他们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迅速衰老、消沉。朱德群和董景昭数十年来一直同住巴黎，育有二子，都已长大成人。

十　轻舟已过万重山——太平日子的悲欢点滴

进入1957年，台湾的社会秩序、人民生活逐渐步入平稳常态。不料此时发生了“刘自然事件”，掀起轩然大波，几乎不可收拾。来由是这样的：当时台湾依赖美援，来台美军及眷属众多，他们享有特权，生活优裕，不免盛气凌人。国军军官刘自然在阳明山，从窗口窥视美军眷属洗澡，竟被美军开枪打死。这一年5月，美国军事法庭判决杀人者无罪，引发台湾人民对美军的不满和愤恨，群起抗议，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游行示威的队伍向美国驻台大使馆及美军机关掷石子、鸡蛋，路遇美侨即不问情由，殴打一顿。一段时间，住在台湾的外籍人士都不敢出门。好在不久即平息。

这时我们的家，已由四口变成五口，全家更感快乐满足。两个哥哥

对妹妹的爱护处处可见。大哥宇同长宇昭12岁，他已小学毕业，准备升初中，因为他的病情不时发作，我们为选择适合他就读的中学颇费心思。桂籍和我最后决定，让他读私立强恕中学，该校钮长耀校长是熟人，学校在汀州路，离我们家较近。

我的大弟张复成在高雄工作，他一人收入维持一家八口，生活艰难。我、桂籍和复成夫妇商量，将他家初中刚刚毕业的老二张习宽接到台北来读高中，学费、生活费由我们负担。这样安排，一来习宽可陪伴宇同，二来，减轻复成弟家的负担。1958年9月，宇同和二表哥张习宽一起到台北私立强恕中学上学，宇同读初中一年级，习宽读高中。

1958年，我们家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5月间，一向强壮活泼的次子宇立，在女师附小就读四年级时感染到腮腺炎（耳下腺炎），右颈红肿不适，先带他到南昌街蔡小儿科求诊，又去看了中心诊所小儿科主任聂医师。因腮腺炎已有转变为脑膜炎的迹象，我们听从两位医师的建议，把宇立送往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宇立由父亲陪伴，住进儿科隔离病房。哥哥宇同想念弟弟，又不能到医院探望，怕被传染，只好由我领着，到中山南路“立法院”附近，在马路中央的安全岛上，和约好时间的弟弟见面，弟弟在五楼病房的窗前向哥哥摇手打招呼。住院数周后，宇立病愈出院，马上回学校销假，很快就追上班上的同学。

7月，台湾进入酷热的夏季，树梢上的蝉不停地鼓噪，使人烦躁不安。就在这个时候，桂籍突然发生气喘，呼吸困难，到台大医院就医。医师建议，找个空气清新、环境幽静之地休息静养一阵。经孙运璿安排，到台中日月潭的台湾电力公司招待所小住。我因为工作关系，更因为孩子幼小，小女儿宇昭不满两岁，无法离家陪同，只好让他带病独自前往日月潭。虽然不放心，但无可奈何。家中没有电话，只能请孙运璿用电力公司的电话传递消息。

爱国东路的房子小，人口众多，孩子们渐渐长大，房间已不够使用。那时没有家庭电器，如冰箱、冷气机、电扇、电锅等。我们由大陆带来一台“西门子”牌德造小电扇，是二弟复钧送的二手货。晚间全家睡在榻榻米上，我给小风扇插上电，但是电扇转得慢，风力又弱，无济于事。家中

倒有一个“克难”式“冰箱”，木制，内镶铁皮，每天中午买一块大冰块放入，到次晨才全部融化成水。早、午做好的饭菜放进去，可以保持新鲜。

复善弟还用大铁罐做了一个“克难”式“烤箱”，要放在炭炉子上慢慢烤，火不能太旺。我曾拿来试着做西点，但效果不佳。早年的台北，没有卖面包、点心的店铺，更不用说卖西式点心了。家里有一罐玉彬由上海托人带来的奶油，我自作聪明，面粉中加入奶油，还有糖和水，做成小饼干，放进烤箱烤，味道倒也差强人意，孩子们吃得很高兴。周末假日孩子们还能吃到自制冰淇淋，不过手续繁复。第一步是将奶粉（当时没有新鲜牛奶出售）加糖搅匀，加上适量的水，然后由复善骑脚踏车，飞快送到隔一条马路（罗斯福路）的南昌街一家制冰块的店铺，用他们的机器将带去的冰淇淋液体加冰块，搅拌，使之凝固，再飞快骑车赶回家。这阵子，宇同、宇立、宇昭，邻居刘新秋兄妹，王大哥、王大嫂家的维兰、维平，都已靠墙坐在榻榻米上，手捧着饭碗，眼巴巴地等候着。孩子们能吃到“冰淇淋”，那时算得是奇迹了。

到1958年，我在台银已工作了五年，早已具备了申请宿舍的资格。何况，最初我到台湾银行申请工作，就是冲着广州街一带的台银宿舍。我的这一意愿，曾对住在广州街三号台银宿舍的经济研究室副主任胡祥麟先生说过，也请他代为留意，如果广州街宿舍有住户迁出，请他告诉我。说也凑巧，胡先生因另有较理想的台银宿舍供他居住，告诉我他家即将搬走。我马上到台银总服务室申请，如愿于1958年10月住进了广州街三号台银宿舍，将住了六年的爱国东路的房舍租出，租金拿来贴补家用，生活又改善了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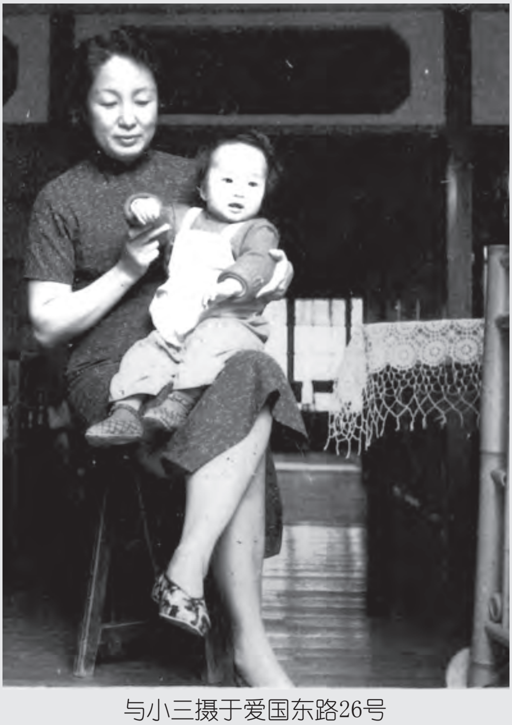
我们住三号左侧楼下，面积不大，客厅一间，住房两间，一大一小，厨厕齐全，以后台银又为每户加盖两个房间，我们家的房间终于够用了。宿舍后边的大院内，每户还有一间木制储藏室。我们把储藏室略加修整，改为佣人房，木墙上挖了个洞，做了窗框，装上了玻璃，又买了竹床、竹桌、竹柜，放在房里。我们很幸运，经友人介绍，请了一位30多岁的太太来做家务，她名叫素梅，台湾南部嘉义人。

博比（宇同）、老二（宇立）、小三（宇昭）（1949—2010）

宇昭的诞生，给我们全家带来最大的喜悦

摄于台北市新公园

举家到狮头山旅游



与小三摄于爱国东路26号

新加坡乌敏岛、掖县朱由村、加州羚羊谷

我在乌敏岛仄爪哇自然保护区，沉思、写作、写生

张家祖居墙外，屋顶墙头仍铺着海草。有老人仍叫我小名“聚聚”，令我热泪盈眶。(照片中是二弟复均)

与宇立及宇昭游玩南加州羚羊谷罂粟花自然保护区

50年无间断的国画学习、创作与教学

松瀑图——水墨设色，戊申年（1968年）作，台北历史博物馆收藏

深山幽谷——乙巳年（1965年）作，台北历史博物馆收藏

我在认真作画

1960年我第一次画展时照

白云堂、拾趣画会及宇昭绘画

1950年开始向黄君璧老师学习国画山水（前排右一是我）

拾趣画会好友合影（右四是我）

秾华不愧号花王　孙宇昭绘

|第五辑| 缅怀母亲

孙宇立、孙宇昭补记：

行文至此，母亲说：“我写这些，是让儿孙知道我的早年人生经历。自此以后的事，就是过太平日子了。你们都知晓了，不用我再记了。”然而母亲不改记录生活点滴和感想的习惯，此后依然留下了许多片段笔记，可惜均未经整理。

于是我们写成第五辑，记下一些小时候有关母亲父亲印象至深的事，以缅怀至亲。

"简单、有序、美观、自然"，是母亲写在案头以期自勉的几个字。

一

母亲总以丰富细腻的情感，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及处理每一件事。

母亲生活注重品质与品味。不论在家或外出，永远衣着整齐、打扮端庄、一丝不紊。

家中家具安排及摆设布置都由她亲自决定，且都定期打扫整理。客厅和餐厅总是放置绿叶植物，桌上瓶内常有鲜花，盘中置有水果。

只要是母亲在家的下午，三点、四点之间一定是喝下午茶的时间。母亲总会端上热腾腾的红茶或咖啡，然后拿出她珍藏的最好白兰地，加入一小匙，配着她早已预备好的甜点。亲朋好友或学生，大家围桌而坐，畅快谈笑。

从小最期盼的事就是有机会随着父母，到武昌街俄罗斯明星咖啡厅坐上大半个下午，喝一杯咖啡，吃一片俄式拿破仑酥皮蛋糕，轻松地与他们谈学业、谈交友。

每年学校假期时父亲会提早向“立法院”借来大巴士，载着我们加上亲朋好友七八家，三四十人，同赴大自然露营或住宿数日。我们的足迹遍布了台湾北部海边：头城、福隆、金山、白沙湾、八斗子。每家都会准备好最拿手的食物，然而最受欢迎的，总是母亲学瓦娃做的俄国炸包子。我

们随着母亲散步于林间，她总会随手折下一朵小紫蓝色花别在胸前。她告诉我们瓦娃最喜欢紫蓝色的花，她以此怀念瓦娃。至今只要有机会我们也总如此做。

二

母亲多次提到，她小时候一桩又难忘又得意的事：她约莫十岁，与瓦娃住在东顺祥大院时，每天与桂云姐一同上学，途中必经过一日本人经营的小旅馆。有一天，该是日本的节庆，旅馆大门两旁插了许多日本膏药小旗。她们二人从小就从大人口中知道，日本鬼子肆意侵略东北以来许多中国百姓屈辱悲惨的故事，经过旅馆门前，不知何处来的胆子，使一下眼色，一起飞快拔起几面膏药小旗，扔在地上，随即拔腿奔跑。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她们天天心惊胆战，怕让日本人捉去，上学都绕道，宁可多走路。

三

宇立念小学时，劳作科老师要求每人都要买些小手工具。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晚上，晚餐后父亲带着宇立到后火车站一家专卖手工具的店。父亲挑买了一盒日本制小巧完备的工具盒。看到了高昂的标价，宇立急告父亲买几支普通的本地便宜货就成了。父亲笑笑依旧付了款。回家的路上父亲才说，工具不好是做不出好活计的，就如做事必须要先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能不输在起跑点上。

母亲任职于台湾银行资料室，负责整理分析国内外政治、财经趋势及走向。她总携回待阅的世界各地中英文最新报章杂志。父亲为台湾政经分析评论专家，家中定期有人送来大陆的《人民日报》、香港的《大公报》。另外，50年代中起，“自由俄联”租借“中国广播公司”的播音设备，由台湾以俄语定期播音。父亲母亲因为精通俄语被政府委派聆听播音内容，家中常见俄文录音带及播音稿。

这些当年台湾少见的世界各地政经中英文资料，常置家中案头。宇立

在做功课之余经常翻阅选读。加上经常坐听父母及来访亲友宏观、微观地畅谈世界国家议题，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宇立的成长及人生志趣。父母常用俄语交谈，宇立好奇想学，但他们总是说学俄文不易，而且在当年台湾用处不大，所以，造成遗憾——至今宇立的俄语仅止于一些单字。

四

母亲从1950年起就师从国画大师黄君璧，每周赴其画室上课。母亲习画不改她做事认真的习惯，每星期数次收拾干净晚餐桌后，就俯伏其上认真练习。有时唤我们站在桌旁，她会告诉我们不同的树叶、石头及不同的皴法怎么画。淘气的哥哥与宇立常在母亲转身忙别的事时，拾起画笔模仿加笔，希望母亲回到餐桌时看不出我们加在何处。

有时母亲赴黄大师青田街画室绘画课时，会带着我们同去，她总是会安排我们站在头排，清楚地聆听大师解说，观看大师落笔绘画及着色。宇昭从小也深受母亲的影响，终身从事音乐教学并致力国画花鸟绘画。

五

母亲很注重食物的营养、色香味的齐全及肉类、蔬菜、水果的均衡搭配，家中冰箱中永远有起士、牛油、牛奶及面包。母亲也注重饮食礼仪，除要求进餐时衣着整齐，她也总将盘碗碟筷匙全套摆置整齐，等大家端坐餐桌前才动筷。

母亲的厨艺在亲友圈中是出名的。除了包子、饺子、馒头、馅饼等面食外，母亲还擅长做罗宋汤，也炒得一手好菜。宇立从小有很多机会陪母亲赴市场采购。在家时母亲只要见宇立经过厨房，必一把拉住，把刚炒出的菜肴塞满宇立一口，同时也很快地解释这个菜是怎么做出来的。所以宇立从小对食品营养、采购及烹饪有了基本观念，后来宇立赴美国留学的时候，做菜的功夫在朋友间是出名的。宇昭更真正继承了母亲的一手好厨艺，当年我们尝到的佳肴，今天宇昭都能色香味一丝不差地再现。

六

每年农历新年将届之时，是我们小孩子最兴奋期盼的时节。年前两星期起，母亲就张罗过年的采购，安排全家大扫除，开始渍酸菜，腌糖蒜，酿葡萄酒，灌香肠。父亲也开始带我们去买鞭炮，买红布，找人写对联。年三十的晚上父亲带着我们挂对联，拿出祖先牌位及照片，擦亮铜烛台，点燃一对红蜡烛拜祭祖先。大家开始只说“岁岁平安”等吉祥话。

然后，父亲带着我们尽兴地放各式鞭炮，再回到屋内时，年夜饭也齐备了，东北酸菜火锅等各色菜式摆满一桌，小孩大人亲友一起喝酒同乐。当晚掷骰子，守夜，直至午夜时分到门外大放鞭炮，之后紧闭大门，举家团圆，一桌同吃元宝饺子，小孩子拿了红包以后才依依不舍地去睡觉。

每年大年初二，是母亲当年在中央社沈阳分社任采访组组长时的手下组员来家聚会的日子。记得来家的有陈家骥、齐振一、林家琦、万存仁等。家中顿时充满浓郁的东北乡音，他们豪爽地大碗吃肉、大口喝酒，高呼“大姐”之声彼起此落。

七

父母靠着公务人员有限的收入，勤俭朴素地过着量入为出的日子。从小家中几十年，我们不记得买过什么新家具。长沙发、餐桌、坐椅、窗帘，都来自杜伯伯家；单沙发、咖啡桌及台儿，来自孙叔叔家。记得父亲早年期期购买“爱国奖券”，结果在1956年中了一次奖，举家高兴。母亲总说，靠了这笔钱付了生宇昭的住院费及在家中装了电话。

父亲去世后宇立陪着母亲整理书桌，拿出了一本银行存折，上面打印着“存款台币3000元”。母亲含着泪告诉宇立，这是父亲所有的存款。父亲最近才说，与朋友下小馆常是他人付钱，下次他要提出这笔钱请朋友吃一顿。

宇立小时候，有一天晚上，父亲有个朋友提着一盒饼干来访，时间已

晚，宇立与母亲入房就寝。嘈杂声惊醒了宇立，原来是父亲摇醒了母亲，高声讨论事情后，匆匆披上外套，跨上脚踏车，在夜色中消失。宇立急问是何事发生，母亲才告诉他，朋友离去后，父亲从纸袋中拿出饼干盒，惊见下面有一个塞满现钞的信封，于是追去他家送回。

八

应是60年代初期，每年过年前必有人送来两大盆盛开的金黄大菊花，摆置在家门外。这些年随父母到孙叔叔家拜年，必然也看到同样的两大盆花，原以为是巧合。但以后年年依然如此，宇立按捺不住好奇问了母亲。她告诉宇立："你有没有注意到，台湾从南到北，木头电线杆都已陆续换成水泥电线杆了？这是数年前台湾水泥公司新发展出的产品。当时他们想销售给台湾电力公司，但苦无门路。听说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召集委员的父亲熟识台电孙运璿总经理，因此透过好友找上你父亲。你父亲一听认为这是提升输电功效的必然选择，立即引见推荐。不出数年台泥水泥电杆遍及全岛。"公营转民营起步不久的台泥，从中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台泥原希望送上现金以感谢我父亲及孙总经理，经严词回拒后只好借过年的机会，以盆花送两家表谢意。

孙运璿叔叔是父亲亲如兄弟的好友。记得小时候，经常晚餐后孙叔叔就骑着脚踏车来了，坐在客厅中与父亲畅谈。好多次我们在睡梦中听到母亲的声音："运璿，这么晚了别谈了。"第二天早上母亲会笑着告诉我们："撵走你孙叔叔以后，你爸爸骑车陪他回家，到了他家门口，孙叔叔又转头骑车陪你爸爸回来，才骑车走的。"

1964年孙叔叔受聘世界银行，出任尼日利亚电力公司总经理，1967年期满返台后到我们家探望父亲母亲，并告知父亲，新任"经济部长"李国鼎有意请他出任"经济部次长"。父亲力劝他不要接受，理由是李与孙年龄、学历、经历相若，二人均为上层瞩目的栋梁之才。若孙屈居为李之副手，此一主次之实未来不易变更。孙叔叔于是婉拒，转而接受台湾大学教授之职。1967年年底上层果然委任孙叔叔为"交通部长"，之后1969年出

任“经济部长”，并于1978年更上一层楼，出任“行政院长”。在将近20年的“部长”与“行政院长”任内，孙运璿与李国鼎（任“政务委员”）共同规划台湾早期科技政策，推行“十大建设”，最终成为造就台湾经济建设成功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记得是1978年春末的一个下午，宇立适巧在家，见孙叔叔来访并与母亲入室谈话，之后他带着泛红的双眼离去。母亲告诉宇立，孙叔叔早上应“总统”召见，并已被委任为“行政院长”。与母亲谈话结束前，孙叔叔说，少了桂籍，他没有能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了。

孙叔叔任“行政院长”之后，还和过去数十年一样，年年来我家拜年。此时不同的是，他来之前总有一车保安警卫先行，严密把守在我们所住的台银宿舍四楼门口和其他各层。

记得有一年年初一早上，孙叔叔来了，坐在客厅和母亲轻松话往事。过了好长时间，母亲按捺不住了，说：“运璿，你这大忙人，年初一快到别家拜年去吧！”孙叔叔苦笑着说：“郁廉，现在这样子我还能给谁拜年呢？” 一天，宇立接到孙叔叔办公室机要秘书姚太太来电，说孙院长想约宇立谈谈。宇立依约前往。坐下后，孙叔叔详细问了宇立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之后说：“你有任何问题或需要就来找孙叔叔。”宇立对孙叔叔所说感到温心也感激，然而宇立秉承父亲的个性，一生从来不为个人的事情请熟人说项，这次也不例外。

九

香港的桂云姑姑是我们小时候觉得最亲切又是最遥远的亲人。每隔一阵子家里就会收到香港寄来的包裹，有衣服、玩具、糖果、巧克力。父母亲也常会收到来自香港的航空信，里面总是姑姑写的密密麻麻话家常的字句。

父母亲最敬重、来往最密切的长者有好友王墨林夫妇（王大爷及王大娘）、杜桐荪夫妇（杜伯伯及杜妈妈）及易国瑞夫妇（易伯伯及罗姨）；同龄的有孙运璿夫妇；较年轻的有杨庆夫妇及韩松林夫妇。加上母亲在台

的三个弟弟复成、复合、复善及家人，还有一些来台后穷困潦倒的乡亲、老朋友，再就是母亲的亲密画友及学生。他们来时，父亲母亲总是嘘寒问暖，热情招待，若有需要总是尽力协助。

记得是宇立六七岁的时候，一个下午，王大娘来到我们爱国东路的住家，兴奋地告诉母亲，一会儿刚由韩国战场到来的一万四千个军人，将游行过我家旁边的罗斯福路。她怀着一丝希望，愿她1949年匆促赴台时，未来得及跟随的两个儿子能在行列之中。随后王大娘牵着宇立的手，站在路边，急切地细看着一排排臂带刺青、唱着歌曲、高呼口号的青年快步走过，直至最后，才不发一言，失望地送宇立回家。迟至90年代，才知道名歌星王菲的父亲，就是当年王大娘站在路边望眼欲穿地期盼出现的次子王佑林。

另有一个晚上，母亲匆匆吃完晚餐，与杜妈妈消失于夜色之中。第二天妈妈才告诉宇立，她昨天晚上陪杜妈妈赴基隆码头，给从小喜欢逗弄宇立的杜纪川哥哥送行，杜哥哥将搭船远赴德国投亲并求学。杜纪川在德国苦学后赴美国创业，如今成就了全世界最大的电脑记忆储存体公司“金士顿科技”，他本人成了美籍华人中顶尖的企业领袖。

十

母亲退休后，每日早晨到附近植物园散步并打太极拳锻炼身体，在家中屋顶花园种植、照顾花木，也每周两次开班专心教画，并每年与宇昭、学生或友人外出旅行，遍游世界。她也随宇立回山东孙、张老家祭祖探亲，赴哈尔滨逐一重访她出生、成长及念书的地方，并赴俄国坟场（现已改成公园）拜祭她终生感恩的瓦娃，并嘱托在哈尔滨的二舅为瓦娃立个花岗石碑，也借机探望各地亲友。1997年恰于母亲83岁生日当天，她完成此生的最大心愿——抵达瓦娃的故乡莫斯科旅游。在莫斯科期间，她脱队，希望找到苏联战时摄影记者卡尔曼，然而物改星移，她手持的地址已不复存在了。

宇立1981年起定居新加坡。由1980年代中期起，母亲无论在台湾、新加坡还是出国旅行，都带着笔记本，常静坐一隅沉思，记笔记，着手写下了这本回忆录。

母亲2000年移居美国，在宇昭居所附近的老人公寓独居，受到宇昭早晚无微不至的照顾。母亲在近90岁高龄仍开班授画，为有美金收入而得意。

2005年起母亲健康状况渐退，但仍常画山水速写，默写和朗诵俄文诗篇及高唱俄文歌曲以自娱。母亲于2010年5月12日睡梦中，安逝于美国洛杉矶，随后移灵台湾，安葬于台北阳明山第一公墓，与父亲同穴永眠。

母亲原是一介平凡小女子，在动荡的大时代，亲历悲欢离合、国破家亡的民族悲剧，在无奈的随波逐流中挣扎求存，终于谱就她这一段不平凡的生命篇章。

张郁廉2006年3月笔墨速写，时年九十二

附录一　瓦娃——我伟大的白俄母亲

我親愛的瓦娃——我心目中偉大的母親。她的全名是瓦爾娃拉、斯提巴諾瓦、阿里莫瓦。白俄貴族。中東鐵路開始修築時，她和工程師丈夫阿里莫夫先生由帝俄政府派到中國哈爾濱工作。在我喪母後，她自願收留我；自我兩歲養育我到十九歲她逝世為止。

此照是一九三一年我初中畢業離哈赴天津投考南開女中高中時所拍攝。下照是一九三二年由北平返哈探親时所照。

瓦娃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因心臟病在哈爾濱東順祥院內二樓寓所去世。我当時正在北平慕貞女中讀高中三年级。

附录二　瓦娃亲笔为我抄录的诗篇

Если-б легкой птицы
Крылья я имела,
В частый бы кустарник
Я не полетела.

x x x

Если-б я имела
Голос соловьиный,
Я бы не носилась
С песней над долиной

x x x

Я бы не летала
На рассвете в поле
Косарям усталым
Петь о лучшей доле

x x x

Я бы не кружилась
Вечером над хаткой
Чтоб ребенка песней
Убаюкать сладкой

x x x

Нет! я полетела-б
С песней в город дальний:
Есть там дом обширный
Всех домов печальный

x x x

У стены высокой
Ходят часовые.
В окна смотрят люди
Бледные, худые.

x x x

Им никто не скажет
Ласкового слова, -
Только ветер песни
Им поет сурово.

x x x

От окна к другому
Там-бы я летала,
Узников приветным
Песней утешала.

x x x

Я-б им навевала
Золотые грезы
И из глаз потухших
Вызывала слезы

x x x

Чтобы эти слезы
Щеки их смочили
Полную печали
Душу облегчили...

И. Суриков

Целую тебя крепко твоя. Валя

附录二　瓦娃亲笔为我抄录的诗篇（翻译）

瓦娃 親筆抄錄的 俄國詩人 伊.蘇利克夫 的詩篇. 她於1931年到1933年之間寄給我. 我當時在 北平慕貞高中就讀，到現在(1994)已保存了六十餘年. 以下是我的譯文:

假若像一隻輕捷的鳥兒
我有一雙翅膀
茂密的叢林
我不會去飛

× × ×

假若我擁有
黃鶯的歌喉
我不會在谿谷
盤旋歌唱

× × ×

我不會飛翔
在黎明時的田野
為疲倦的稻草人
歌頌較美好的命運

× × ×

我不會徘徊
在夜晚的農舍上
用歌聲催引着嬰兒
甜蜜入睡

× × ×

不！我會唱着歌飛到
那遙遠的城市:
有一棟寬大的房屋
所有房屋中最悲慘的一棟

× × ×

高高的圍牆外
有警衛在巡邏
從窗口往外探視的人
慘白，瘦弱

× × ×

沒有人向他們說句
安慰的話語
只有狂風為他們吹奏着
冷酷的歌調

× × ×

從一個窗口到另一個
我會飛來飛去
用慰問的歌聲
安慰那些囚犯

× × ×

我為他們引燃起
金色的夢想
從絕望的眼睛中
落下淚水

× × ×

讓這些淚水
潤濕他們的雙頰
把充滿心中的悲痛
減輕…… .

伊.蘇利克夫

緊緊擁吻你，你的瓦娃

附录三 卡尔曼1941年莫斯科给我的来函

(蘇联《消息報》攝影記者
卡爾曼 Карман 写给我的原文信)

Уважаемая мисс Чжан!

Много, м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прошло с тех пор, как я написал Вам письмо. Вот уже два года как мы ведем эту суровую войну с самым жестоким и коварным врагом, которого знала история. С первых же выстрелов войны, как Вы можете догадаться – я на фронте. За эти два года побывал я на всех фронтах, заснял тысячи метров пленки, много писал, за это время уже стал на ноги сынишка Саша, которого Нина – моя жена родила в первые дни войны. А моя голова стала совсем, совсем седая.

Очень часто, когда я вспоминаю о своих скитаниях по Китаю я с большой дружбой и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ю вспоминаю Вас и рассказываю своим друзьям о храброй выносливой и мужествен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девушке Чжан-Лянь, без помощи которой я не смог бы проделать и одной сотой доли той работы, которая выпала на долю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но оператора и журналиста в Вашей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й стране.

Много рассказывал я о наших с Вами путешествиях Нине, которая тогда была моей невестой, и о которой Вы тогда, помните, шутя говорили мне: –забыла Вас Ваша Ниночка. Вот видите, не забыла, мы поженились сразу по моем приезде из Китая и до сегодняшнего дня связаны неразрывной дружбой и любовью.

Получил недавно письмо от Го Мо жо, о котором сохранил самые тепл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сейчас с товарищем Ешуриным, который передаст Вам это письмо, шлю ответ.

Очень рад был бы получить [illegible] письмецо. Расскажите о своей работе, как живете. Вы еще в ТАСС работаете? Еще не вышли замуж? Может быть у Вас уже дети?

Посылаю Вам фотографию моего сынишки.

Желаю Вам всего,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 Успехов в работе, здоровья, счастья, а главное – Вам и Вашей героической стране – полной победы, которая дас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правившись от всех ужасов войны начать строить новую радостную жизнь.

Ваш Р. Кармен

Мисс Чжан. У меня к Вам просьба. Помните я уезжал из Китая заказал для Нины китайский халат? Ни одно платье так не шло ей как это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е платье. И мне было приятно когда она его надевала – напоминало Китай. Это платье погибло и я очень хочу [illegible] снова подарить ей китайский такой халат.

Товарищ Ежурин обещал мне сделать это – заказать в Чунцине и прислать в Москву. Я Вас попрошу помочь ему выбрать такой же материал и заказать. Буду очень Вам благодарен.

Привет!

Мой московский адрес: Москва Большая Полянка д.№ 34 кв. 35

Посылаю Вам фото мое и

附录三　卡尔曼1941年莫斯科给我的来函（翻译）

敬愛的張小姐！

從我上次寫信給您已經過了很久很久的時間了。兩年來我們和歷史上最兇惡陰險的敵人進行殘酷的戰爭。您會猜到——從戰爭開始，我已在前線了。兩年來我走遍各戰場，拍攝了千米膠卷，也寫了許多文章。這期間我的兒子薩沙已能走路了，他是妮娜——我的妻子在戰爭初期生下的，而我的頭髮已完全 完全灰白了。

常常，當我回想起在中國的種種情形時，我以偉大友誼和感激的心情想起您，並且告訴我的朋友們關於一位勇敢、堅韌、剛毅的中國姑娘張郁廉。我，一个蘇聯攝影及新聞記者身處在你們美好國家時，假若沒有您的協助，我的工作連百分之一也不可能完成。

我多次向當時還是我未婚妻的妮娜述說我們一起在前線工作的情形。您還記得嗎？您曾開玩笑的對我說：「您可愛的妮娜已把您忘掉了！」您看，她沒有忘掉我，我從中國回來後，馬上就結了婚，一直到今日，我們相敬相愛的聯繫在一起。

不久以前接到郭沫若先生的來信，我對他一直保留着溫馨的記憶。現在我請帶此信給您的葉舒林同志也帶一封回信給他。

我會非常高興見到您的回信，請告訴我些您工作和生活情形。您是不是仍在塔斯社工作？是否已結婚？可能您已有了孩子。

隨信寄上我兒子的照片。

祝福您一切一切都安好；工作、健康、幸福都達美滿，而主要祝您和您的國家獲得圓滿勝利，改善所有因殘酷戰爭所遭受的創傷並重新開始建立快樂的生活。

Р. 卡爾曼

又：張小姐，我有一个請求：您是否還記得，我離開中國時曾為妮娜訂做了一件中國旗袍？沒有一件衣服比那件旗袍更適合她。當時她穿上旗袍時我覺得很欣慰——使我想起中國。這件旗袍已損壞，我很想再送一件中國旗袍。葉舒林同志答應我在重慶重新訂做一件旗袍並帶回莫斯科給我。我請您協助他選購同樣衣料並代訂做，十分感謝。

祝好

我莫斯科地址：Москва Большая Полянка Д. No. 34 Кв. 35

附寄我和妻子及兒子的照片。

卡爾曼

附录四 《在前线》——我1938年的战地采访报道

在前线

从武汉撤退说起

十月二十一日

北平西山上的枫叶该红透了，去年这个时候我沿江由南京来，今年的这几天，汉口各码头挤满了逃难的人。轮船再也容不下一个人了，几家合租一只大木船也是办法，已经有无数的木船，撑着篷帆向西去了。女人弯着腿，一个靠一个坐在木船里，手上抱着哭叫要吃的孩子，有的依着妈妈的胸正甜蜜地睡着。男人们忙来忙去，焦急地往另外的木船上装行李。小贩撑着伞，摆起了他们的食摊，有面，有饼，有加辣椒的咸菜。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子，梳着扎红绳的小辫子，看守着一大堆行李。我问她：“你到那里去呀？”她掉过头来，笑了，说“吾坐船！”，是苏州口音。

武汉五千多人力车夫，十九日集中桥口，分三日，数队离汉。他们可以携带家眷和车子，市政府每人发给国币一元。为了避免遭受敌人的屠杀，二十一日人力车夫已全数离开了武汉，这是人力的保全，武汉街道上，除了少数私人包车外，再也见不到一辆人力车了。二十日上午过江到武昌，从蛇山黄鹤楼下望武昌全市，没有一家烟囱冒烟，街道上也很难看见行人，只有江里无数白帆逆水向西移动。汉口法租界倒比平时热闹了，在绕着电网的木栅里，安南兵戴着宽大的黑色巴黎便帽走来走去，保护里边正在歌舞的“特种”人。有消息传出，特三区将成“难民区”，由英国水兵保护，所以许多无力逃走的同胞们，扶老携幼，背着锅瓢，往靠近法租界的特三区迁移。谁也不知道，我们这些无辜的兄弟姊妹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遭遇。

武汉三镇原有居民一百五十万，经几次疏散后，除法租界十五万外，剩余无几。

十九日有机会遇到朝鲜义勇队的队员，一群年富力壮的小伙子，正在听着政治部副部长讲演，他们都是不愿在帝国的铁蹄下做奴隶的人。为了

争取朝鲜的独立自由，他们暂时离开了家乡亲友，满腔热血的跑到中国，和中国的人民，一起来消灭世界强盗日本军阀。他们这一队，即将分发各前线，参加实际的抗战工作。

汉口各报纸，除《大公报》十八日停刊迁渝外，其余《武汉日报》《新华日报》《扫荡报》，缩减篇幅照常出报。

这是“武士道”

十月二十五日

武汉最后几天，整日在警报中度过。敌机无耻的追逐江心中的满载妇孺和非武装平民的难民船，对这些和平的老百姓，大显他们“武士道”的威力。他们每次轰炸后，还要低飞扫射。被沉的船，大小有十几艘，死亡人数总在一万人以上。

那是二十日的早晨，紧急警报刚刚拉过，敌机已出现在汉口上空，在徐家棚和旧日租界外平汉铁路两旁地带投下炸弹，飞去了。十分钟以后，我们赶到被轰炸的地方，茅屋中弹烧着，火焰随风蔓延，几分钟后，十几所茅屋都燃烧起来了，居民从火里抢救他们仅有的破旧的棉袄，哭叫、呻吟、怨恨，充满了这几条小街道。一个女人正弯着腰，扶着一个男人，他躺在草地上惨叫，血肉模糊，看起来是不会活了。就离这不远，躺着一个脸向下炸死的女人。有一段路轨炸坏了，英勇的铁路职工正在努力赶修，我们的交通是不会断的。

二十四日夜里，汉口各街道引沟上的铁板，都启下运走了。敌人除了空城，将不会得到什么。

二十五日晨二时，我们不能不离开武汉，我含着泪上了车。我和一位同情我们抗战的苏联朋友卡尔曼，同乘着一辆车，往北经应城向西去。我相信两人的感觉，绝对不会是一样，他的心情不会有我这么沉痛的。

长沙附近访问俘虏

十一月九日

上午有机会去看刚到小镇的日本俘虏，他们一共十三个人，低头坐

在路旁，有的伤还没有好，脸上缠着纱布。这是一条黄泥山路，路的左边是耸立的绿山，长沙市就在路的下边，古老的金黄瓦的庙宇屋顶在日光中闪烁，恬静、和平笼罩着这个小村落。我起始问一个在大学里读过两年的俘虏汤田良仁，我问他为什么到中国来打仗，他默而不语，以后又说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征兵强迫来的，初来时只知道到华北，很快就可以回去，没有想到根本就没有回去的日子了。我又问另一个俘虏谷一市，问他日军捉到中国兵士的时候，怎么样处置，是否活埋、砍头。这个带小胡的日本兵狡猾地说："杀中国俘虏的事，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只知道把他们都送到后方去的。"我们拿出从日兵身上得到的日记本给他看，上边写着："将所有捉到的中国俘虏处死。"我开始恨我眼前的这一群，他们是受了日本军阀欺骗的盲目野兽！他们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的兄弟姊妹……

正当这个时候，晴空中传来当当警报钟声，我们散开了，敌机轰炸衡山，炸弹爆炸的声音刺着我的心，每一声下，不知道多少人没有了家，几百几千无辜的老百姓被炸死。当我回到这批俘虏前，我压制不住我的愤恨！我能亲手杀他们！我愿意看日本野兽的血！此恨此仇是永世永代的了，我活着就是为着替我们牺牲了的姊妹兄弟复仇。然而，当时我还是强忍着了。

"你们放心，中国不杀俘虏！几天以后，你们都会穿上新的干净衣服……"临走时，这是同伴张的话。

从长沙赴前线

十一月十二日

总理诞辰纪念日，冷落的长沙街上挂着蓝色的庆祝标语，所有商店、银行都关门了，只有几家卖皮箱的在做着投机生意，白天街道上行人很少，只有武装战士往来其间，和一些零散的伤兵。这是些为国为民流过血的战士， 我们应当怎么样的爱护他们?

晚八时离长沙向北去前线，有长官部王参谋同行，经高桥、金井到汤总部。汽车留在公路旁，我们随挑夫绕山前进，在一个小小的村庄停下了。副官处给我们找了一个堂屋休息，四边透风，木板上放了一些稻草，

一盏油灯发着一点点的光亮。忽然在屋角发现一口大黑棺材，上边盖着草，这间古老破旧的屋子，立刻使人觉得神秘了。是带着一点恐怖和不安，我躺下后遮上了头，以后似乎听见有人来，把油灯拿走了。

会见关将军

十一月十三日

早晨起来，去见关将军，他详细叙说抗战以来，我们战士们作战极勇敢的情形。

下午五时离开军部，到公路已近七时，乘车再往北向汤总部去。三个钟头以后，到了公路附近的招待所，从这里再走七八里，到副官处，遇见《武汉日报》记者周海萍，我们曾在徐州一起访问过前线。天已向晚，我们到另一个小村子住下了，预备明天早晨去拜见汤总司令。

军中的女同志

十一月十四日

很舒服的睡了一夜，早晨有人来请到汤总司令处吃早饭。汤总司令的相片，我早已见过，谈了几分钟话以后，就让人心里觉得很舒服，他态度诚恳、朴实、坦白。

饭后，有附属总部的战时工作队代表来，其中有两位女同志，一位短小矮胖，河南人，曾在济南做过小学教员和校长。她头发剪得像男人一样短，身上穿着一件单薄的绿布军服，她是去年十一月考入这一军做政治工作。另一位简直看不出来是女孩子，叫马桂岑，她也曾做过小学教员，她说抗战以后，她曾在开封等地参加过抗敌后援会，不过工作没有多大成绩，所以当时决心要拿枪去杀日本鬼子，因此加入了战时工作队。

第一期有工作人员一百多人，其中有三十位女同志，经过三个月训练，然后分发到各部队工作。现在汤总部有政治工作人员三十人，有九位女同志。他们主要的工作是每到一个地方，召回居民，对居民尽可能加以训练和组织，组织临时市场，助捉汉奸，救护前线轻伤战士，派工作人员到敌人后方探听敌情。我们一起到他们住宿处，绕着小桌谈话，在这儿遇

到一位高个儿女同志，她是甘肃人，很健谈，长得很美，她有一双大的黑眼睛。

这位尤同志讲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她说有一天夜里，她们一行二十个人行军走到一个离通城六七里远的小村子，她们在村边找到一所茅屋，起始轻轻地敲门，一会儿一个老太婆手拿着油灯开了门，她们把来意讲给她听，请她允许她们借宿一夜，老婆婆听了以后，立刻请她们进屋，把她仅存的菜米都拿出来了，也把保存不知多少时候的半罐盐也拿给了她们（湖南缺盐）。因为老婆婆有病，所以我们的女同志们力劝她睡下，说她们有了东西，自己就可以做着吃了，老太婆无论如何不肯，她说：“你们替老百姓打日本鬼子，已够辛苦了。”自己亲自把饭菜做熟了，拿给这一群女兵吃，一直就坐在她们旁边，看她们吃完了，都吃饱了，才去睡。

在湖南乡间，在汤总部吃过提前的晚饭，我们和汤总司令骑马到公路。这里风景美极了，湖南的乡间很富庶，我们在稻田的小路上走着，四边全是水田，整齐的房屋在山前，山上绿松夹杂着红叶，夕阳中稻田里映着小路上的马影。我们一步一步地走着，汤总司令伴我们到所属的一个军部，他有事和各军长、师长们谈，在这里我们休息了一个多钟头，以后又继续我们的路程。沿途下马过桥，这样走了很久很久，一直到夜二时才到了第二军军部。

今天上午听到长沙大火的事情，是我们十二日离开长沙四个钟头后发生的，据说长沙完全烧光了，损失极大。

明天清早将去第一线，不过，最近战事很沉寂，情报显示前边只有五六百敌人，主力转向了岳阳，企图沿粤汉铁路积极进犯。

一位青年战士

十一月十八日

在返长沙的路上，沿途除了一些到后方整理的部队外，找不到居民。过了平江，又走了三四十里，目的地该到了，可是没有影子，王参谋只好下车去问路。

夜是静的，天上的星斗今夜特别多。为什么我认不出“道士星”来？

卡尔曼和我悄悄地在打着盹，等问路者的报告。我忽然听见有轻轻的脚步走到车旁停止了，“我有病，我可以坐坐你们的车子吗？队伍在前边，我落下了”。车窗前站着一个年轻的战士，披着灰毯，黄瘦的脸上闪烁着一对大的凹下去的眼睛。我全身一颤，这一双眼睛太像我弟弟的了。近来常常想到四年不见的亲弟弟，不知道他在东北怎样地生活。他是有血性的中华青年，怎么能忍受日本强盗的压迫和欺辱？有的时候我想象他一定离开家到深山里做游击队员了。

这些天，我一遇到受伤的战士，总是不自觉的细细的看着他们的脸，心想：或者弟弟被日本强盗强迫和自己的同胞作战？那他绝不肯，可能会设法跑过来。

我们的车子太小，没有办法带他；王参谋问路回来，知道还要往前走；车开了，我们病了的战士仍旧站在路旁。我的心里经过几个钟头，还感到酸痛。夜是静的，我不知道在想什么。王参谋说他认识方才那位战士。去年他在师里做团副的时候，要求坐车的战士是班长。

踏上伟大的征程

一月十九日

天亮的时候，才知道我们已走过目的地十余里了。要找的部队也已迁到长沙，只有几个人留守，王参谋打电话到长沙，请他们送两听汽油来。

一直等到晚上，还不见送汽油的来，我们烧起了火堆取暖，一有汽车声音我就跑到路上接。已是深夜两三点钟了，我站在公路旁，忽然有脚步声沿路向我走来，我立刻用电筒照了一下，是一位战士。他走到我面前站住了，经过几次问答后，他兴奋地说：“你还是女同志啊！……我伤已经好了，所以现在赶回去杀日本鬼子，总得把他们杀净，才算完。”

脚步声渐渐的远了，他踏上了伟大的征程，英勇的中华战士！

编后记

母亲于五年前安逝洛杉矶后，我把她书写多年的生平经历手稿拿出，取了个标题《聚聚——时代动乱的哀歌》，遵她生前所嘱，复印后交与子孙各一份，“作为晚辈永存的纪念”。

今年四月间，收到报人、老友南发发来的一封邮件，阅读时偶然勾起我的另一段回忆。约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母亲来新加坡探望我们。她有机会与南发见面，于谈话间提到她50年前任战地记者的往事。事后南发来电，希望对我母亲做个专访，以发表于新加坡报章。可惜我因忙于他事，未及安排，以致错失机会。想到这里，我给南发回电邮，提到母亲所书的十万余字的书稿，请他给予建议。经讨论后，南发将我介绍给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李怀宇先生。李先生又联系侨居美国的刘荒田先生。三位阅读原文后，都认为这一缘起自白山黑水、松花江畔的真实事迹，应予出版，以长留历史，让后代传承。

由此，分居中国、美国、新加坡三地、各有所成的三位杰出华人作家，通力协助：荒田夜以继日地进行稿件编辑，南发书写前言并协助我逐张分析、选择旧照片，怀宇不断地居间协调，提供意见并准备出版事宜。远居美国的妹妹宇昭及侄儿元宁，也从家中取出尘封已久的和母亲有关的资料及照片，快速递送到我手中。

南发为书另取名《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并建议，封面应以苍天白云为背景。我觉得书名取得很好，因为它传神而准确地概括出母亲的生平。然而我心存疑虑，不知应否除去“传奇”二字，因为母亲是我们有血肉、有情感的真实妈妈，何来“传奇”？然而，在编辑过程中，收到三位参与者的来邮，他们都对母亲充满敬意，说自传

“读着落泪”。我重读母亲的手泽，泪湿衣襟，也终于意识到，我已不再真实地拥有母亲；但是，已随白云飞渡我最亲爱的妈妈，她的一生确实是应在人世流传的传奇。

孙宇立撰　2015年5月28日于新加坡

泪水中我仿佛看到，母亲在紫蓝的夜色中扬帆乘白云而去。照片中的雕塑名为“缅怀”，我为2011年10月新加坡滨海灯光雕塑节所做。

江山万里，一片白云，悠然飛渡
家国在心，天地浩气，凛然长存

张郁廉绘山水国画

母亲原是一介平凡小女子，
在动荡的大时代，
亲历悲欢离合、国破家亡的民族悲剧，
在无奈的随波逐流中挣扎求存，
终于谱就她这一段不平凡的生命篇章。

——宇立、宇昭

張郁廉 著

白云飞渡

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聚聚 Зоя（1914—2010）

“聚聚”是父母为我取的小名，后来父亲告诉我这个名字的寓意：
他厌倦了离散的生活，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家，夫妻子女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但是，事与愿违，我们的家不但没有“聚”，反而“散”了；
散得那么彻底、那么悲惨！

上架建议：传　记

ISBN 978-7-218-10393-8

定价：39.00元